

第三章 统带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艰难历程

开文、梅龄转战于蛮荒绝境、驰突于冰天雪地，足蹈险危，身冒不测。赖民国威灵，勉奏肤功。

——上海《申报》1912年11月10日载《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

第一节 追寻郑开文统带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事实真相

1912年2月4日，受孙中山、黄兴委托，郑开文带领中央工作组，与袁家普、肖堃、王兆翔、陈廷衡等五人到昆明工作，^[1]其主要任务是集结云南军力参加北伐，并挑选、调动云南精锐部队，作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警卫军，拱卫中央政府。谁能料到，郑开文等人经过长途跋涉到达昆明时，已经是1912年2月12日，随后传来消息，满清政府宣布垮台，南京临时政府宣布移交北京临时政府，南北议和开始，孙中山、黄兴的构想完全破灭，此事就不了了之。随后，郑开文等人转入滇都督府工作，郑开文初任都督府参谋兼商团局督办，辅助蔡锷进行以巩固、提升云南地方政权的一系列改革。

辛亥革命前后数月间，西藏地区发生了达赖喇嘛、亲英分子煽动藏族军队、信教民众以武力驱赶驻藏汉军，图谋“西藏独立”的叛乱事件。由于西藏地方政府已经被英方利用，汉、藏冲突已经演变为分裂主权和破坏祖国统一的原则性问题，这关乎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否，关乎中华民族的国运、命运。在舆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同时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萨劝说达赖脱离英国的羁绊，维护祖国的统一。

云南都督府遂任命滇军参谋厅总长殷承瓛为西征滇军司令官，郑开文为副司令，姜梅龄为参谋长，率一混成旅军队援藏平叛。1912年7月4日，郑开文率西征滇军第一纵队以“先遣队支队”名义先期出征滇西。7月22日，殷承瓛司令官率西征滇军司令部从昆明出发。8月初，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抵达滇藏边，在阿墩子（德钦）县城设前线指挥部，将所属部队分为左、右纵队继续前进。右纵队长由联长郑开文兼任，进攻溜筒江、墨里、盐井；左纵队长由姜梅龄参谋长兼任，率部渡澜沧江、翻越梅里雪山，直抵毕土、察隅、波密。

写下这几行字，连笔者都吓着了，竟然与以往专家学者的叙述如此不同，是否有点信口开河？

民国元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记载，最为重要、流传最广的当属《西征篇/云南光复纪要》一书。该书编纂于1913年，总纂周钟岳，分纂赵式铭、郭燮熙、张肇兴，全稿经蔡锷审改订正。《云南光复纪要》记述云南辛亥“重九起义”史实，以及1911~1913年间云南重大军政事务，因其当事人蔡锷的审改订正和参与其事的周钟岳总纂，部分编纂人员亲与其事，资料丰富，记载翔实，被誉为云南辛亥革命文献中可征信的史料，让我和许多民国史研究者都深信不疑，引用广泛。

但是，历史的隐秘之处往往在于历史现场资料的阙如，百年来研究西征滇军援藏平叛历史的资料，仅以《西征篇/云南光复纪要》《民元藏事电稿》《惺庵电光集》等书籍文章所展示的电文、资料为凭借。如：何耀华主编《云南通史》、某教授著《蔡锷传》、某教授著《天南电光一辛亥革命在云南》等等，对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的论述，均采用这些书籍文章的资料。

由于历史事件的隐秘性，不可能留下当时完整、准确的材料。因此，研究这一问题时，必须借助当事人执笔的史料。2011年再版的《云南光复纪要》一书，其中，赵式铭编撰的《西征篇》是我最初研究民国元年云南援藏平叛事件最为借重的资料。当事人执笔的史料，本属可征信的第一手材料，但因执笔者大多置身于事件现场的某个局部，或基于自己一时一地的立场，往往各持私见，莫衷一是，所得结果往往大相径庭。云南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方国瑜先生在他的奠基性巨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述》中，讨论了有关云南辛亥革命史料的问题，特别提到这本民国二年云南都督府编撰的《云南光复纪要》，认为该书“执笔者各自表功，且有互訾而多失实”。揭秘道：“蔡锷在刘存厚主稿部分的誉清本上手批：‘何尝有此事’者数处，其余各篇亦有批记不符事实者。该书编成后，因各持私见，争论不决，未能定稿而罢。在草稿本讨论时，也互相诽谤，不能相下而散。蔡锷将稿本交秘书郭燮熙编辑整理，亦因‘其中异同是非，难于下笔，迁延久之’。方国瑜先生感叹道：“历史资料之价值，咸以当事人执笔为可信，而此稿所争议将从何说，其余亦往往如此也”。对于史事史料的采用，方国瑜先生亦有精辟评论：“自古以来史料，今所得者，大都出自统治阶级之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考校者，往往以当事人第一手资料为可信，安知私心自用，无中生有，犹言之成理，以自欺欺人，百无一一是者，逐处皆然。考究史事之有无是非之间，只凭现象列论，无有不受欺骗者。”《西征篇》一文涉及本书主人公郑开文事迹较多，笔者以往的著述也采征这些材料，正是“受欺骗者”之一。

随着笔者调查的深入，发现这些貌似公允的当事人执笔史料，所勾勒的线索脉络与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本相缺乏相对应的逻辑联系；有些则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甚至有人为制造假象掩盖扭曲事件本相的痕迹。另外，纵观近几年国内专家学者的专题论著以及参与援藏平叛人员和社会人士的回忆录、后裔的纪念、缅怀文章，所阐述的事例、过程，都不尽相同，甚至连各级指挥人员的指挥、部署、作战任务也有多种说法。有些论著则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完全背离了事实真相，与笔者掌握的资料、实物史料均有巨大差异。

笔者注意到近年来，部分史学者对于民国元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各有深入研究，对《西征篇》模糊、疑窦处亦有多方探讨，对一些具体的战役部署、事例、过程等均有补充或修正。如《中国近代战争史》：

在川军进军川边之际，滇省西征军司令殷承瓚率新军一混成协、防军十九营，从滇西北取道盐井支援巴塘。8月19日，殷承瓚率部抵丽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及李学诗的西防国民军，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及杨汝盛的西防国民军，取中旬大道直趋乡城。司令部及余各队暂驻丽江，相机进击。^[2]

显然，《中国近代战争史》阐述的内容对《西征篇》有较大的修正，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规模、部署等情况已有了具体量化的材料。但是，由于历史现场的材料发掘少有斩获，研究者所叙述的内容仍然不能脱出陈旧穴臼，所得出的结论亦有炒冷饭的感觉。

另外，研究云南援藏平叛及主要领导人物的书籍，如：《殷承瓚与护国运动》《郑开文将军事略》《辛亥名将郑开文》，以及大量学术论文、网络文章等，均采用《西征篇》内容为主要线索，

演绎阐发，推而广之，遂形成既定“事实”。

如果说这些研究成果是史学者攀书山涉学海所得，而我的疑窦却源自血缘的呼唤。毋庸讳言，笔者是郑开文的嫡亲外孙女，从小就耳濡目染外公遗留的文章书稿、字画笔墨；生活在外婆、母亲和亲戚朋友的声声念叨、感佩中。一份沉甸甸的血脉亲缘，便有了一份继承传递与追寻事实真相的责任。为了梳理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历史，追寻先祖郑开文的遗迹，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各省市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断续有数年时间。也曾驱车数千公里到达丽江、香格里拉（原中甸）、德钦（原阿墩）、溜筒江（村），盐井、芒康（原江卡）、八宿、左贡、碧土（原毕土）、然乌、米堆。返程时再次在奔子栏乡渡金沙江抵达川西的东旺乡（原东汪）、上翁村（原瓮水村）、乡城（原定乡）、稻城（原稻坝）、亚丁、贡嘎岭及周边地区，沿着当年西征滇军的行军线路，亲身体验滇、藏、川接壤地区的地形地貌，风俗人情，置身于曾经硝烟弥漫的战场，查询当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的蛛丝马迹。

诚然，寻求资料、探索历史奥秘，完全凭借研究者孜孜不倦的穷追不舍，有时则需要一点运气，或系于突发的灵感、偶然的一瞥。对于笔者来说，在图书馆、档案馆汗牛充栋的故纸堆中发现隐秘百年的西征滇军各类电文、文稿，在西征滇军的行军路径发掘到遗存的实物史料，则完全得益于一种无可言说的因果递禅，一场冥冥之中终究要到来的邂逅。

新近收集到相关于1912年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的资料、史料主要有五部分：

1. 郑氏家族保存的大理石“镇纸石”，其上的文字记录，清晰表明郑开文统带西征滇军第一纵队从昆明出发的时间为1912年7月4日，从德钦县撤回丽江的时间是1912年11月6日。

2. 云南省图书馆收藏民国初期发行的《天南日报》（后改为《天南新报》，缩微胶片），内存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于1912年9~11月间，由德钦前线指挥部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瓛的数份电文，事关援藏平叛战役的部署、指挥和西征滇军撤退前后的布置、安排。

3. 在南京、上海、呼和浩特等省市图书馆，查阅到1949年前在全国发行的上海《申报》中，刊载有标题为《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标注发往参议院、蒙藏事务局、京津各大报纸，云南省议会及各大报纸，事关西征滇军的进展，呼吁将盐井县划为滇省暂时管辖的利弊陈述，署名为统带西征滇军联长郑开文，参谋长姜梅龄。电文发送时间是1912年10月22日，《申报》刊文时间是1912年11月10日。

4. 现存云南省德钦县佛山乡溜筒江村的东达垭山口（马坝顶和阿东河二级电站间的山梁上）的茶马古道边的崖壁上的摩崖石刻，刻有“滇郑开文西征凯旋纪民国元年十月望日禄丰刘钟俊启”，共23个字。碑刻时间为1912年10月16日，正是西征滇军从西藏撤返到云南境内之时，距今已有110年。

5. 现存云南省丽江市黑龙潭公园内象山脚下，西征滇军撤回丽江时勒石《哀乌斯藏辞并序》左右两块石碑，立碑时间为1912年11月25日。该碑刻内容由西征滇军全体官兵、丽江府（地方）参与人员撰写、署名，记述了西征滇军参加援藏平叛战事的过程。

这五部分极少见端于现时书刊文章的材料，是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对援藏平叛战役的部署、指挥和处理军政事务的记录，虽残缺不全，不能反映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

的全貌，但涉及了西征滇军在盐井、毕土、中甸各战役的部分情况，应可征信。

对照当年西征滇军将士遗留的史料和实物，我们需要对民国元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作进一步的阐述和补充，对这些历史资料的勾稽、梳理，重新阐释西征滇军在援藏平叛事件中的鲜活细节，于历史的雪泥鸿爪中还原历史的真相，并试图对《西征篇》等文章的疏失和遗漏作个弥补，彰显民国元年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的基本面貌。

第二节 西征滇军谁为帅，任凭英国公使来定夺

清朝末期，英帝国主义利用其印度殖民地作为跳板，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地区的侵略活动。为了应对英国对我国藏区入侵引起的西南边疆危机，清政府一改以往在该地区所实行的传统统治策略和民族关系模式，开始积极地在康藏地区推行一系列新政措施，调动军队进驻西藏，加强防卫，对部分区域进行改土归流等社会变革，以期防止主权旁落、领土流失。但是，濒临崩溃瓦解的封建王朝已经不可能有明智的作为了，这些举措有明显的民族歧视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藏、汉民族间和中原与边疆地区客观存在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在同质化的过程中，触及了以达赖喇嘛集团为首的大喇嘛、大农奴主、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引起他们的极力抵触和抗拒，损害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导致藏区社会的激烈动荡。

1911年9月至1912年8月间，英国殖民者与西藏分裂势力相勾连，利用中国国内政局动乱之际，在西藏发动驱逐驻藏官兵的“驱汉”运动，妄图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图谋“西藏独立”。英印总督与达赖通过秘密商议，派亲英分子桑达占东（即藏军总司令擦绒）自印度回藏策划叛乱，英方则在藏印边境表示声援，明里暗里在武器弹药、资金、军事指挥、人员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

内地发生辛亥革命时，驻藏官员和军队内部也发生了革命浪潮，分化为维护帝制和赞成共和两派，进而发展为内讧。加上川军内部哥老会等帮会组织的存在，趁机滥杀无辜，抢劫公私财物。由于驻藏官员处理失当，形成混乱局面，爆发了汉藏不和、宗教势力、外国势力等积累已久的矛盾，“自此互相残杀之事无日无之，万难禁止”，西藏局势逐渐失去控制。

乘此时机，当时还停留在印度大吉岭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特派孜仲岱玛司库带着一封加盖其私章的藏历铁猪年(1911)文告前往康区，号召该地区僧俗两界为了“佛教”事业，用心协力做好“驱汉”工作。接着又派厦礼传檄各地藏兵于1912年1月围攻江孜、日喀则，驻江孜等地川军在藏军的压迫下，先后离藏。在拉萨，数万藏兵围攻川军，因寡不敌众，清朝驻藏机构衙门及军械局、铜元局等为藏兵所夺。为了尽快驱逐清朝军队，达赖喇嘛在噶伦堡任命坚色囊岗为西藏所有军营的大基巧（藏军总指挥）。藏历水鼠年(1912)3月，坚色囊岗返回拉萨后，与藏军总司令强巴丹达等人一道，组织藏军作大规模抵抗，川、藏两军的冲突日趋激烈。由于饷械匮乏，驻藏川军于6月19日与藏方议和，驻扎在拉萨的川军被“保管武器，递解由印度返回内地”。

同时，川边藏族上层因不满清政府此前的改土归流、川藏划界等措施，受西藏亲英分子的煽动、指使，并得到西藏叛乱武装的直接支持，趁乱发动武装叛乱，并向川边进攻，来势之猛，势如破竹。

变乱首先在康南地区的乡城发生。1912年2月，为报复赵尔丰捣毁桑披寺之仇，乡城喇嘛驱逐了清朝在该地的戍军及汉商，随后又进陷稻坝、贡嘎岭，万余名乡城民众前往进攻理塘，理塘

驻军营长顾复庆被迫东退，县令陈廉被击毙。6月，金沙江以西的江卡、乍丫、三坝、南墩等地相继陷没。7月，理塘、雅江、盐井也告沦陷。巴塘、昌都两地则被重重围困，打箭炉危在旦夕。至此，川边尚未陷落之地仅存泸定、打箭炉、道孚、瞻化、炉霍、甘孜、德格、邓柯、石渠、昌都等十一县，其余诸县悉为土司头人所掌握，滇川藏交通被切断，商旅为之裹足，形势危急。

由于藏军已经被英方利用，汉、藏冲突已经演变为分裂主权和破坏祖国统一的原则性问题，其实质就是英帝国主义趁中国社会变革之际，图谋割据、瓜分中国版图，进一步扩大在华势力范围。面对如此变局，全国各族人民一致谴责英国勾结西藏亲英分子分裂中国的罪行，猛烈抨击北洋政府的对外妥协政策，滇、川两省都督屡请北洋政府出兵西征。在舆论的压力下，北洋政府于1912年6月14日正式电令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入藏平乱，令云南都督蔡锷派滇军入藏增援。同时派得力喇嘛前往拉萨劝说达赖脱离英国的羁绊，维护祖国的统一。并通告英国驻华公使，声明“此次川军入藏全为平乱，至希英国严守局外中立”。

滇藏连接，关系殊重，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云南都督蔡锷的态度相当积极，对滇军援藏平叛的运作十分用心，在确定滇军援藏平叛的战略上也独具匠心。蔡锷叠电中央政府，极力主张出兵援藏平叛：

查藏中危迫，叠经电陈大总统，旋奉电谕，已电尹都督等筹办矣。滇藏接界，关系殊重，该都督亦应随时确探情形，密为筹备，以重边卫等因。兹复据丽维统领等电称各情，自应切实筹维，以副大总统靖乱绥边之意。窃念云南军队，训练甚精，前经援蜀援黔，均属耐劳敢战，现已陆续抽调回滇，若以之防剿藏乱，必能得力。惟滇省饷糈向由各省协济，现协款停顿，滇力难支，屡经请命中央，迄未奉复，若不得已，只有裁兵，复何余力戍边，为国家捍卫边圉。加以边境相继艰难，大局何堪设想，迫切陈词，伏维鉴察。^[3]

蔡锷考虑到川滇两军如先会师巴塘，再行进藏，不仅粮秣难继，而且可能会扩大由辛亥革命以来所引起的川滇两军之间的矛盾，因此主张滇军经维西及西藏东南地区直趋拉萨：

前电所陈由维西出口，经珞瑜野人地方直抵拉萨，工费虽巨，计实中肯。以后藏乱之平，若主力悉在川军，则此路可以缓议。倘必愿滇军与闻藏事，则滇军即不能不由此路入手。盖由维西出口，经珞瑜地方，向西北进至亚巴尔即入藏境。溯雅鲁藏布江而上，转西北至甲穆达，与川藏大道汇合，计程当省千数百里，其利一。中经怒求、珞瑜、野人地方，气候较温，出产亦富，间有平原，可资屯垦，其利二。此路凿通，则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其利三。早占地步，使将来国界远在怒求、珞瑜野人之间，不致近逼川西、前藏，其利四。不宁惟是，吾国至于西藏，向取羁縻主义，虽由于不勤远略而亦地势悬绝有以限之。以后强邻日逼，若仍虚与委蛇不为之所，西藏庸可保乎？故实力经营刻不少缓。其从入之路，东北由青海，北由新疆，两路皆苦不易。惟东由四川为正道，然前清边务大臣糜款千万，穷数年之力，其范围仍不出巴、里塘一带，察木多尚不与焉，此亦由于荒寒穹远之故。若滇藏间之便道凿成，省程途，因地利，勤屯垦，储军实，一气衔接，西藏经营可得而言矣。^[4]

蔡锷这番援藏、治藏的远见卓识，既可缩短路程，又可形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使“滇犄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更为关键的内容是为防止英帝国主义的窥视而“早占

地步，使将来国界远在怒求、珞瑜、野人（山）之间，不致近逼川西、前藏”，其热血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同时也显示出其卓越的军事、政治才华。蔡锷、郑开文等人在广西编练新军时就认为中国必须要至少战胜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战略构想，在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其作战意图就是以英国在中印边界军事力量为目标，在怒求、珞瑜、野人（山）之间确定中国军事力量存在的事实，以断绝英国对西藏的觊觎，并决意为体现中华民族的国家尊严，不惜与其一战。

作为曾经的军事统领，袁世凯对于蔡锷的援藏平叛战略意图和军事才能十分忌惮，自然认为这是蔡锷扩大滇省势力、力图滇军强盛的举措。因而“袁世凯一心称帝，不欲川、滇地方军事势力扩大，因而不接济饷械，致使孤军无法深入，徘徊边地，坐失良机。”^[5]俗话说：“道不同，不相与谋”，袁世凯与滇川将领的不同盘算，自然就会导致援藏平叛战事矛盾重重，困难重重，变幻莫测。

此时，北洋政府国务院电请蔡锷派兵会同蜀军“联合进藏，竭力镇抚”，5月18日国务院电，其曰：

云南蔡都督鉴：銑电敬悉。迭得四川尹张两都督电告藏境危急，已派军西进，请电尊处迅拔得力军队，联合进藏，竭力镇抚。现在民国建设伊始，若令藏境一有叛离，势必牵动全局，前途险象，思之心悸。夙仰执事威望昭著，规划宏远，务祈捐弃前嫌，力顾大局，迅拔劲旅，会同蜀军协力进行，奠安藏境，民国幸甚。^[6]

滇督蔡锷接到政府电令后，马上组织云南西征军援藏平叛。组军先选帅，由谁来统率西征滇军？当时的普遍观点认为，担任援藏平叛的西征滇军司令官，自然是李根源最合适。李根源在云南“重九起义”后不久，就以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的名义，全权处理滇西军政事务，并且蔡锷都督一再表态“经营滇西，请公放手办去，省中决不遥制”。滇西北地区与西藏、四川接壤，蔡锷和滇省军政界的想法亦相当一致，由李根源率领滇军援藏平叛，从军政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也最为相宜。

李根源分别于1912年5月6日、5月9日两次致电蔡锷商讨援藏平叛事宜，表现出当仁不让的姿态。李根源在腾冲会见第一批被达赖集团解除武装转经印度到达内地的陆军营长潘文华，其请教于滇，情词尤切，坚定了李根源“援藏平叛，非我莫属”的信念。李根源复电蔡锷云：

川边各属，前由赵尔丰拓殖，亦既完税，置官吏，设学校，初见规模。川乱以来秩序破坏，一切布置全行销灭，蛮烽复炽。而川军把持西藏，不许他省代谋，别具私心，不顾大局。但川边关系，乃川滇两省，祸不独在川。拟请电中央，迅派大员为川滇边务将军，筹办一切。^[7]

可令人意想不到的，蔡锷将统领人员名单报备袁世凯政府批准时，西征滇军司令官李根源的提名却遭到了否定。极力反对此项任命的人，不是袁世凯或陆军部相关人员，竟然是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据北京传来的内部消息，对李根源非常不利。有驻京滇籍国会议员寄李梓畅（即李日垓，时为李根源部参谋长）的信中就透露消息说：“大约因边事与外人颇有齟齬，故英公使屡次向中央多谓不然，都督为印兄请统兵入藏，已不可能矣。”^[8]时任参议院议员、云南代表段宇清也通报情况说：“前日见唐总理绍仪，本月望日见财政（部长）熊希龄，均言英使朱尔典谈兄不是，谓

兄强暴无礼，藐视大英帝国，常发以兵夺取缅甸之妄论。……对外人手段强硬，且躬亲调查片马，故久触腾越各外官及缅甸政府之忌。……惟既有此议论，麾下须经权互用，于外人交涉之时，无妨稍予融通，以便接洽。”

导致李根源失利的另外一个隐秘原因，则是其在处理滇西事务中所表现出权力欲望、功利心咄咄逼人的态势。李根源大权在握，以“重九起义”成立的云南都督府为正统派自居，依靠旧官僚赵藩、原清军第19镇38协（旅）统领曲同丰等人，以维护稳定的名义，扼杀了中国同盟会领导的腾越起义，诬告腾越起义领导人刀安仁，致使其在南京被拘捕。暴力遣散腾越起义队伍，残酷镇压保山（时称永昌）因急剧裁撤起义民军而引起的兵变。导致斥责声四起，也让云南都督蔡锷饱受同盟会、国民党派人士的诟病。

有此明暗两股力量的合流，李根源率部援藏平叛的愿望就此落空。蔡锷也怕他一时想不开，先致电文吹风：“李师长鉴：月密。兄请自统兵援藏，勇谋自佩。其如中央不允，公去何。余另电详。锷。马。印。”问题是蔡锷“余另电详”就此没有了下文，其中蕴含的意味让李根源苦苦思索数日而终不得其解。这些信息因当时云南邮电、通信条件落后，可能并没有完全即时到达当事人手中，李根源可能不知道事情如此变化，或者他压根儿也不会相信，堂堂中华民国政府为率兵出征平复由英国人幕后策划、煽动西藏地方势力的叛乱，维护国家主权而拟定的军事部署，竟然会因为幕后交战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干涉而流产。李根源在得知蔡锷另外任命滇军督府参谋厅总长殷承瓛统领西征滇军援藏平叛后，迁怒于蔡锷的言而无信，于是称病、辞职、甩耙子不干了。尽管蔡锷等人多次致电相劝，但李根源去意已决，从此与蔡锷分道扬镳，不再与闻云南军政，专注于组织云南国民党支部、参选国会议员。

笔者发现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大型典籍《湖湘文库》中，收录有蔡锷将军生平所有的文牍辞章，其《蔡锷集》竟然有一封蔡锷《代郑开文等致李根源电》，就与李根源的辞职有关，很有意思，录下来看看：

李师长鉴：大局初定，建设方殷，非有任重致远之才，不足以措国家于磐石。兄与蔡、罗诸公再造滇南，伟烈丰功，在人耳目。全体国民正资倚重，近闻兄有退隐之意，同人殊为悚然。刻下统一政府虽成，而列强尚未正式承认，各省又复自行争扰，回顾全局，殆哉岌岌。当此千钧一发，端赖老成硕望，鼎力维持。西南半壁，倚兄若长城，父老子弟，日夕盼望。兄为一身计，固属高洁，然若国亡，身将安附？兄不独为全滇计及共和前途计乎！鲜克有终之诮，恐不免为盛德所累也。祈稍为布置，从速旋省，筹划一切。同人等馨香祝之矣。宝眷仍留省，并闻。开文、琨、梅龄、开儒、封祝仝叩。有印。都督代。^[9]

此电文标明是都督代发，有韵目代日期是25日，即1912年7月25日。发报人为郑开文领衔，依次为吴琨、姜梅龄、张开儒、华封祝，均是留学日本的同学和同盟会会员。印倒是未必钤有，此时郑开文确定是在大理至德钦的行军路上，对蔡锷与李根源的电文往来肯定不知情，没有可能拟此电文。彼时，蔡锷贵为都督，声名鹊起，在屡劝李根源回省不果时，竟然祭起郑开文之名来劝解李根源，其行文语气还模仿得如此惟妙惟肖，足见蔡锷与郑开文之熟稔，亦表明蔡锷都督想利用郑开文在同盟会内的地位和朋友、同学身份来劝解李根源的真实意图。

云南西征军遴选统领的幕后较量，一开始就决定了援藏平叛战事的走向。身为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处理英军图谋侵犯中国主权、煽动西藏叛乱、妄图瓜分西藏的重大问题时，竟然仰仗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鼻息，对其言听计从，把战场对手的好恶强加于中国官员身上，注定了这场战事就是袁世凯利用中华民族的国家利益与大英帝国相勾兑的筹码，作为争取英国政府支持他继续执政、完成大借款的利益交换，其结果可想而知。

笔者绝非故作虚宏，妄加评论，在川滇出兵援藏前的1912年5月7日，北洋政府《国务院电熊克武侯大局初定再经营西藏》电文就是这样说的：

重庆熊司令：奉大总统令：支电悉。厚集兵力，宽筹兵饷，为绥靖藏卫准备，洵属洞达大势之言，惟国内集款，固属万难。收（借）入外债，启人干涉，此时只宜设法减兵，不宜更增兵队，俟大局粗定，再集合群力经营西藏。然专以兵力服之，亦甚不易往也。等因，相应电达知照。^[10]

1912年8月30日北洋政府国务院致尹昌衡电文也是这样说的：

……此次川军剿番得手，昨已有电嘉勉，惟该督拟精练边兵入藏各节，关系甚大，兹特详布。前清光绪三十年英兵入藏，与拉萨寺长及噶布伦等自行订约，其后中英两次订定续约章程，均认明藏条约为有效，则中国在藏主权，已迥异于各领土。前年正月英馆致外务部文称，西藏出扰乱治安之事，英国不能不问。本年英使因传闻调派军队征藏，迭次声明，西藏问题，总以日后和商，易为归结，倘现时用武力，与友睦必有巨碍，酿出重大交涉，或直至冲突各等语。藏事刻下实情如此，我派兵入藏，恐致不可收拾，一虑英人派兵，届时与战，则全国摇动，退则见侮于藏番。一、我不派多兵则前此条约俱在，将来事定申明照办，我应享利权等暨巡警法律诸端，在条约者，尚可规复。一、藏番本弱，取之甚易，若我不派兵，英人尚无可借口，否则英兵一入占据，即无办法，不如留作后图。此刻下办理藏事利害大概。该督但能先复川边，藏中震慑，届时呈拟办法，俟再与英使切确商论，当易结束，切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摇动大局。^[11]

划些重点，上述两份电文中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就是袁世凯政府对英国殖民者侵略和瓜分中国领土的企图，一味退让，委曲求全。其软弱与无能，与满清政府大臣李鸿章出卖国家主权的勾当何其相似！

其时，一直想依靠袁的力量，取代尹昌衡而成为四川都督的四川护理都督胡景伊，在西征川军被接连电阻不能出川境一步时，也忍不住愤懑发声。1912年9月27日《胡景伊电政府川边锐胜之师中道屯阻，主权悉失引为奇耻，又据马师周电藏复仇汉非恃空文所能济事请示》云：

……徒以条约牵掣，易客为主，诉以武力，不可听其鱼烂，不能出以和平之经营，又苦无处置，障碍横生，人操刀俎，直足令贾生痛哭，韩子腐心。固知大总统垂顾边圉，必有深略远谋，但雌伏久甘，祸即未已，主权悉失，尤引为奇耻大辱。昨据马师周印度来电，谓联豫、鍾颖现与达赖议和，军士回国，枪械存藏，而藏番复逞志仇汉，戮杀官兵五六百名，似此残暴不仁，非大施挞伐，不足戢其骄焰，仅恃空文抚慰，恐难济事。拟恳即飭外部速与妄逞阴谋之国，严重交涉，务期主权回复。^[12]

可见，袁世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视“但雌伏久甘，祸即未已，主权悉失，尤引为奇

耻大辱”而不顾，一味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勾兑、交换，可以说是达到了出卖国家主权而不顾的极致。

说到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话对袁世凯政府竟然这么管用，说到袁世凯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这种极不寻常的关系，可真要寻根溯源地扒一扒，多说几句。

1876年，英国人朱尔典作为一名见习翻译，首次被派到中国，后被派往朝鲜任驻扎汉城总领事。巧的是，朱尔典在朝鲜前期，袁世凯正在朝鲜驻军，两个人的交往就此开场。由于各帝国列强对朝鲜窥视已久，不满中国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加之袁世凯外交专横，导致日、俄等国与袁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同时，日、俄在东北亚势力范围的扩张，被大英帝国认为威胁到了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英国人看到大清政府和袁世凯可以利用其抵制日、俄等国势力膨胀，于是朱尔典暗中支持袁世凯在朝鲜的铁腕手段，同时表示尊重中国在朝鲜的特殊地位，相互间的利益纽带将朱尔典和袁世凯捆绑到了一起。

由于袁世凯驻朝十余年一直与日本为敌，日本也视其为扩张势力的第一大障碍，早就想将其除之而后快。朝鲜党人也对袁世凯心怀仇恨，认为他片面支持朝鲜皇室，对党人强施压力，遂决意暗杀袁世凯。消息透露，使得袁世凯风声鹤唳，不敢出汉城公馆大门一步。在这种局势下，唐绍仪力谏袁世凯内调回国，并愿自代其职。但报告一直得不到批准，直到甲午战争开战前一星期，袁世凯才收到清廷批准内调的电令。谁知这一消息竟被日本人探知，并立即着手密谋刺杀袁世凯。唐绍仪获知这一情报后，立即赶至英国驻朝使署，求救于袁世凯的铁杆老友、英国驻朝公使朱尔典，并共同策划了一个救袁方案。当晚，汉城公署内依旧如常，到夜半时分，袁世凯乔装打扮，身着便服，偷偷从公署后门溜出。唐绍仪与袁的另外两名亲信幕僚一路保驾，一直将他送至汉江边，登上了朱尔典为其准备好的英国兵舰。据坊间传言，此时距日本人密谋刺杀袁世凯的动手时间仅差十几分钟。基于此，两人的关系得以发展，朱尔典出任英国驻华公使后，与袁世凯的关系“更上一层楼”，成为袁世凯尊贵的座上客，是袁世凯少有的几个密友之一，甚至成为左右袁世凯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乃至左右中国政局发展的重要人物。

西征滇军、川军在川藏边作战中取得节节胜利，引起了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亲英分子的极度恐慌，英国政府迫不及待地台后跳到台前，胁迫北京政府停止向西藏进军。英国政府于1912年8月17日电令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干涉，以“不承认中华民国，并以实力助藏独立”相威胁。袁世凯正急欲获得各列强国家的“承认”，以获得大笔借款，遂屈从于英国的威胁，于8月下旬一再电令西征滇军、川军停止入藏，“以江达为界”，“先行肃清川边，万勿越境深入，致启外衅”等电文纷至沓来，从而丧失了进军西藏的良机。

大英帝国的欲念难填，绝不会因为袁世凯的软弱退却而停止侵略西藏的步伐，英国公使朱尔典再次充当了急先锋，朱尔典致中国政府声明：

英政府虽正式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确有上邦之权，然不能承认中国干涉西藏内政之权。缘按照条约，西藏内政应归西藏官吏自行处理，且1906年中英续订印藏条约第一条曾经声明，遇有应行设法之时，彼此随时设法将该约内各节切实施行。

按照此种根据，英政府对于中国官员近两年在藏占夺行政权限之事，概不承认。即袁大总统四月二十一日所发命令，谓西藏与内地各省平等，又谓西藏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各语，

均不能承认。英政府兹特正式宣布，不能承认此宗对待西藏之政策，并劝告中华民国不得再任官吏，有上言干预西藏内政之事。中国选派代表，随带相宜护卫，驻扎拉萨，劝导西藏外交事宜之权，英政府固愿承认。惟中国于拉萨或西藏驻无限制兵队一节，英政府不能承认。第四，英政府力请将上言各节，订成条约。此项条约成立之后，方能承认中华民国。第五，现时印藏之交通，对于华人应作切实断绝。俟此项条约成立之后，英政府探夺情形，酌量开放。惟此宗办法，与现时驻扎拉萨之中国兵队无关。缘本使馆已告知袁大总统，所有拉萨之中国兵队，如愿退出，均可假道印度端归中国。^[13]

一个英国驻华公使台前蛮横干涉和幕后与袁世凯的私下勾兑，就把数万西征军将士，锚定在冰天雪地的滇川藏边，动弹不得。郑开文等前线将士最后沦落到这样尴尬的境地无不与此相关：“滇军进退狼狈。……然最后目的尚未达到，全般计划半途中止，一簣功亏，殊为可惜。……将我军流血禅力征战经营所得之山河拱手还诸乱番，俾狡诈之达赖愈肆然藉他国之势力干涉西藏。可痛也，谁之咎欤。”^[14] 弱国无外交，堂堂的中国大地，中国人不能驻军，不能行政。中国主权之柄任由英国人摆布，中国军人还不得置喙，真是窝囊透顶。更为可悲的，为了答谢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帮忙”，袁世凯竟然于1912年11月“拟赠英国公使朱尔典一等嘉禾大勋章，外交部呈请授法国公使二等嘉禾勋章。”嘉禾勋章是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外人士的最高荣誉，袁世凯滥用国家权力，公权私用，明目张胆地为一个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侵略中国的英国打手授予国家最高勋章，卑污到如此地步，真让世人无语。

当然，后世史学者也以民国初立，需要稳定，财政困难等客观因素为袁世凯的举措开脱。但是，袁世凯、段祺瑞等是满清政府的高官重臣，亦从来没有民主共和的思想、情怀，他们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后，为维持其统治的长远利益，集中政治、行政、财经资源优势来分化瓦解革命党人掌控的各省政权，打垮政治对手，以消除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中形成的巨大影响。特别是1913年二次革命前后的政治态势和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复辟活动，很容易说明袁世凯要的是一统天下、延绵世代的袁家王朝，消灭、排斥的是代表社会发展进步潮流的民主共和国家体制，所作所为均逆历史潮流而动，代表了清朝封建王朝不甘心失败、妄图复辟回潮的最后挣扎。

第三节 “镇纸石”的记载与西征滇军各部进止时间的考证

殷承瓚率西征滇军司令部从昆明出发的时间是1912年7月22日，此据云南都督蔡锷7月22日《出征誓师文》推出，该部于8月10日到达大理，行程约400公里（以现今214国道老路计，下同），耗时18天。据赵式铭编撰《西征篇》叙述：“八月十九日，殷司令全军抵丽江，分军为两纵队前进”，即殷部由大理至丽江的行军路程约200公里，耗时为9天。若以此行军速度为参考，曾于8月19日在丽江分为两纵队前进的西征滇军左、右纵队，向中甸，德钦，维西、乡城，盐井方向进军，何时可以到达德钦、盐井、乡城？

丽江至盐井，相距400余公里，以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丽江至维西、德钦、盐井的路况比大理、丽江一带更为艰难。金沙江、澜沧江的阻隔，数座高山雪峰的逾越，还有藏军、叛乱分子盘踞在溜筒江、盐井附近，都会极大影响部队的行军速度。特别是大部队在雨季汛期渡过金沙江

时，没有桥梁可用，只有小木船轮番摆渡，花费时间肯定不在少数。据相关文档的记录，滇军在溜筒江村处横渡澜沧江时，仅有最原始的交通工具“溜筒悬渡”可用，每次溜索渡江，仅一人一马匹而已，更是需要长时间等待，别无选择。但是，以当时报载消息、郑开文与殷承瓛、殷承瓛与蔡锷的通联电文内容来看，西征滇军攻克溜筒江（村）的时间是1912年8月15日，收复滇藏边重镇盐井的时间是1912年8月27日。我们的疑问显然就是：从8月19日至8月27日这8天时间内，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右纵队要完成丽江至盐井400余公里行军路程，并完成攻占溜筒江、收复盐井两大战役，这时间是否急促了些？可能吗？

有两个亲历者的行程，可以旁证在骑马、步行的情形下，昆明至德钦、盐井究竟需要多长时间。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冬，上海市青浦人杜昌丁陪送被贬云贵都督蒋陈锡、巡抚甘国壁送粮进藏，至西藏洛隆宗返回，历时一年。他记录了每天的行程和观感，辑成《藏行纪程》一书^[15]，其由昆明至丽江转中甸到达德钦，刨除途中休息、修整时间，用时36天，行走2700里（约1350公里）。另一位是有“奇女子”之称的藏族姑娘刘曼卿，1929年为宣达中央政府五族共和的旨意进藏，留下《康藏轺征》一书，记录由昆明经丽江转维西、德钦至盐井的路程共2830里（合计1415公里），用时36.5天。^[16]

上述相隔200余年康藏旅行者的路程和行程所花费的时间相差无几，表明滇藏接壤区域的社会、经济、交通落后状况维持数百年不变，商旅行人必须在指定的台、站食宿（“台、站”是清政府在西藏设立驿站体系内容之一，清代藏区的驿传形式有驿、站、台、塘、铺、腰塘、宿站、尖台等，在承袭元、明朝之制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完善。“站、台”有粮食供给和食宿，乌拉支应。其他则仅可供住宿或露营），否则就会面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困境，夜间行进尤为不能。

从西征滇军在滇西北高原地区的行军速度来分析，由8月19日在丽江分为左右纵队的两支队伍，不可能在这短短8天时间内赶到盐井并组织收复盐井的战役。是否还有一种可能，即郑开文部并未参与盐井战役，攻克盐井的滇军仅为以“探险队”名义先期出发的（维）西协防军李学诗部或边防军独立中队谢昆山部。但是，郑开文率右纵队收复滇藏边重镇盐井县城的时间为8月27日拂晓前4时，已被殷承瓛8月30日致云南都督蔡锷电、蔡锷8月30日转呈维西协电、蔡锷9月10日致袁世凯政府《殷承瓛克复盐井请拨款接济电》以及下述9月1日《郑开文致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瓛电》所证实。

这些疑点的产生，迫使我们对于西征滇军行军速度、时间予以重新审视，才能揭示事实真相。笔者始终坚信，唯有当事者的行踪事迹，才能解开这个谜底。

其一、郑开文与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的行踪事迹：

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如期抵达滇藏边重镇德钦，于8月15日攻占溜筒江（村）。并经过周密准备，在盐井外围与藏军血战数昼夜，于8月27日晨四时一举收复盐井县。首要条件是郑开文率领的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先于西征滇军司令部出发，才有足够的时间完成昆明至盐井的长途行军，并完成两大战役的作战任务。

其实，关于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出发的时间，《西征篇》是有所交代的：“6月，滇都督简（任命）参谋厅总长殷承瓛为西征军司令官，先遣探险队前行，承瓛率一支队继之。”时任云南都督府秘书长周钟岳先生著有《惺庵电光集》，辑录了当时的电文原稿，关于西征滇军派遣探险队、先遣队支

队的情况也有记载。其中，蔡锷复国务院电文（民国元年六月十二日）云：

北京国务院鉴：真、文两电指示一切，极佩尽筹，当即派参谋总长殷承瓚率先遣队支队，迳越中甸，察看情形，再规进取。一切机宜随时续报。至前派之探险队业经出发，除探查珞瑜、野人（山）一路外，并令探查自中甸取道阿墩子、察瓦龙（到）达洛隆宗一带，现在是否可行，再为电达。滇都督蔡锷叩。文。印。^[17]

此电文表明西征滇军曾分别以“探险队”“先遣队支队”“承瓚率一支队继之”的形式，先后从昆明出发。那么，1912年6月12日“至前派之探险队业经出发”，其后，执行“当即派参谋总长殷承瓚率先遣队支队，迳越中甸，察看情形，再规进取”任务的人是谁？从昆明出发的具体时间是几号？

《西征篇》编纂者赵式铭先生于1916年11月撰《蔡松坡先生事略》纪念文章中提供了线索，表明西征滇军先遣队支队出征的时间是七月初旬，这比赵先生1913年编撰的《西征篇》所提供的时间提前好多天：

五六月间，藏氛大发，川边告急，大总统命滇出师入藏，川督亦有电求援，公乃简殷承瓚为征西司令，调拨陆防劲旅，于七月初旬开拔，前锋所及，克复盐井、必土，分师进规乡城、杂瑜、波密、遥解（原文如此，应为工布江达）。军行秋毫无犯，番人望风投诚。巴塘围困几半年，闻滇军至，撤围以去。方拟分道进取，直抵拉萨，用竟全功。忽奉大总统迭电令饬班师，遂中道折回，论者深为惜之。^[18]

赵式铭先生是云南省丽江市剑川县人士，自然对滇藏边的地貌形胜比较熟悉，大致能够确定行军时间的长短，“于七月初旬开拔”的先遣队支队，才有可能于8月26日“前锋所及，克复盐井、必土，分师进规乡城、杂瑜、波米（密）、遥解”，这与他奉命成篇的《西征篇》叙述有明显不同。

根据云南都督蔡锷7月22日《出征誓师文》推出，殷承瓚率西征滇军司令部从昆明出发的时间是1912年7月22日，昆明至大理约400公里，8月10日抵达大理，用时18天，“时值秋雨，人马奔疲”，倘属正常行军速度。若“于七月初旬开拔”的西征滇军司令部至8月10日才抵达大理，这肯定不会是滇军应有的行军速度。可见执行“先遣队支队”的任务并先期从昆明出发的人员不是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瓚，而另有其人。

能够进一步提供西征滇军以“先遣队支队”名义出征的具体日期和人员的史料，有郑开文家族保存的大理石“镇纸石”上的文字可予以证实。此大理石块为彩色，石纹清晰，呈白云墨绿色山峦图案，不甚规则，约15X8平方厘米，是西征滇军援藏平叛凯旋时，由郑汝昌“谕固购此石，敬赠以作纪念”的物品，上书：

中华民国元年，阳历七月初四日，随闾（此字不清，疑为阁字，闾通阁，意为尊崇）郑联队长炳然出师西藏，剿灭蛮匪，庆祝共和。迨削平大难，至冬月初六凯旋，□□□□此石，敬赠以作纪念，鸿飞贤弟雅鉴。禹远郑汝昌。^[19]

郑开文，字炳然，“郑联队长炳然”自然是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绝无歧义。郑汝昌

显然是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的参与者，清晰记载郑开文率西征滇军第一纵队从昆明出发时间是民国元年阳历七月初四日（1912年7月4日），凯旋时间是冬月初六（1912年11月6日），均符合西征滇军所有战事的进止时间。



记录西征滇军从昆明出发以及从德钦前线回撤丽江的镇纸石。现存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

由此论及，郑开文率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实际兵员大体是一混成旅的编制）以“先遣队支队”名义，于1912年7月4日从昆明出征（早于殷司令率司令部本部出发的时间18天），经过52天（时间较长是因为大部队行军肯定不同于商旅行走）的长途行军，于8月26日前，右纵队抵达西藏盐井县附近，形成对红、白盐井的攻击态势，8月27日拂晓前4时收复盐井县城。

其二、殷司令及西征滇军司令部的行踪事迹。

殷承璫率司令部从昆明出发的时间是1912年7月22日，8月10日抵达大理。9月11日《蔡锷电政府转殷承璫电滇省援军已发，势难中止，请定明川滇两军进行方略》称：

……璫在大理军次，奉到前电（指8月21日的国务院个电），时值秋雨，人马奔波，未敢稍休，枕戈待旦，不遑假寐。抵邓川剑川，先后接盐井委员张世杰、巴塘参赞顾占文求援急电（此电文由云南都督府转来），即星夜督师兼程而进，并飞令前卫司令官分道扬镳。右窥里城，以为川军进窥里塘之声援；左攻盐井，以救川军坐困巴塘之危急。左军适与匪遇，才攻简江，即大败之，军次梅里又猝遇匪众，擒斩无算，当连捷情形，电由都督转报在案。一面又开拔两纵队，右趋中甸，左趋维西，以为后盾。^[20]

此电文表明殷承璫在大理军次（在大理宿营）时，收到北京政府8月21日来电（国务院个电），即殷承璫和西征滇军司令部至8月21日还驻扎大理，根本不可能发生《西征篇》所述“八月十九日，殷司令全军抵丽江，分军为两纵队前进”的事件。

殷承璫8月10日抵达大理，为什么8月21日还驻扎大理？这个问题向来被研究者所忽视，直接影响到西征滇军司令部到达丽江时间的确定。笔者发现的线索，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答。1912年5、6月间，原任全权处理滇西军政事务、云南陆军第二师师长李根源因对蔡锷任命云南援藏平叛西征滇军司令官的人选不满，装病、撂挑子不干了。于此，蔡锷经过多次劝解也无法改变李根

源的去意已决，遂派殷承璫接手滇西军政事务。蔡锷于1912年8月2日电谕滇西第二师司令部李根源师长：

大理李师长鉴：感（7月27日）电悉。司令部俟殷叔桓（殷承璫，字叔桓）到榆再行裁撤。所有关防印信，可由执事晋省自行缴销，不必派员赍送。西事勾当毕，务望早来。如需调养，当不以繁剧事相累。樾老处希以催之。锷冬印。^[21]

蔡锷8月4日“支电”则再次明确指示：

大理李师长鉴：冬（8月2日）电悉。承允偕樾老来省，慰甚。望于叔桓抵榆后协商一切后，始可将司令部裁撤。请以八月初十以前为期。尊眷请先来省。锷支印。

此处的日期均为阳历，殷承璫于8月10日抵达大理，正是蔡锷与李根源约定的“八月初十以前为期”。可见，殷承璫在大理耽搁的时间，就是他与李根源办理滇西军政事务交接的时间。尔后，殷承璫被省都督府任命为“西征滇军司令官节制丽维永水等属文武官吏调遣陆防各军事”，实际上就是接替李根源成为滇西军政事务的首长。

“璫在大理军次，奉到前电（个电）”的最早时间是8月21日，即殷司令抵达大理后收到省都督府转来国务院“个电”在前，“抵邓川剑川，先后接盐井委员张世杰、巴塘参赞顾占文求援急电，即星夜督师兼程前进并飞令前卫司令官分道扬镳。右窥里城，以为川军进窥里塘之声援；左攻盐井，以救川军坐困巴塘之危急。左军适与匪遇，才攻筒江，即大败之，军次梅里又猝遇匪众，擒斩无算，当连捷情形，电由都督转报在案。一面又开拔两纵队，右趋中甸，左趋维西，以为后盾”则是在其后。而溜筒江战役打响的时间是8月15日；盐井战役打响的时间是8月27日，这显然与殷承璫电文内容相抵触，也与《西征篇》叙述内容风马牛不相及：

八月十九日，殷司令全军抵丽江，分军为两纵队前进：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而以贾子绶为步兵大队长，谢琨山为步兵中队长，白正洸为机关枪中队长，□□□为炮兵小队长。李学诗领西防国民军，是为左纵队。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而以华封歌为步兵大队长，杨承禄为步兵中队长，陈天贵为炮兵中队长，华封治为机关枪小队长。杨汝盛领西防国民军，是为右纵队，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司令部及残余各队暂驻丽江。^[22]

另外，《中国近代战争史》也有相似叙述：“8月15日，前卫司令李学诗率部进至溜筒江附近。该地藏军依险据守。经李部奋力攻击，藏军退守隔江之墨里村，并斫断江上溜索，以阻滇军前进。李学诗派人另架溜索，命防军、土军各四个排溜渡过江，迂回墨里村。藏军又将村外木桥砍断，据险死守。16日，滇军发起猛攻，于下午3时将该村攻占。”

从这两篇文章所述的溜筒江、墨里村战事来判断，编撰者对溜筒江、墨里村的地形地貌不甚了解。据笔者实地勘查，溜筒江（村）位于澜沧江西岸，西征滇军由阿墩（今德钦县）行进溜筒江村时，走的是东岸，抵达村前百米处有溜索桥一座，可以在溜索桥边挂索筒，利用地形落差顺势滑过澜沧江到溜筒江村。这段江面我们测量的宽度约60米（史料有载），因上下游落差大的缘故，此处水流特别湍急，两岸岩石在江水常年冲刷作用下，形成深深的沟槽，犹如竹子剖开一般

整齐划一，故这段澜沧江区域俗称为溜筒江。百年前的状况不得而知，就笔者实地观察到的情况来推测，（维）西协防军李学诗部仅为一营兵力的地方武装，不具备综合作战和架桥铺路的能力，不可能短时间内在60米开阔的澜沧江上另架溜索。墨里村同样位于澜沧江西岸，在溜筒江村上游约20公里（蔡锷电文示意为70里），即攻击墨里村的部队亦最少需要一天的行军路程，没有木桥可渡，只是江面较窄或水流稍缓，可以舟渡或泅渡。故，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部于8月15日，采用正面攻击溜筒江村，与16日迂回包抄墨里村（今梅里水村）的战斗，应该是不同时段的两战，不能混为一谈。

另外，据笔者实地考证，在溜筒江村没有攻克前，去往墨里村的道路必须沿澜沧江东岸的茶马古道行走方可，具体路线是溜筒江——说日村——江坡村——墨里村。这条路线都是在澜沧江东岸的山脊上行走，竟然相对平坦。近年发现的《滇郑开文 西征凯旋纪念》摩崖石刻就在这条线路上，即表明西征滇军由藏区撤返丽江时也是走这条路。百年前的茶马古道绝非是今日的国道214路线的走向，这一点需要史学家格外注意。

既然两篇文章都提到“溜筒江战事”发生在8月15日。如果，（维）西协防军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曾与殷司令在大理、邓川、剑川的某处交集，其部到达溜筒江的时间会是哪一天？当然，“并飞令前卫司令官分道扬镳”可理解为通过电报或电话等“飞令”，但当时部队通讯装备非常落后，西征部队不可能拥有先进的移动通信设备（美国军队使用的移动式步话机发明于1942年），其部在溜筒江（村）一带，距离邓川、剑川400公里以上，中间有海拔4000米以上的梅里雪山、白芒雪山等数十座峰岭的阻隔，有江河沟壑的险途，没有大功率步话机、无线电发报机一类的移动通信设备，根本不可能接受西征滇军司令部的指令。即便利用清政府原有的驿传机制，骑马传递亦不可能。殷司令用什么方法“飞令前卫司令官分道扬镳，右窥里城，以为川军进窥里塘之声援”。

笔者查阅到1912年9月11日《蔡锷电政府转殷承霖电滇省援军已发势难中止请定明川滇两军进行方略》原电文为：

……殷司令曰：抵邓川、剑川，先后接盐井委员张世杰、巴塘参赞顾占文求援急电，即星夜督师兼程而进，并飞令前卫司令官分道扬镳，右窥里城，以为川军进窥里塘之声援；左攻盐井，以救川军坐困巴塘之危急。^[23]

而《西征篇》编撰者将相同电文表述为：

殷司令前命李学诗为前卫司令，直趋盐井，学诗于十五日在溜筒江附近，与蛮开始攻击，毙喇嘛一人，蛮匪十六人，马二匹。蛮退至距江四十里之墨里村。既而蛮复廩至，斫断溜绳，距西岸滋扰。学诗命土目吉祥云紆道另设之，而命蒋委、黄弁率防军土军各四棚过江，绕墨里村，与蛮遇，蛮断木桥死守。我军十五夜进攻，十六日午前三钟破之。计俘虏一，首级七，跳江二十余人，负创三十余人，我军无伤，仅打折九响枪一支，消费子弹千八百四十余颗。捷闻，殷司令急命李学诗乘胜直捣盐井。^[24]

与殷承霖原电文作个比较，就可以发现编撰者对“司令”和“司令官”称谓含意存有误解。按民国初年军队官阶称呼的习惯，某旅、团、营部队在执行某项任务时，为壮其声势，可以称之

为“某军”或“一军”“一师”，相应的责任人可称之为司令，而“司令官”或“总司令”是若干个“司令”的总负责。殷承瓚被省军督府任命为“西征滇军司令官”，驻丽江调度。郑开文作为西征滇军的副司令，进入藏区指挥援藏平叛战事，赋予“前卫司令官”称谓是名副其实的。殷承瓚司令官的原电文：“并飞令前卫司令官分道扬镳，右窥里城，以为川军进窥里塘之声援；左攻盐井，以救川军坐困巴塘之危急。”显然是指第一纵队联长、德钦前线总指挥郑开文。

而前卫司令李学诗仅辖西协防军（维西协防军）第六营，在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期间，统属于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右纵队。8月30日《蔡锷电政府在溜筒江击匪情形》：

大总统暨国务院、各省都督鉴：前接维西通判删电开：墨（里）蒋委于初五日飭队守溜筒江，匪隔江放枪，我军还击，见兵众初七日夜遁等语。顷接殷司令勘电称，前卫司令李泥沱于八月十五在溜洞（筒）江西，与匪开仗，攻击撞（创）喇嘛一、匪十六，马佗该匪退至墨里村，我军追击七十里，撞（创）匪六，堕江死者二十余，生擒一，掠获蛮枪三杆，该匪分窜曹阿龙及白盐井兜战，我军无伤，现进至距盐井二站之巴咪，不日进攻等语。旋接维西通判文电，李协报称藏蛮复集兵至溜筒江，截断溜绳，当即飭人迂道另设，命蒋委、黄弁率军过江，绕墨里村，蛮断木枫坚守，我军十五进攻，十六攻破，俘虏一，首级七，跳江二十余，带（伤）三十余，我军未受伤，不日直捣盐井等语，份(?)阅勘寝两电，大致皆同，合先电闻，藉慰廛系。滇都督锷。卅印。^[25]

此电文中，李学诗的职务表述为“前卫司令李泥沱”“李协”（协防营营长），职能定位与盐井战役时相同，是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右纵队前卫，完成的作业是侦察、打前站、维持地方秩序等，显然不是“前卫司令官”。电文中指挥“蒋委（员）于初五日飭队守溜筒江，匪隔江放枪，我军还击”与“前卫司令李泥沱于八月十五在溜筒江西，与匪开仗”“李协报称藏蛮复集兵至溜筒江，截断溜绳，当即飭人迂道另设，命蒋委、黄弁率军过江，绕墨里村，蛮断木枫坚守”等战事指挥必另有其人，因为“蒋委、黄弁”并不统属“李协”。另外，在60米宽、水流湍急的澜沧江上重新架设溜索也非维西协防营所能。

故，将殷承瓚“并飞令前卫司令官分道扬镳，右窥里城，以为川军进窥里塘之声援；左攻盐井，以救川军坐困巴塘之危急”的电文演绎为《西征篇》：“殷司令前命李学诗为前卫司令，直趋盐井，……捷闻，殷司令急命学诗乘胜直捣盐井”的叙述，显然是狗尾续貂尾的嫁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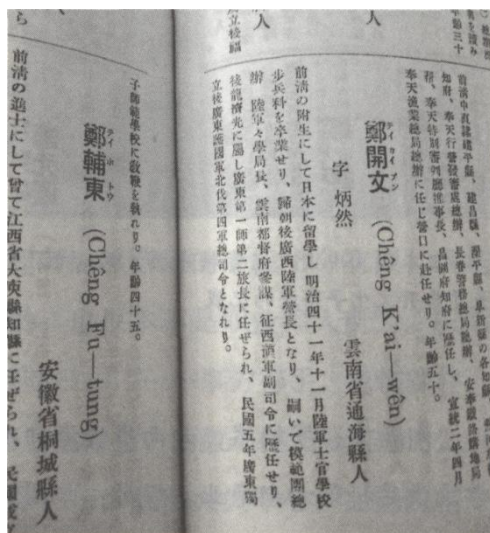
有一个因素值得考虑，那就是西征滇军出于对出征西藏军事行动的保密需要，采用了一些隐晦代号的可能。较为明确的凭据，有9月26日《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瓚电滇军退让敌军复来若川军不前就不可收拾请速示》电文：“（衔略）中密。据西征殷司令电称：9月养号（22日）接李学诗报告，我军克复盐井，声威壮甚，前军乘势进取，巴塘闻风解围，沿途良民欢迎，蛮匪遁去。因奉转中央命令，遵即退扎盐井，候川军自为攻战。”^[26]据《天南新报》登载消息，李学诗已于1912年9月18日调离西征滇军第一纵队，“马日（21日）离开德钦回维西”，接替西协防军第六营营长、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职务者为右纵队参谋刘钟俊。

梳理德钦前线指挥部与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通讯内容的脉络，有下述9月1日“东电”、10月10“蒸电”、10月19日“皓电”在列，表明与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电讯联络的仅有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其他人员肯定没有通联电讯的条件。亦不可能越级报告、处置军政大事，

不会出现“9月养号（22日）接李学诗报告”的情况。所以，该电文仍然称“9月养号（22日）据李学诗报告”，很明显，与前述各电文一样，“李学诗”就是一个代称而已。

据此，我们可以推定《西征篇》载有“殷司令急命学诗乘胜直捣盐井”等电文中“李学诗、学诗”的称谓，就是一个对外部宣布的代称而已，出于对滇军出征西藏军事行动保密的需要，以及云南都督蔡锷对滇军军事计划、军事意图的有所保留。其实，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因素，用“李学诗”“学诗”称谓替代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的军事行踪，就是将南京临时政府高级官员郑开文的名字隐去，以免引起袁世凯的忌讳，表现为蔡锷、郑开文早有对袁世凯其人的戒备之心。

1912年7-9月间，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当然从属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直接指挥，李部即便拥有先进的通讯设备，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瓚可以直接指挥第一纵队右纵队所属“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吗？或者，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可以越级向驻丽江西征军司令部报告军事进止吗？作为远征西藏的滇军指挥者殷承瓚、郑开文、姜梅龄等人均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职业军人，有较高的军事素养，深知组织好自己的军事班底，充分发挥各级指挥者、参与者的才能、智慧，事权相符，各司其职，才是战场取胜的法宝。战争环境下，西征滇军各级指挥员均以高度的责任感，严格执行省都督府、西征滇军司令部在战争初期拟定的援藏平叛战略和规划，各项军事进止均由前线指挥人员负责，所谓“将在外，令有所不受”，不可能也不需要殷司令官事必躬亲甚至越俎代庖，直接命令李学诗部的进止。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略谋划，各级指挥人员的配置，战争资源包括情报信息的取得，与上级领导乃至中央政府、友邻部队关系的通达、协调，武器装备、粮草的后勤保障，才是殷承瓚司令官最需要操心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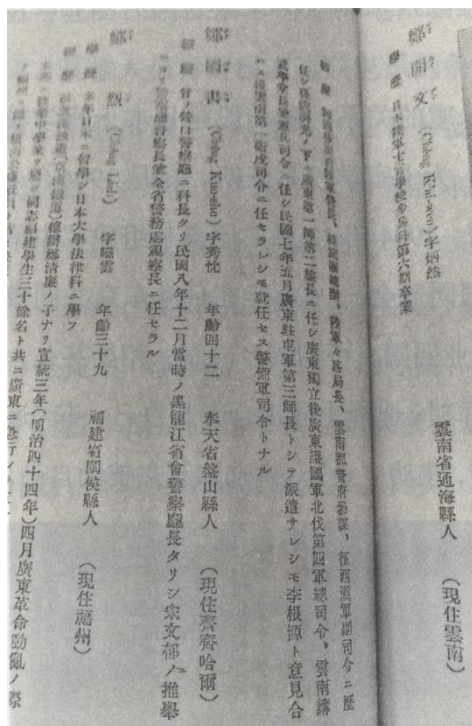


日本国《中国人名资料事典》第二卷，关于郑开文在日本留学至护国战争时期的事迹记载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郑开文与殷承瓚的关系。郑与殷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殷于1903年到达日本留学，为士官学校第五期。郑是1904年9月到达日本留学，为士官学校第六期。1904年12月共同参与组建“中华革命同志会”，1905年8月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在日本东京共同参与筹办《云南》杂志，1909年同期毕业回国。可谓同乡同学，相处甚久，知根知底。殷承瓚在搭班组建西征滇军时，选择志同道合者与自己一起“远征西藏，直捣黄龙”，只为“国事有济，建功立业”，挑选郑开文辅助自己，自然是不二选择。

笔者得到的一些历史资料碎片也有明确的指示。时任四川都督、西征川军总司令尹昌衡在《止园日记》中载有援藏平叛战争初期各地踊跃出兵征藏情况：

大总统袁公急甚，命川、滇、陕、鄂会师讨之，滇师长郑开文、鄂师长季雨霖、陕师长张钫，皆搜乘补卒，将发兵。^[27]



日本国《中国人名资料事典》第六卷，关于郑开文生平事迹的记载

国外文献资料也有这方面的记录。日本国北京支那研究会编纂《中国人名资料事典》第2卷（1918年）载有：

郑开文，云南通海人，前清附生，到日本留学，明治四十一年十一月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归朝后当广西陆军营长，嗣后任模范团总办。陆军军学局局长，云南都督府参谋，征西滇军副司令。后被任命为龙济光所属广东第一师第二旅长。民国五年广东独立后升任为广东护国军北伐第四军总司令等职。^[28]

日本国北京支那研究会编纂《中国人名资料事典》第6卷（1921年），载有：

郑开文，字炳然，云南省通海县人（现住云南）学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毕业。经历：归国后广西陆军营长、模范团总办、陆军军务局长、云南都督府参谋、征西滇军副司令等历任。后任龙济光所属广东第一师第二旅长。广东独立后（为）广东护国军北伐第四军总司令、云南陆军讲武学堂长兼宪兵司令等。民国七年五月，广东驻屯军第三师长，与派遣之李根源意见不合。后云南第一卫戍司令，就任联军警备军司令。^[29]

由上述资料得知，郑开文并非简单的一个基层指挥员，他在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担任“陆军部代理军学局局长”的经历不一定被他人熟知（这在当时是高度机密的）。但是他带领中央工作组到

云南，协助蔡锷组织北伐军和挑选南京临时政府警卫军的重要职责，使蔡锷深知郑开文在南京临时政府和中国同盟会的地位和作用。况且，郑开文与蔡锷在日本留学时就交往密切，回国后在广西编练新军时又同事多年，并歃血结拜为兄弟，熟知郑开文秉性忠厚，军事素养高，办事能力强，必然是蔡锷组建西征滇军的核心人物。

现在看来，西征滇军前卫司令官（前线总指挥）当然是统带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其部为混成旅的建制，在滇川藏界边所有的战事活动，出自郑开文的谋划、部署、指挥，直至身先士卒亲临盐井战场。

当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战场是喜马拉雅山南麓，高山大川、雪山峡谷、大江大河横贯其中的滇川藏交界处，驻丽江司令部与各部队都相距遥远，交通、通信又十分落后，指挥者能够营运的手段十分有限，现场指挥各支队伍的军事进止是不可能的，也根本不是职业军人所为。殷承瓚奉命撤军时，愤懑殊甚，迳电国务院曰：“……事方得手，忽飭驻井，忽飭还滇。……承瓚蝉脱一身，本可应机作息，而数千健儿分道远出，一瞬千里，何能操纵自如？在承瓚号令不一，既已大失军心；在钧院朝令夕更，亦恐有妨军政。”这话既有揽功自夸的嫌疑，且道出西征滇军在援藏平叛战争中战场开阔、战线绵长、通讯联络工具落后的无奈现状。

以现存的文档资料分析，殷司令出昆明后，途中仅有楚雄、大理、丽江等地可通有线电报，对先期入藏的滇军第一纵队的作战部署、左右纵队的分野、兵力人员的配备和战争进程均不知详情。出现这种状况的唯一解释，就是于1912年7月4日以“先遣队支队”名义先期出发的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在长途行军中，受制于交通、情报传递的限制，除在行军过程如大理、丽江与司令部可能有电报往来或通讯员传递的信息外，均没有得到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省都督府的指令，或者向上级汇报前方战场情况、请示机宜等，只能按照在昆明时议定的大致计划，由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参谋长姜梅龄自主完成攻占溜筒江、收复盐井和进军毕土、察瓦龙、左贡、波密的战场指挥，直至丽江与德钦的电报线路架设完毕，这段通信联络绝少的时间长达两月之久。郑开文与驻丽江司令官殷承瓚开始互通电文有记录的时间为1912年8月27日（参照下述郑开文致殷承瓚“东电”），可以作为一个间接证明。

上述论证，可以确定郑开文率西征滇军第一纵队以“先遣队支队”的名义，从昆明出征的时间是1912年7月4日，比西征滇军司令部、殷司令出发时间早18天，途中不可能与殷承瓚司令官相遇、交集，亦没有可能发生8月19日在丽江分拨为左右纵队的军事部署。故，《西征篇》称：“8月19日，殷承瓚率部抵丽江，随即作了如下部署：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及李学诗的西防国民军，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枪兵各一小队及杨汝盛的西防国民军，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司令部及其余各队暂驻丽江，相机进击。”是人为推设的，没有相关证据支持。

第四节 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殷司令官的三件电文

笔者采集到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在援藏平叛期间（1912年7-11月）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瓚的电文有三件，在军事部署、战役指挥和军政要务诸方面均有反映，说明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右纵队参加了盐井战役，并确切证明盐井战役的指挥者是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兼右

纵队队长郑开文。另外，从郑开文致电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的三件电文内容来看，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德钦前线指挥部与丽江司令部互通电文有多件，记载在案的有郑开文致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感电”一件；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致德钦前线指挥部郑开文“感电”一件、“阳电”两件，“鱼电”一件，则始终没有见闻于世，殊为憾事。

一、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璣“东电”

郑开文于1912年9月1日，由阿墩（今云南德钦县）前线指挥部致电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璣，汇报前方战场情况、请示机宜。全文如下：

西征滇军司令官钧鉴：

感电敬悉，前方善后事宜，（开）文既膺重寄，曷敢畏难。特先为布置妥洽如下：白井一切善后及前方、右侧方防堵，命李学诗担任。红井善后及前方、后方、左侧方防堵，命贾紫绶担任。致（至）谢昆山则命觉弄支路还驻，茶里凡、白井后方、沧江左侧防堵均责成之。似此责攸归前途，大可无虑。故拟即日束装来丽候令。再，红井克复之次日，佳打村、垂紫卡、金水顶各村均来投诚，风声所树，一日千里，支应乌拉价廉且速。所惜不能前进，诚为我滇军一大憾事。唯该井村内人民已畏罪悉逃，所余民房数十间，盐台数百个及上下、三四村之田地庄稼。拟广招徕发还原主，以彰我军大义。至战利品之概数及武器弹药之损耗另表报呈。又闻阿墩一带，该食喇盐价较红、白井约昂两倍。虽派有缉私兵勇，然山僻小径，万难禁川私偷入。顷查得滇属必庸功（今德钦县佛山乡必用功村）附近，盐水甚旺，可敌两井，共约需银一二千元即可开办。请乘此机会派员办理，一则可以富公，二则可以利民，三则可以禁川私（盐）而节缉私之兵费。事关至巨并奉闻。开文叩。东印。^[30]



郑开文致驻丽江司令官殷承璣“东”电，局部（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此电文表明：其一，此电文开头“感电敬悉”所表达的含意有两层。“感”是近代电报韵目代替日期，即“27日”。此处指1912年8月27日，即为收复盐井战斗结束的当日，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就收到盐井战役大捷的电文并立即回电，表现出欣喜之情以及对盐井战后布防的关切。实证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右纵队1912年8月26日夜袭盐井是真实发生的。当事人郑开文“由阿敦进攻红白盐井，血战数昼夜，相继克复，僧俗降者以千数、擒蛮官鲁宗甲约”的电文陈述，与当时曾经路过盐井的马某人说“盐井原有逆番二千余”^[31]的情报基本吻合。活捉大喇嘛宗鲁甲约及送往德钦拘押的事件，表明在政教合一的旧西藏，大喇嘛的地位相当于一个县级区域的主管，所带

领的民间武装有千人之众，也在情理之中。

其二，“前方善后事宜，文既膺重寄，曷敢畏难”一语，连缀读为“你既然把前线战事这么重要的事情托付我负责，我肯定不敢惧怕困难”的意思。“文”是郑开文的谦称，即表明郑开文受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殷司令官的重托并承担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援藏平叛战事的主要责任。这在上下级电报通联时，署名双方没有必要也不可能虚设自己的身份，可再次确认郑开文是此次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前线指挥者，也是德钦前线指挥部与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电报通联的收发报人。此电文中关于盐井战役善后事宜，包括各部队的防守区域、战俘处置、民族政策的实施、战利品的处置等，都是郑开文的分内事。而“又闻阿墩一带，该食喇盐价较红、白井约昂两倍。虽派有缉私兵勇，然山僻小径，万难禁川私偷人。顷查得滇属必庸功（今香格里拉市德钦县佛山乡必用功村）附近，盐水甚旺，可敌两井，共约需银一二千元即可开办。请乘此机会派员办理。一则可以富公；二则可以利民；三则可以禁川私而节缉私之兵费。事关至巨并奉闻”的内容，自然而然透露出郑开文以西征滇军前线总指挥的身份，统筹援藏平叛的前线战事，对作战区域内的军政事务、民生、战争资源的获取、分配以及战争进程的宏观把握，展现了郑开文所承担的战区军政事务的责任。

其三，此电文报告的西征滇军右纵队各部在盐井县区域的位置，大体上也是8月26日夜进攻盐井时的战斗序列。

“白井一切善后及前方、右侧方防堵命李学诗担任”，表明协防军李学诗部的战区、防区均在白盐井一带。白盐井位于盐井县城西北端的上盐井村（现存盐井天主教堂遗址附近），即李学诗部收复、防守的区域在盐井县城区外，处于西征滇军进略芒康的前沿。

“红井善后及前方、后方、左侧方防堵命贾紫绶担任”的布置，表明右纵队的主力是贾紫绶所属陆军步兵第一大队（陆军步兵大队为正规军），其作战区域和收复后的防区都是在红井，红（盐）井的位置在澜沧江东岸，是盐井县城所在。电文“再，红井克复之次日，佳打村、垂紫卡、金水顶各村均来投诚，风声所树，一日千里，支应乌拉价廉且速”，强调了右纵队主力部队克复的红盐井是盐井县行政、商业中心，是清剿叛乱分子的主战场。

“致（至于）谢昆山则命觉弄支路还驻茶里凡、白井后方、沧江左侧防堵均责成之似”，则表明参与攻击盐井战斗的边防军，即鹤丽总镇张贵柞所属独立步兵中队曾于26日夜攻击觉弄支路（今盐井镇觉龙村、岗达寺一带）。盐井战役结束后，郑开文收缩战线，将谢部调动至盐井靠滇界的一侧。

所以，郑开文“东电”所显示的右纵队所属各部的战斗序列，是以贾紫绶所属陆军步兵第一大队占据的盐井县城为核心，前沿芒康方向是李学诗协防军一营担任警戒、防守。右方（觉弄方向）、后方有谢昆山独立中队一部担任警戒、防守。而左纵队姜梅龄部在澜沧江、梅里雪山西侧毕土（今西藏碧土镇）的军事行动，担负了保障进攻盐井县城右侧滇军安全的功能。这个“前方善后事宜”的军事部署可谓是面面俱到，滴水不漏，充分展现了郑开文的军事指挥才能。

其四，此电文内容：“再，红井克复之次日，佳打村、垂紫卡、金水顶各村均来投诚，风声所树，一日千里，支应乌拉价廉且速。所惜不能前进，诚为我滇军一大憾事。唯该井村内人民已畏罪悉逃，所余民房数十间，盐台数百个及上下、三四村之田地庄稼。拟广招徕发还原主，以彰我

军大义。”表明“西征滇军是执行中央政府的命令而来，云南向来与西藏和平友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进藏平乱，是维护广大藏区民众利益的”。西征滇军严格的军容、军纪和新型军队的良好风范，以实际行动表达滇军决非“从前满清官吏，动辄需索，动辄剥削，动辄杀戮”。并以贴近藏族民众能够接受的方法，宣讲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声言：“全藏僧俗如真心共和，则我军所到之处，应代办当秣，支应乌拉，仍分别照市给价，决不轻取一物，妄杀一人。”所以，弭平骚乱后，西征滇军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措施，安抚民众，化解了滇藏矛盾，藏区社会安然如故，人民安居乐业，得到了广大藏族群众的拥护。

西征滇军在援藏平叛期间，着力贯彻执行孙中山先生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的宣言“中国版图内的一切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同享共和福祈，不得畸轻畸重”的国家政策，突出治理内乱是主要矛盾，是当务之急，应该通过动员、依靠该区域内广大农牧民，红、黄喇嘛、教徒及社会各阶层，团结在中央政府周围，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西征滇军左、右纵队“左右联络，分道并进，不经犁庭扫穴，直捣乌斯江畔，昌平佛地，绥靖边氛”。其间，左、右纵队行军路程达1000公里以上，军事力量抵达德钦以西，波密以东，昌都以南，察隅以北的广大地区，作战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大小战斗数十次，攻克要隘、堡垒数十座，村镇数百处，均没有发生斩杀过当、焚烧寺庙、毁损村镇的现象。每次战役之后，对于受胁迫、拉拢、裹挟在内的土司头人、少数民族乡民，只要放下武器，不坚持以武力与滇军抗争，经教育开导后均释放归籍。长期受到满清政府军事扩张与大民族主义政策的残害、旧绿营军队的乱兵骚扰以及西藏上层实行奴隶制度的严酷统治、英帝国主义的蚕食、侵略等多重压迫欺诈下的藏区民众，最能体会西征滇军这些仁义措施的好处，西征滇军赢得了藏区各界“仁义之师”的赞誉。

西征滇军单纯地执行中央政府“援藏平叛”的国防战略，在收复区域内没有试图推行改变西藏封建奴隶制度、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实，维持现有的宗教、社会结构不变。亦没有推行设官设治、改土归流等重大社会变革，以争取藏区社会上层、宗教领袖的支持，避免汉藏矛盾的激化。曾在藏地为官7年、深谙藏情的王久敬先生对当时的西藏当局作了这样的判断：清末民初西藏的“离叛”，“非真欲离叛也”，乃被逼于驻藏川军之劫掠烧杀。然而，“西藏之所以不宣告独立者，自知能力薄弱，脱离中国必然依赖外人保护，外人虽能负保护之责，然束缚自由、奴隶人民较之川兵之劫掠烧杀，痛苦尤甚”^[32]。这表明西藏地方政府对于英国政府居心叵测的“保护”实际上也颇有戒心。同时，来自西藏内部具有爱国主义情结的广大群众对西藏上层亲英分子的离心行为也产生了巨大的遏制作用。由于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历史上所形成的牢不可破的紧密关系，西藏亲英派上层想要结束中国内地对西藏地区的直接影响还“远没有获得西藏民众的一致赞成”。英国人曾说：“西藏虽亲（倾）向自主，尚不欲与其在政治上联合已久之中国完全分离”，因为“西藏之官吏僧侣人民中，有左袒护中国党”。在广大农牧民、僧侣教徒中，“吾等亦时时闻其盼望中国复来”。在西藏发生动乱之际，“藏人即喇嘛之一部分，皆暗通华人方面”，“或则接济华兵粮食”。由此看来，西藏地方政府及大多数藏族老百姓，并无分裂之意，对英帝国主义的蚕食、侵略西藏的野心，始终抱有警惕之心。

西征滇军官兵熟悉藏情，尊重藏民宗教信仰，驰往宣慰五族共和政策，维护藏区稳定安宁的举动，有力遏制了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图谋，符合广大藏族民众的共同意愿和利益，是人心所

向之举。从而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妄图利用民族矛盾、宗教问题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的狼子野心，最大限度维护了中华民族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如，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行军丽江时，就委聘丽江指云寺东宝仲巴呼图克图白玛赤列旺修为宣慰大法师，组织宣讲团，大力宣传民主共和的民族政策，协助北京政府传递恢复达赖喇嘛身份的信息，以排除亲英分子的干扰，为谈判维护国家主权的策略作出了贡献。

说一点题外话。即便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秉承尹昌衡“川军西入，急于御侮，缓于图利，故急趋昌、理之危，而缓取盐井之富。盐井无乱，人所共知，滇军直取，其意安在？今竟通电，意图永据，弃我旧义巧于窃利，夜郎自大，内衅擅开”^[33]的腔调，坚称当年西征滇军在盐井的平叛战斗是为了取“盐井之富”。某主编《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第90页中注释：

此说不确（指：盐井为滇军入藏门户，该地曾为丽江土司辖地）。盐井今属西藏芒康县，其地历史上本属川边。明末丽江土司曾一度占领，清代为巴塘土司属地。该地以盛产藏盐而名，其盐多销往滇西北和西藏昌都地区，每年利颇丰。巴土司派一“协教”（土司代表）常驻盐井之宗崖，管理征收盐税。赵尔丰改流巴塘后，将盐井分出置县。此时滇军争其地，实为盐利之故。^[34]

云南、四川均有丰富的盐矿资源，仅昆明附近就有安宁、一平浪、磨黑、禄丰等矿盐出产，足够人类使用数千年而不辍。盐井县产盐由来已久，其主产区为白盐井和红盐井，有“白盐白如雪，红盐红如血”之谓，白盐供人食用，红盐则用于畜牧业，畅销川滇藏边界地区。在战争倥偬之际，郑开文仍以关注国计民生的态度，实际解决井盐私运的问题。郑开文向省政府报告滇属必庸功附近（今德钦县佛山乡必用功村）“盐水甚旺，可敌两井”，曾由蔡锷直抵中央，北洋政府即时通令有关部门办理，亦是对“此时滇军争其地，实为盐利之故”的现场回应。

二、郑开文致驻在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琳“蒸”电

司令官钧鉴：

两阳电敬悉。退军援句已遵鱼电照办。唯占领红井之江（江映枢，副联长）刘（右纵队参谋刘钟俊）顷已回墩，面称种切，文思维数过，殊觉（棘）手，两井退军一节有三不可之理由，敢以质之钧部，愿熟察焉。盖自我军抵井，威德咸施，远近居民争相归附，自其甘结，愿永属滇，当即给予护照，俾遵信守。以致声威一日千里，昌多、江卡，争欲先降。乃不终朝弃如敝屣，是直以战攻为儿戏而失信于番民，一不可也。翁札公布狭勇善谋，虎视川军直如犬豕，特畏滇威远颺江卡，我军朝去彼必夕来附我。井民必遭屠戮，是我吊民伐罪而来，乃反以貽殃种祸而去，二不可也。白井民属焚毁无余，环顾群夷，无滋他族，势必铤而走险，蔓过红盐（井）祸乱牵缠，将无宁日。我军若退出井，株守边隅，我不患人而人患我，若遵守命令则火急燃眉；若攻击向前则有违军令。三不可也。且此次藏人于川恨入骨髓，指天誓日，绝不相容川人，欲独立撑持，可断定再限十年亦难平定。假战事稽久，难免中央不再命我军二次而讨。而我已一次失信于夷民，再来则断无有今日之顺手。失一时之机会，貽患害于无穷。此，（开）文所以负载长吁而不能自己。于言者也，如能应变顺时，一军驻守两井，保有天堑自卫边疆，迨川军抵井，然后交还。如该川不克奏功，复劳我旅，亦得长驱直入，敌无险之可凭，是一举而足以固边陲，昭民信睦邻交，且井可以质诸举国同人而无愧。可否转请都督，电达中央，照准施行。伏惟衡核，不胜企盼之至。

（开）文侯华（封歌）抵墩即同回甸，留边军事。皮棉衣速请解来。并闻。开文叩。蒸印。^[35]

“蒸”即为近代电报韵目代日的10月10日，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的电文，可以窥见统带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对援藏平叛整个战局的考虑和周密的谋划。电文中“退军援甸”是指由于袁世凯政府受制于英国政府的战争恐吓，无意因西藏事件而得罪英国人，采取委曲求全的政策，命令西征滇军、西征川军停止进略藏区，为谈判解决西藏问题创造条件。更因川督尹昌衡的干扰、破坏，令西征滇军无法执行援藏平叛的国防战略，只能退据滇边以自守。



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蒸”电（云南省图书馆馆藏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于1912年10月6日（鱼电），传达省都督府指令第一纵队撤出盐井、毕土、波密一线，固守滇边，并以击退乡城叛匪对中甸的进攻为下一阶段的主要作战任务。郑开文以军人的职业素养，当然无条件执行命令。但是作为前线指挥员，根据战场实际状况和对局势的判断，对此命令失误之处的意见还是要正常反映的，原因就是“唯占领红井之江（江映枢，副联长）刘（右纵队参谋刘钟俊）顷已回（阿）墩面称种切，（开）文思维数过，殊觉（棘）手，两井退军有三不可之理由，敢以质之钧部，愿熟察焉。”郑开文阐述的“盐井退军有三不可之理由”，可谓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不无先见之明，亦被尔后川藏界边反复纠缠的长年战争所证实，实属难能可贵。

“于言者也，如能应变顺时，一军驻守两井，保有天堑自卫边疆，迨川军抵井，然后交还。如该川不克奏功，复劳我旅，亦得长驱直入，敌无险之可凭，是一举而足以固边陲，昭民信睦邻交，且并可以质诸举国同人而无愧。可否转请都督，电达中央，照准施行。”此段电文充分说明郑开文对川藏两军军力以及川滇藏界边长期形成的矛盾有清醒判断。郑开文秉持援藏平叛以国家民族大业为宗旨，认为国防战守不能轻易发动，既然征战已动，亦不能无果而终。否则，若以战攻为儿戏，失信于他国，失信于民众，政府的权威何在？

西征滇军代表国防力量，在中国的国土上执行中央政府援藏平叛任务，由盐井、芒康方向进攻，援救巴塘守军，或由此线路向嘉玉桥、工布江达进略西藏，当是正确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国内省县界域的辖管区分让位于国防战守进止的需要，应该“有济军务”，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是袁世凯忌惮于英帝国主义的干涉，或内心本不愿意滇军进藏平叛，对蔡锷、殷承瓛、郑开文等人屡次提出明定滇川权限，区分滇川两军任务和进军路径的要求，置之不理。亦受制于地方利益的抵制，根本不顾战场实际情况，袁世凯忽命进藏，忽指援巴，忽令驻守盐井，忽令撤出盐井让川军占领。朝令夕改，出尔反尔，直至几千大军进退维谷，暴露其军事指挥的专业化水平太低，根本不具备从政治、外交、军事战略的高度去解决西藏问题的能力，将其一直标榜的“知

兵善战”的伪装被彻底揭穿。

三、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瓚“皓”电

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钧鉴：

窃以屯守威不立，则兵众如无，将不选则近防易弛。我前卫国民军布满，西防毫无教练，积习如盗，无可挽回，虽良将御之亦难收效。况使某某辈为之首领，是牛山之木，牛羊又从面牧之，鲜有不愈趋而愈下矣。确查该军在井种种丑态不可言传尔。盐井复陷时，乃深隐谷中、负险不出。蛮人日来挑战，辱詈百端，终于龟伏致蛮人丑诋之曰：“丽江兵与川兵虽千万人不足畏，驱之如犬豕耳。”似此防军只增笑柄，今日瓮水之败，不终朝而退至百余里，其覆轨不同出一辙哉。文身在前敌，洞悉边情，但有所知未敢缄默。窃以为留此无数腐劣无赖之群，徒糜饷糈，以貽国耻，何如一并撤回解散，专用陆军，只须一大队之驻军直可当数百营之防守。请以一中队驻葛浦桶，分扎羊渣、白汉洛、茨中等地。既可防边亦可保教堂。以一中队驻阿墩，分扎上、下阿董及人美等地。以一中队驻瓮水严防乡匪窜入。其余之一中队附以小炮二门与大队本部同驻中甸，以资策应。处常（长）则将分扎之兵一月一换，责成大、中队长督率教练，以保全陆军本色，遇变则势若常山，首尾互救。是不唯节省饷糈，化无用为有用，亦宜可威振边服，免国家远顾之忧。然如第某中队，习染已深，与巡防营同伯仲，拟请一并撤回，其一、二大队自可酌为留守也。至中甸厅及阿墩委员虽非新民之官，实具有亲民之责，虽无军队之任，却多补助之资。须以学识兼优、道德高尚者充之，方足以柔夷，还远共济，同谋若合。至阿墩委员某则旧习太深，粗鄙近利，兵粮之克扣斤头；乌拉之必争发价。士勇百名实不及半，从中渔利可见一般（班）。拟请速为撤去，另简能员。查有钧部高参谋荫槐，性质刚勇，学识俱佳，若以之为弹压委员，平时可望其整顿边事；战时可望其协同动作，是一举二得者也。夫中央官吏（不）易于检查边远人员，耳目不及，若不得人，百弊丛生，难保边夷不无反侧。我滇用行政动辄必资熟手，一若非满清官吏，即不足以胜其任者。夫以数十年老奸巨猾之徒为我新民国发政施令之举而欲望其旧习尽改，天良频生其可得乎。然操用人之权者不唯不挥之使去，尚且召之即来援。行同群口，积习如故，国名虽易而国事如昨，民国前途何堪设想。此又所以积忧于中，日魔病境，血潮胸腹，不能一倾吐者也。且维西协一缺无关痛痒，直若赘疣拟一并裁撤，以节经费。所呈各节是否有当，出自钧裁。管测之言尚期鉴纳，幸甚幸甚。开文叩皓（10月19日）印。^[36]

由于袁世凯政府听信尹昌衡“两军逼处，别生枝节”的惑言，遂于9月致电蔡锷，令滇军酌留陆军一大队及防军一、二营，专顾滇省门户，余悉撤回，滇军援藏平叛作战至此结束。进军难，撤军又何尝不难。从此电文来看，郑开文认为留守的将领和兵士必须精炼，不能以原边防、西协防军为主，提出了“专用陆军，只须一大队之驻军直可当数百营之防守。请以一中队驻葛浦桶，分扎羊渣、白汉洛、茨中等地。既可防边亦可保教堂。以一中队驻阿墩，分扎上、下阿董及人美等地。以一中队驻瓮水严防乡匪窜入。其余之一中队附以小炮二门与大队本部同驻中甸，以资策应。处常（长）则将分扎之兵一月一换，责成大、中队长督率教练，以保全陆军本色，遇变则势若常山，首尾互救。是不唯节省饷糈，化无用为有用，亦宜可威震边服，免国家远顾之忧”的计划，可谓周详精当。殷承瓚最终上报省都督的撤军方案中，显然大部分采取了此电文的内容：“除

撤省外，殷司令饬令扼要驻扎，其兵力配备如下：一、对于乡城、德格方面，防军则以张贵祚所统西防第五营之中哨、右哨及省防第二营之右哨，陆军则以贾大队长子绶所领之第四中队并炮兵一分队附轻炮一门驻中甸。二、对于红、白盐井、珞瑜、波密方面，防军则以刘钟俊所带西防第六营之中哨、左哨及第五营之左哨，陆军则以炮兵一分队附轻炮一门驻阿墩属之巴咪。三、对于扬渣、闷空方面，则以第六营之右哨分驻葛蒲筒、白汉罗一带，以贾子绶之第三中队驻维西，至贾大队本部及第一、第二中队均驻丽江，与中甸、维西遥为声援。防军归张贵祚节制，陆军归贾子绶节制，各负专责，以免互相推诿。”^[37]



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瓚“皓”电（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郑开文撤军善后安排的重要部分还在于挑选合适的官员担任“近筹藏事，远顾边务”的重任。“文身在前敌，洞悉边情，但有所知未敢缄默”，因为“至中甸厅及阿墩委员虽非新民之官，实具有亲民之责；虽无军队之任，却多补助之资。须以学识兼优、道德高尚者充之，方足以柔夷，还远共济，同谋若合”的重要责任，而原有官员“旧习太深，粗鄙近利”，不可能担此等重任，“至阿墩委员某则旧习太深，粗鄙近利，兵粮之克扣斤头；乌拉之必争发价；士勇百名实不及半，从中渔利可见一般（斑）。拟请速为撤去，另简能员。”“且维西协一缺无关痛痒，直若赘疣拟一并裁撤，以节经费。”建议挑选革命军人充任边务官长，“查有钧部高参谋荫槐，性质刚勇，学识俱佳，若以之为弹压委员，平时可望其整顿边事，战时可望其协同动作，是一举二得者也”。这个人事安排既是现实环境的特殊需要，显然也是郑开文有感而发。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全数以旧满清官僚、文人政客为治国理政的主体，形成“国名虽易而国事如昨”的局面。袁世凯篡改临时约法、终止国会等种种倒行逆施，无一不是以这些旧官员、旧文人政客的“民意”为基础，最终演变成“帝制自为”的复辟丑剧发生。这个以无数革命者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惨痛教训，促使郑开文等党人的深刻反思，选用什么样的人来行使民国政权已经是行政、建设事业的首要问题了。郑开文率南京临时政府工作组到云南后，对军督府蔡锷等人的用人、行政的倾向、某些作为非常不满，曾利用其与蔡锷的特殊关系和中央官员的身份，有所规劝，指出“我滇用人行政动辄必资熟手，一若非满清官吏，即不足以胜其任者”的做法是很危险的。让这些满清官僚、政客、文人来坐享革命党人浴血牺牲夺来的天下，重要行政、军事席位都由所谓有资历、声望者占据，寄希望于“夫以数十年老奸巨猾之徒为我新民国发政施

令之举而欲望其旧习尽改，天良频生其可得乎”，这不仅有碍于新政府的公众形象，而且不能达到“然操用人之权者不唯不挥之使去，尚且召之即来援”的基本要求。对今后国家政权的建设也大为不利，必然导致“行同积习如故，国名虽易而国事如昨，民国前途何堪设想”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郑开文的政治觉悟非同一般，他亲自参与推翻清王朝的浴血战斗、参与筹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对新兴共和国家充满深厚感情和忠诚。在军事、政务方面，自觉以民主共和思想理念为宗旨，重视考察、选用革命党人为各级政权的骨干，以提高执政能力和推进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他非常警惕清朝旧官僚对云南各级政权和社会各方面的侵蚀、渗透，亦对此非常担忧，“此又所以积忧于中，日魔病境，血潮胸腹，不能一倾吐者也。”

上述事例表明，在民国元年，虽然袁世凯推行各项政策、措施所表现出的反民主共和理念的举动初露端倪，孙中山、黄兴等领袖人物还在受袁世凯甜言蜜语迷惑的时刻，郑开文能够从政权建设，国防、边务长治久安的高度提出新生政权用人行政的实践与思路，表现出其对国家治理的大局观、人才观的远见卓识，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的政治素养和觉悟，已远超一般前线军政人员的视野和政治理论水平。

在西征滇军撤防的问题上，蔡锷与殷司令官、姜参谋长曾有一番争论，论争的焦点与蔡锷的思路有关。蔡锷在批复姜梅龄“营边开发、改土流官”为主要内容的营边计划时说：“……聘卿雅有办事才，而手腕殊嫌恢阔。正宜脚踏实地，缩小范围，不必骤升阶级，转多窒碍。”^[38]蔡锷此番话是针对云南援藏平叛后期滇边的安置情况所言，但是对民国初期解决川藏问题也有指导意义，即以国家新肇，稳固政权，快速转入社会、政治、经济建设轨道为治国理政的大政方略，而四面树敌，重开战端，增兵糜饷，陷入纠缠不清的外族、边境、民族事务中，最得不偿失。郑开文此“皓”电所表达的谋略，正与蔡锷的观点相合拍。

与之相对应的事例还有：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到达德钦后，袁世凯下令西征滇军由德钦出芒康，救援被藏军围困数月的巴塘顾占文部。但是四川都督、西征川军总司令尹昌衡则从川省利益出发，竭力阻止滇军进入川藏边，想方设法防范滇军介入西藏事务。滇军收复盐井后，尹再次电阻，并令顾占文、嵇廉部向盐井一带开进，与滇军争夺盐井。蔡锷则连电北京政府，以“早日规复西藏”为由，要求滇军仍继续向藏区进军。但由于通讯条件的限制，郑开文对此多变的局面并不知情，仍按照在昆明时拟定的西征滇军由怒江方向进军西藏的方案，形成对藏南和前藏的迂回包抄态势。这个军事部署显然有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把握全局，争取战略主动权的考虑，也有洞察上级领导的意图，结合现场情况全面贯彻执行其核心思想，并且措施落实到位，职责分解落实到人的安排，符合蔡锷援藏平叛的决策和战略意图。由此可见，郑开文对蔡锷相知相识是何等的默契。

第五节 申报《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 与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援藏平叛各战役的实施以及战绩

说到中国近代报纸的创办、发行，上海《申报》无疑有最显赫的地位，曾创下最早创办，发行量最大，发行时间最长等多个中国第一。如果要问哪个云南人最早在申报上发表文章，那就没有人说得清楚了。但是，1912年11月10日，上海《申报》刊登的“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却是云南人在民国元年发表的、最具有轰动效果的长篇电文。“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标注发

往参议院、蒙藏事务局暨京津各报、省议会及云南各大报纸，这无疑就是一篇传播全国的通电，事关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进展，呼吁将盐井县划为滇省暂时管辖的利弊陈述。目的是“祈主持公道，或提为议案，补助中枢，以期见诸施行；或发为社说，唤起国民舆论，藉作对外方针”，署名为统带西征军联长郑开文，参谋长姜梅龄。电文发送时间是1912年10月22日，发报地点是云南省德钦县。这些要素表明电文是来自蛮荒绝境的雪域高原、战斗在援藏平叛第一线将士的现场报道和声音，成为民国元年最具冲击力的热点新闻，其新闻价值和震撼力不言而喻。

上海《申报》“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全文如下：

参议院、蒙藏事务局暨京津各报、省议会及天南、华南、振华、云南各报馆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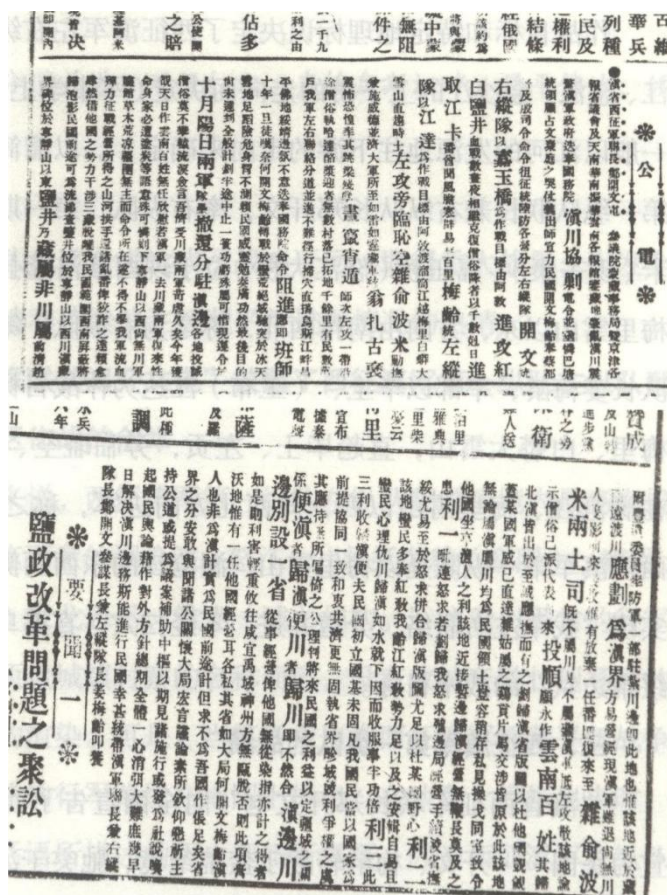
藏事肇乱，滇川震警，滇军政府迭奉国务院“滇川协剿”电令，并垂怜巴塘统领顾占文秦庭之哭，仗义出师，宣力民国。开文、梅龄奉蔡都督及殷司令命令徂征，统陆、防各营，分左右纵队。开文统右纵队，以嘉玉桥为作战目标，由阿敦进攻红、白盐井，血战数昼夜，相继克复，僧俗降者以千数。克日进取江卡。番酋闻风胆寒，辟易数百里。梅龄统左纵队，以江达为作战目标，由阿敦渡溜筒江越梅里、白蟒大雪山，直趋毕土、左贡，旁临耻空、杂俞、波米，剿抚兼施、威德并济。大军所至如雷如霆，藏军统酋扎古褒震怖恐惶，率其跳梁残孽，昼窜霄遁。师次左贡一带，沿途僧俗执哈达酪浆迎者无数。村落已拓地千余里，有民数万户。我军左右联络，分道并进，不难径行扫穴，直捣乌斯江畔，昌平佛地，绥靖边氛。不意迭奉国务院“命令阻进，应即班师”，十年一旦徒叹奈何。开文、梅龄转战于蛮荒绝境、驰突于冰天雪地，足蹈险危，身冒不测。赖民国威灵，勉奏肤功，然最后目的尚未达到，全般计划半途中止，一篑功亏，殊为可惜。现遵令于十月阳日（10月7日）两军队垒撤还，分驻滇边。各地投诚僧俗莫不攀辕流泪，金言吾情：受川藏两军苛虐久矣，今年复见天日，作云南百姓，无任欣慰。若滇军一去，川藏两军复来，性命身家必遭涂炭等语，意殊可怜。刻下宁静山以西，尚无川军。草木荒凉（边）疆无主，而命令所在逐不得不将我军流血捍力征战经营所得之山河，拱手还诸乱番，俾狡诈之达赖愈肆然藉他国之势力干涉三藏说，我民国范围、西南屏障将归为泡影，民国前途可为流涕。

查盐井位于宁静山以西，川滇界位于宁静山以东，盐井乃藏属非川属。前清赵尔丰遣委员率防军一部驻扎川边即此地也，惟该地近藏而远渡川，应划为滇界，方易管经。现滇军虽退，尚无川人只影前来接收，惟有放弃一任番匪复来。至杂俞、波米两土司既不属川也不属藏。滇军抵左贡，散该地谕示，僧俗已派代表前来投顺，愿永作云南百姓，其归北滇皆出于至诚，抚而有之。划归滇省版图以杜他国覬觐，盖某国军威直达属之鹤贡、片马，交涉皆于此。该地无论属滇属川均为民国领土，蚩容稍存私见，操戈同室致令他国坐享渔人之利。该地近接滇边，归滇经营无鞭长莫及之患，利一。毗连怒求，若划归我怒求殖边局经营，手续凌省，抚绥尤易。至于怒求并合归滇版图，尤足以杜某国野心，利二。该地蛮民多奉红教，我沿江红教势力足以及之，安抚自易。蛮民心理仇川，归滇如水就下，因而收服事半功倍，利三。此三利收归滇便。夫民国初立，国基未固，凡我国民当以国家为前提，协同一致，和衷共济，更无固执省界畛域、见利争权之虞。其应持无所偏倚之公，理判将来民国之利益以定疆域之。系便滇者归滇，便川者归川，即不然，合滇边川边别设一省，从事经营，俾他国无从染指，亦计之得者。如是，则利害轻重攸往咸宜，禹域神州方无瓯脱。否则，此项膏沃地惟有一任他国经营耳，各私其省如大局何。开文、梅龄滇人

也，非为滇计，实为民国前途计，但求不为吾国作侏足矣，省界之分安敢与闻。诸公关怀大局，宏言伟论素所仰慕。祈主持公道，或提为议案，补助中枢，以期见诸施行；或发为社说，唤起国民舆论，藉作对外方针。总期全体一心，消弭大难，几早日解决滇川边务。斯能进行，民国幸甚。

统带滇军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参谋长兼左纵队长姜梅龄叩养^[39]

此电文思路清晰，文笔通畅优雅，所表达的国防理念、军事韬略谋划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准，表明郑开文、姜梅龄虽“侧身戎间”，但绝不仅仅是一个有勇无谋的边塞军人，更是超出普通国民对民国军人“只知服从命令，行军打仗”的认知。郑、梅的举动可谓挥剑所指：“番酋闻风胆寒，辟易数百里。大军所至如雷如霆，敌酋震怖恐惶，率其跳梁残孽，昼窜霄遁”；握笔行文，惊动朝野，直抵中枢，“或提为议案，补助中枢，以期见诸施行，或发为社说，唤起国民舆论，藉作对外方针”。展现了革命党人兼职业军人的崭新风貌，这在云南甚至于全国，亦是凤毛麟角。



在郑开文致上海申报《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上、下（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图书馆史料，《申报》影印件）

该电文再次揭示的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援藏平叛各战役的实施以及取得的辉煌业绩，无疑是西征滇军前线指挥员的亲身经历和历史现场的第一手材料。

一、关于西征滇军分拨左右纵队的军事部署

此电文落款“统带滇军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参谋长兼左纵队长姜梅龄”，再次明确无误地表明此战斗系列的真实性，即郑开文率西征滇军第一纵队以“先遣队支队”的名义于1912年7月4日从昆明出发，行军路线是由昆明——大理——丽江——维西（中甸）——德钦，在德钦县城设第一纵队前线指挥部，分为左、右纵队进击西藏。

二、关于左、右纵队长的称谓

作战目标和特定地理标识决定了西征滇军左右纵队的区分，不以澜沧江、怒江、金沙江的上下游的走向而决定（军事学上定义军事目标方位时，一般以江河的发源地往下游的走向来确定）。以溜筒江（村）为参照点：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率右纵队，第一期作战目标为盐井、江卡（现芒康）、嘉玉桥（怒江大桥，位于现西藏洛隆县附近），均在澜沧江、梅里雪山以东，方向由南指西北，称之为右纵队。第一纵队参谋长兼左纵队长姜梅龄，率部以毕土、（工布）江达为作战目标，由阿敦渡溜筒江越梅里、白蟒大雪山，直趋毕土、左贡，旁临耻空、杂俞。其作战区域均在澜沧江、梅里雪山以西，向西北方向进军，称之为左纵队。清晰表明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是以梅里雪山、澜沧江的东西两侧划分为左右两纵队，实现“我军左右联络，分道并进，不经扫穴，直捣乌斯江畔，昌平佛地，绥靖边氛”的战术目标。

三、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的战绩

“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向全国宣告了西征滇军“仗义出师，宣力民国……开文、梅龄转战于蛮荒绝境、驰突于冰天雪地，足蹈险危，身冒不测”的援藏平叛历程。第一次向全国人民详细介绍了西征滇军的作战过程和取得的战绩：

开文统右纵队，以嘉玉桥为作战目标，由阿敦进攻红、白盐井，血战数昼夜，相继克复，僧俗降者以千数，克日进取江卡。番酋闻风胆寒，辟易数百里。

梅龄统左纵队，以江达为作战目标，由阿敦渡溜筒江越梅里、白蟒大雪山，直趋毕土、左攻（贡），旁临耻空、杂俞、波米，剿抚兼施、威德并济。大军所至如雷如霆，藏军统酋扎古裹震怖恐惶，率其跳梁残孽，昼窜霄遁。师次左贡一带，沿途僧俗执哈达酪浆迎者无数。村落已拓地千余里，民众数万户。

我军左右联络，分道并进，不经扫穴，直捣乌斯江畔，昌平佛地，绥靖边氛。

西征滇军左右纵队分道合进达成了战略迂回，取得重大战果，引发全国人民自豪奋发的感情和持续关注援藏平叛进展情况的热情。

四、“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披露了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左纵队翻越梅里雪山北坡至藏区作战的创举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左纵队翻越滇境内最高海拔的梅里雪山，渡过湍流不息的澜沧江、怒江，“师抵杂瑜（察隅）、察陇、波密各要隘，（叛军）投戈恐后，推赤（诚）如初。”这看似平常的行军路程，可能只是一些陌生城镇村寨的名称而已，没有攻城夺隘壮烈场面的描绘，没有血肉横飞的渲染。可是，当笔者在追溯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战争进程时，将左、右纵队的行军路线在地图上标出，在沙盘上模拟出来时，却被这些线条、简略话语所描述的历史现场所震慑，因为西征滇军左纵队翻越梅里雪山到达毕土、察瓦龙、左贡、波密，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路！大部分区域仍然是无人区！西藏察隅县、波密县均在梅里雪山、怒江以西，百年前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左纵队从德钦县渡溜筒江翻越梅里雪山、白茫雪山到达西藏毕土、左贡、波密，实在是不可思议的远征。

梅里雪山（太子雪山）是藏族人民心目中的神山，是众神居住的圣地，梅里雪山最高峰卡瓦

格博峰海拔 6740 米，终年白雪皑皑，更是众神之神，自古以来备受藏民的崇敬和膜拜。相传梅里雪山是藏传佛教莲花生大师在禅定中预言的胜乐金刚佛二十四胜地之一，由元代佛学大师噶玛巴西活佛(1204—1283)发现并指点给世人的无与伦比的圣地。从那时起，世世代代的藏传佛教信徒，都要在一生中，至少要去梅里雪山朝拜绒赞卡瓦格博峰一次，焚香煨桑，祈祷膜拜。因为，虔诚的藏传佛教信徒相信每个人的一生要承受六道轮回之苦，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免除，其一是修炼成活佛，这很困难。其二就是转经，他们相信绕神山转经可以洗清一生的罪孽，可以在轮回中免遭堕入人间地狱，甚至脱离六道轮回，来世成佛。执着的信念、美好的梦想，促使朝圣者们源源不断地到梅里雪山转经，世代传承，绵延千年。

转经之路往往山高水远，风餐露宿，异常艰难困苦，只有虔诚、勇敢的人才能完成这条沟通梦想天堂的道路。尤其是那些一步一拜，五体投地的藏传佛教信徒，他们不惜千里之远，硬是用自己的身体，匍匐于大地，丈量着漫长的朝圣之路。据报道，地处四川阿坝地区的藏传佛教信徒，用一步一拜五体投地的方式，去岗波仁齐转经一次，需要 2~3 年时间。这超凡脱俗的精神寄托，执着的信念，羽化为生命的向往、生命存在的意义，令所有见到的人都无不感慨万分。

著名的梅里雪山转经活动有外转经和内转经之分。内转经的路线是由德钦一飞来寺一西当村一下雨崩村一明永一上雨崩村一西当村，路程约 100 公里，一般需要五至七天时间才能走完。外转经的路线大致是德钦一云岭乡一永是通（海拔 3350 米）一多克拉垭口（4373 米）一子数通（又称咱俗塘）（海拔 3360 米）一曲南通（2560 米）一曲珠（海拔 1760 米）一察瓦龙（扎那）一瓦堡村一格布（2474 米）一龙西村一来得（海拔 3040 米）一说拉垭口（海拔 4815 米）一梅求补功一梅里水一飞来寺一德钦。外转经路程约为 200 公里，一般需要十至十五天时间才能走完。居住在西藏左贡县以西的藏传佛教信徒来梅里雪山转经，往往不走芒康一盐井一德钦线路，而是走澜沧江以西的茶马古道，即从左贡一扎玉一俄比一沙瓦一卡尼——然米一俄通一毕土——甲郎村进入梅里雪山外转经环线。山路虽然陡峭难行，还要翻越十几座雪山，但相比较走芒康、盐井线路要近一百多公里。

当年西征滇军左纵队从德钦县溜筒江村到达毕土、左贡，正是从梅里雪山外转经环线的逆时针方向，用现代版本的中国地图来标注，即由溜筒江村至梅里石，溯梅里水河至扎西牧场，翻越削拉（说拉）垭口至来得村，抵达龙西村附近，分成两路：一路沿玉曲（又称伟曲，曲是藏语中河流的意思）向北到甲郎、毕土至左贡，路程约 220 公里，行军时间约需 12 天。另一路则由龙西村一格布一察瓦龙（闷空），然后大致走现在的察瓦龙一察隅线路，到达察隅，路程约 300 公里，时间 15 天左右。

因外转经路线时代久远，其中很多城镇村寨的名称大多使用了当地民族语言称呼，再加上各站点间距离较短，范围较小，很多仅有几户、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即便在大比例尺的地图上都不能标出，导致西征滇军进军路线中的地名根本不可能在地图找到具体位置，更不可能完全与当今的地名进行对照定点。笔者遍寻有关的地方志及地名辞典，一些采用藏语、纳西语或珞巴语译音的地名仍未获详解。（民族语地名的翻译、定点需要长期、详细的实地调查和考证工作才可望确定，诸多难处，显然不是笔者所能深究的，如有错、漏之处敬请见谅）幸运的是，尽管百年后沿线城镇、村寨名称的读音、译音、汉藏文字的书写发生变化、多样化，如“拉”和“腊”都表示

汉语的“山”。“扎”“杂”“咱”经常混用。但是西征滇军进藏路经的主要城镇村寨的地名仍然保留少许痕迹，借助于滇、藏历史古籍记录的脉络，依稀可以辨认。如碧土：原称毕土、必兔。察隅：原称杂俞、杂输。波密：原称波米。察瓦龙：原称察陇、擦瓦陇、茶瓦龙、擦哇线。扎西村：原称杂西村。甲郎（藏语的意思是通往汉和印度之地，显然是茶马古道上一个标志性地名。）：原称甲朗、甲浪。扎玉：原称扎夷、扎乙滚、咱玉。昌都：原称喀木、察木多。芒康：原称江卡、天柱寨、天竺。芒康的藏语发音：马尔刚，与汉语芒康的发音相近。墨里：现称梅里、古称梅李树。等等。



清末时期滇藏川边地形示意图。转载于任乃强《西康途经》中插图（来自网络）

饶有趣味的是，指点迷津的竟然是笔者的老乡——上海青浦人杜昌丁，其在 300 年前就走过这条线路，并留下详尽的记录。杜昌丁在《藏行纪程》中记录“德钦—溜筒江村—甲朗—扎夷—左贡——崩达（邦达）—洛隆宗”的线路，是现存古籍书库中最早向外界报道这一进藏线路的作者。实际上，在杜昌丁之前，这条进藏的转经之路、商旅繁忙的茶马古道早已开辟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杜昌丁绝对不是第一个翻越梅里雪山进藏的人，却几乎可以认定是第一个翻越梅里雪山进藏，并且留下清初滇藏地区珍贵地理文献的上海青浦人。听听这位我侬（青浦俚语：意为我们的，我的）青浦乡亲在 300 年前报道滇藏边地的亲身感受：

山景：阿墩子（今德钦县）附近的白金芒山（白马雪山），“九月积雪，次年六月始消，七八月之间，旋风如水，寒气彻骨，人升高气喘，口鼻迎风不能呼吸，辄僵不苏，土人谓之寒瘴。一至山顶，黄云四起，五步之内，不复见人，高声言笑，即有拳大之雹，密下不止，人亦多毙焉。”

山路：“巉岩怪石，嶙嶙率男，无一步可以循阶历级者，用（似）爬山虎攀藤附葛而上，马四蹄不能并立。毙者不计其数，臭气触鼻，不可向迳。无草无人烟，水声彻夜如雷，树木参天者，告（酷似）太古物也”。“路只尺许，连折式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山）高插天，俯视山下，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经）历。”

山间气候：这里气候严寒，二分之一途程的路况较崎岖，其冰冷的土层下掩埋过众多因风寒劳顿而倒毙的兵丁及运输粮草的马牛的尸骨。兵多道死雪坝山中，白骨累累。下雪山，道甚泥泞，

死马塞途，无下足处。如木高《破虏歌》铭文中所说的境界：地寒六月冰雪冻，风烈三秋雪雨迷。雪片如手雨帘幕，风吹如箭冰凝路，冰路倾沙牛马行……

在经过阿墩子溜筒江溜索桥的记述中，九死一生的惊险也略见一斑：

平时无桥，藏民、往来商旅、马帮只能这样过江：土人系竹索于两岸，以木为溜，穿皮条缚腰际，一溜而过，所谓悬渡也，俗名溜筒江。

花费数月时间搭建的简易江桥：桥阔六尺余，长五十余丈，以牛皮缝馄饨（似馄饨状的渡船）数十只，竹索数十条，贯之浮水面，施板于上，行则水势荡激，掀播不宁。盖江在大雪山之阴，雨则水涨，晴则雪消，故江流奔注无息时。舟筏不能存，桥成即断。

时畏竹索之险，故俟桥成，是日已刻，水高桥二尺余，波浪冲击，蒋公几至倾覆，赖刘牧扶掖得免。余虽不致倾跌。而水已过膝，过片刻，桥即冲断，堕水三人，一以足指挂索得生，余则无从捞救矣。

进藏的具体路线：

自中甸进藏有两路，由卜自立、阿墩子、擦瓦、崩达、洛龙宗一路，高坡峻岭，鸟道羊肠，几非人迹所到，然颇近，五公凯旋所由，遂定走阿墩子。

廿九日，又上二十里，山皆在足下……自此而西，山势层叠而下，直至拉撒（拉萨）。……东浪沧，西怒江……山巅晴时盖少，遥峰积雪，冬夏无异。四月至八月，仅消大路之雪，九月以后即封山矣。……闰六月初一日，至于甲浪，始有人烟。廿五日，至崩达，地苦寒，近雪坝，岁止一收。……廿八日崩达添雇牛马启行，自此以西，五百余里无人烟。行六十里，其寒盛夏如隆冬，不毛之地名雪坝，山凹间有黑帐房，以牛羊为生，数万成群，驱放旷野。^[40]

2014年11月，笔者看到当地政府在溜筒江桥边设立的“茶马古道梅里段”石碑，清晰说明，翻越梅里雪山到达西藏左贡县的线路，因茶马古道的商旅活动、唐代以来军事扩张活动和转经等宗教、文化活动的盛行，早已存在。

另据古籍记载，历史上滇藏之间，中国至缅甸、印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物资、文化交流大道，世称“茶马古道”或“汉代南方丝绸之路”。明代历史学家谢肇淛撰《滇略》就曾描写过这条繁华通衢：

永昌、腾越之间，沃野千里，控制缅甸，亦一大都会也。山高水深，饶竹、木、鱼、豕、鹿、虾之利。其人僂巧，善制作，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丝、什器、布厨之属皆精好，甲他处。加以诸夷所产琥珀、水精、碧玉、古喇锦、西洋布及阿魏、鸦片诸药物，辐辏转贩，不胫而走四方。其习尚渐趋华饰，饮食宴乐。谚谓永昌一日费三百石酿米，亭午以后，途皆醉人，此其弊也。

由此见，内地与藏区政商交流、茶马古道的商旅活动、民族迁徙和藏区民众的宗教活动，以及元、明、清各代的军事征战，都有从德钦翻越梅里雪山到碧土、左贡的记录。

近几十年间，转经者、驴友、探险者也不断地进入这一线路，提供了较为详尽的报告。云南陈保亚、木霁弘等人沿着历史线索，从1988年至1991年，对分布在滇、藏、川的茶马古道进行

了大规模考察。尤其是1990年7—9月的考察，步行2000余公里，对滇、藏、川主要的“茶马古道”进行了翔实的实地考察。报告说：

我们发现，茶马古道在时间和空间上比我们预料的要宏大得多，是亚洲大陆上庞大的、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由云南中甸、西藏昌都、四川康定构成的三角地带是茶马古道网络片布最为密集的地方，马帮出没也最为频繁。往返中甸与昌都的两条主要古道是：

1. 中甸—梅里雪山—甲朗—碧土—扎玉—左贡—邦达—昌都。
2. 中甸—乡城—德荣—盐井—芒康—左贡—邦达—昌都。

因为滇藏接壤地区的特殊地理环境和当时的科技水平、生产力所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的214国道，遂改变线路由中甸、德钦沿澜沧江过盐井至芒康，与川藏318国道汇合后向西延伸至左贡，波密、工布江达、拉萨。新中国成立后修建的第二条云南至西藏的公路，则是溯怒江西北方向进藏，即闻名遐迩的“丙察察路线、丙察左路线”，由云南丙中洛经察瓦龙到察隅县，称之为“丙察察线”。由云南丙中洛经察瓦龙到左贡县叫“丙察左线”。至此，由溜筒江村、梅里村翻越梅里雪山直达西藏碧土镇的线路，因为山路过于险峻，常年冰雪封山，且不可能通行车辆，终被弃用。苍生有幸，梅里雪山因人迹罕至得以保留其原始状态，遂以路径绝险，风景绝美而闻名于世，成为资深驴友、摄友、转经者、探险者们的最爱。

据笔者实地考察，《藏行纪程》记录的行军路线与西征滇军姜梅龄部行军线路大致相同，即西征滇军左纵队的具体路线是德钦—溜筒江村—格达拉长—亚贡—梅里石—扎西牧场—削拉（说拉）垭口—来得村—龙西村—甲郎—沙瓦—碧土—扎玉（扎夷）镇—左贡县（碧土镇至左贡县现有编号为X653乡道），全程约200公里，步行时间需10天左右。

梅里雪山区域复杂多变的气候及江河纵横、山高水长的自然地理状况，只能是承载少量人马通行、不定时的小型交通线。对数以千计的西征滇军来说，欲通过这样的险境，无异要承受巨大的困难和风险。郑开文、姜梅龄所率部队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在不可能翻越梅里雪山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以短时间、低战损率的代价，成功翻越梅里雪山，实现了从梅里雪山西侧进入藏区的战略迂回，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战例。

忽然想起法国拿破仑将军1800年的马伦哥战役，一场与滑铁卢战役同样经典的大战，出奇制胜的绝招就是在不可能翻越阿尔卑斯雪山的情况下，法军穿越8110英尺（海拔2471米）大圣伯纳德山口和6590英尺（海拔2000米）辛普朗山口，实现了翻越阿尔卑斯山从背后攻击意大利北部奥军的战略迂回。笔者也曾在冬天穿越阿尔卑斯山，在铁力士雪峰上体验雪峰耸立，冰封雪盖，寒风刺骨的绝境。感觉还是没法与滇藏地区广袤无垠的雪山冰峰，严寒缺氧，江河交错，峡谷幽深、道路险峻的复杂状况相攀比。穿越大圣伯纳德垭口的路程不过十多公里，海拔不足2500米，除了需要运送大炮和兵力输送规模较大外，与西征滇军翻越梅里雪山等十多座雪山，路程长达200余公里迂回包抄的战术相比，真不是同一个数量级别。

西征滇军百年前翻越梅里雪山的创举，堪比法国拿破仑将军的马伦哥大战，然而，在百多年的时间长河里，皆因为梅里雪山地理环境的隐秘，道路的艰难险阻；更因为《西征篇》粗疏遗漏的报道，限制了人们的想象，竟然不曾引起云南历史学家、军事学者、文学家、诗人们的关注和

赞叹，没有发出轻微的叹息，被遗忘了，湮没了……

五、“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对抵御外国势力侵略西藏的军事、地缘的战略部署

《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以国家利益、国土安全、社会稳定等国防大计为考虑，从援藏平叛的大局，提出解决川滇边务的具体方法。呼吁将盐井县“划归滇省版图以杜他国觊觎”，是因为该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抵制英国蚕食滇藏领土的前沿阵地，“盖某国军威直达杂姑属之鹤贡、片马，交涉皆于此”。从历史和现状的角度来看待省界划分问题，阐述其国防军事的进止，当由国防、军事目的所决定，自然是无省界族群之别的观点：“查盐井位于宁静山以西，川滇界位于宁静山以东，盐井乃藏属非川属。前清赵尔丰遣委员率防军一部驻扎川边即此地也。惟该地近于藏而远渡川，应划为滇界，方易营经。现滇军虽退，尚无川人只影前来接收，惟有放弃，一任番匪复来。至杂俞、波米两土司既不属川复不属藏焉。滇军抵左攻（贡），散该地渝示，僧俗已派代表前来投顺，愿永作云南百姓，其归北滇皆出于至诚，抚而有之。”呼吁在国家领土问题上，川滇不应该争持私见：“该地无论属滇属川均为民国领土，蚩容稍存私见，操戈同室致令他国坐享渔人之利”“夫民国初立，国基未固，凡我国民当以国家为前提，协同一致，和衷共济，更无固执省界畛域、见利争权之虞。其应持无所偏倚之公，理判将来民国之利益以定疆域之关系，便滇者归滇，便川者归川。既不然，合滇边川边别设一省，从事经营，俾他国无从染指，亦计之得者。如是，则利害轻重攸往咸宜，禹域神州方无瓯脱。否则，此项膏沃地惟有一任他国经营耳，各私其省如大局何。开文、梅龄滇人也，非为滇计，实为民国前途计，但求不为吾国作伥足矣”。所以，郑开文此电文基于滇川藏历史和现状的陈述是言而有据的，出于国家防务和援藏平叛战事的需要，令人信服。

其实，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平定内乱的问题上，国内省县界域的辖管区分让位于国防战守进止的需要，应该“有济军务”，这显然是毋庸置疑的道理，古今中外有之。郑开文所论证的滇川边务事由，包括中甸、盐井、巴塘、理塘区域，200年前就曾经发生区域辖分应“有济军务”的案例。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王朝在防止准噶尔部落吞并西藏的征战中，由青海、四川、云南三路出兵藏卫，防堵准噶尔部落的侵扰。四川总督年羹尧进略巴塘、里塘，“宣示圣主恩威，招抚投顺”，暂时统辖云南中甸地区。由此，云贵总督蒋陈锡奏报朝廷，要求“将附近中甸地方，及巴塘、里塘，仍归丽江土府管辖”。《清康熙朝实录》第287卷对此议题的处理结果有详细的记录。对于云贵总督蒋陈锡的奏报，议政大臣等议复并经康熙批准：

云南贵州总督蒋陈锡疏言：中甸地方，原系云南丽江土府所属，吴（三桂）逆背叛时割赂西藏。今巴塘、里塘虽经四川招抚，而中甸一带，距蜀甚远，附滇最近。尚有钱粮在丽江完纳，非四川旧属也。兹据丽江土知府木兴详报，中甸等处番目及喇嘛、营官，到丽江投诚，愿仍归云南管辖。应如所请，将附近中甸地方及巴塘、里塘，仍归丽江土府管辖。从之。

可是没过几天，四川总督年羹尧奏报：“巴塘、理塘地方，虽归蜀归滇，莫非王土。但四川现在用兵，一切运粮调遣之事道经巴塘、里塘，关系紧要。拨归土司则呼之不应，移咨滇省则往返迟延。请仍归四川管辖，有济军务。”为由，请求朝廷仍维持四川管辖。对于四川年羹尧的奏报，议政大臣等同样议复并经康熙批准：

四川总督年羹尧疏言：巴塘、里塘地方，近经云贵督臣蒋陈锡，奏请归丽江土知府管辖。臣查巴塘、里塘，向为西藏侵占，臣宣示圣主恩威，招抚投顺。虽归蜀归滇、莫非王土。但四川见在用兵。一切运粮调遣之事，道经巴塘、里塘，关系紧要。拨归土司、则呼之不应；移咨滇省，则往返迟延。请仍归四川管辖，有济军务。又准都统武格咨称，云南进藏兵丁，须接运三月口粮。云南山高路狭、艰于运送。请以四川所运之米支給。查滇蜀两省俱各进兵。而蜀省进兵七千，滇省进兵三千，多寡悬殊。恐蜀省所运之粮，不足供滇省之用。应如年羹尧所奏，行文云南督抚，将云南进藏兵粮速行趲运。如武格等所领之兵与噶尔弼兵会后，或云南运米未到，仍暂拨四川余粮支給。即于云南所运米内，照数补还。其巴塘、里塘地方，应暂归四川统辖。俟事平之日，再照原议，改隶云南。从之。^[41]

由此上疏可见，皇帝也是人，谁的实力强，自然所言便有理。巴塘、理塘地方属川属滇，莫非王土，以国家利益大局为本，以“有济军务”为责，算是解决了此次川滇边务的纠纷。虽然事后年羹尧凭借着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的功绩，成为康熙皇帝在西北诸省的心腹大臣，不仅威镇西北，还授予其巨大权力，在其管辖区域内，无论文武官员的品级大小，全部按照年羹尧的意见来加以任免。这样炙手可热的权势，年羹尧自然想起川滇边务问题上作梗的云南官员，趁势将云贵总督蒋陈锡、巡抚甘国璧以延误送粮进藏为由，予以撤职，并罚其自备口粮送军粮进藏，实质上就是将两人抄家，流放西藏。另将云南丽江土知府木兴等人，以土司谋反等罪名，予以扣押、杀头。“其巴塘、里塘地方，应暂归四川统辖。俟事平之日，再照原议，改隶云南”的议题在清一朝遂再无人敢触碰。这显然是清王朝社会里常见的一出官场政争、满汉官员斗法的把戏，与川滇省界划分已杳无关系，也不能改变滇川藏边务沿革的脉络。

这个历史记载，可能是有史以来川滇边务争拗的第一次，留下了中甸、巴塘、理塘历史沿革的第一手资料。撰写此电文时，郑开文身在德钦前线，不可能查找资料或身带历史典籍，完全是凭借平时积累的历史地理知识，予以剖析、论证。足见郑开文对滇川藏边务历史沿革、地理变迁有十分渊博的知识，真凭实据地驳斥了尹昌衡以阻碍滇军入藏作战而篡改滇川历史沿革的谬论，其为巩固国防、边务兴革的远谋深虑，格局宏大而不失脚踏实地，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令笔者惊讶的还有，郑开文撰写《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所表现出职业革命家的风范，令人赞叹。如果说，郑开文1912年10月10日的电文，是从前线指挥员的军事专业角度，向司令部以及滇省都督府提出“殊觉两井退军有三不可之理由，敢以质之钧部，愿熟察焉”建议的话，那么，郑开文致“参议院、蒙藏事务局暨京津各报、省议会及天南、华南、振华、云南各报馆”的通电，则明确提出和强烈呼吁：“祈主持公道，或提为议案，补助中枢，以期见诸施行；或发为社说，唤起国民舆论，藉作对外方针。”堪称惊人之举。

郑开文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中华革命同志会、中国同盟会的骨干，担任过南京民国临时政府的高级官员，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应用舆论造势的娴熟本领。他此时身处中国最偏远的滇藏雪域高原，在军政事务十分繁忙之际，还熟练运用电报（此时的有线电报还是新技术，应用时间不长，熟练运用电报形式来打舆论战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的形式为《申报》撰文，利用其全国性大报的知名度，站立舆论高地，迅速将云南援藏平叛的事迹布达全国。并从滇川藏边界区域的治理和防止外国势力侵染等方面，提出正确解决盐井县归属的途径和方法，要

求国会、蒙藏民族事务院“祈主持公道，或提为议案，补助中枢，以期见诸施行”。并希望京津各大报纸，“或发为社说，唤起国民舆论，藉作对外方针。总期全体一心，消弭大难。几早日解决滇川边务，斯能进行”。这个立足于国家利益、国防理念的舆论攻势不谓不高明。“开文、梅龄滇人也，非为滇计，实为民国前途计，但求不为吾国作伥，足矣”的拳拳之心，深深打动了全国民众，为解决川滇藏边务纠纷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是郑开文、姜梅龄倡言“其应持无所偏倚之公，理判将来民国之利益以定疆域之。系便滇者归滇，便川者归川，即不然，合滇边川边别设一省，从事经营，俾他国无从染指，亦计之得者。如是，则利害轻重攸往咸宜，禹域神州方无阂脱。否则，此项膏沃地惟有一任他国经营耳，各私其省如大局何”的见解，则为1939年民国政府建立西康省的实践所证实，可见其卓识斐然。

最为重要的一点，郑开文没有像尹昌衡等人申诉于袁世凯，求袁世凯来断决是非。而是另辟蹊径，利用舆论工具，申诉于国会、社会各界和民众，体现了郑开文尊重民意和民众知情权的民主共和思想意识。《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的现实意义还在于：它成为革命党人针砭袁世凯政府军事无能、外交无力的先声，是对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成果的报复性发声。西征滇军代表国防力量，在中国的国土上执行中央政府援藏平叛任务，由盐井、芒康、碧土、左贡方向行进，援救巴塘守军，或由此线路向嘉玉桥、工布江达进军西藏，当是正确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极具军事战略价值。但袁世凯出于对英帝国主义可能进行军事干涉的担忧，或内心本不愿意滇军进藏平叛，对蔡锷、殷承瓚等人请其明确滇川权限、区分的滇川两军任务和进军路径的多次诉求，置之不理。又想竭力维护其总统权威、尊严，不懂装懂，盲目指挥。忽尔命进藏，忽尔指援巴，忽尔令驻盐井，忽尔令撤出盐井让川军占领，直以朝令夕改，出尔反尔，几千大军进退维谷，致以国家威权、国防战守大计为儿戏。暴露其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军事指挥的专业化水平太低，根本不具备从政治、外交、军事战略的高度去解决西藏问题的能力，导致处置西藏事务的一系列失误。郑开文通电彻底揭穿袁世凯一直标榜的“知兵善战”假面具，还原于袁世凯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行政颞预、军事无勇无谋的政客面目，彻底撕下其“能吏”“干城”的伪装。

郑开文此通电文直捅袁世凯的软肋、隐伤，着实惹怒了这位不可一世的大总统，袁世凯遂在事后的论功行赏公文中，将亲临战场、全面指挥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援藏平叛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队长（其兵力远超当时一个混成旅）郑开文“擢升”为上校，公然实施打击报复。

众所周知，袁世凯为稳固其统治的需要，滥用国家权力，着力培植私人势力，达到令人咋舌的地步。1913年2月9日，《天南新报》刊登一则“临时大总统命令”：“吴炳濂、汤化龙给予一等嘉禾章。此令。梁士诒、胡惟德授以勋二位。此令。姜桂题、段芝贵授以勋二位。此令。……那彦图给予一等嘉禾章。此令。张勋给予一等嘉禾章。此令。”当时舆论抨击说：袁总统与南北统一纪念日所授之勋章勋位及陆军上将、中将等皆属反对共和、残杀民军之人及一二官僚派与前清立宪党，张勋得一等嘉禾章，尤为显著。沪人士大为诧异。特别扎眼的“张勋给予一等嘉禾章”条文，竟然是授予民国最凶恶的敌人张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显然是袁世凯滥用国家名器，着力培植私人势力的典型事例。时人还评论袁氏：“羊头灶婢，尽授官阶，走卒贩夫，咸膺爵位。物以稀而可贵，袁氏名器之滥如此，岂尚有价值之可言。况袁氏要结虽工，而阴狠实甚。附我者则奉之如犬马，异己者则诛之如寇仇。为怨为德，何常之有，今日以私恩之故，徘徊犹豫，异日功狗

之烹，可翹足而待”。^[42]足见袁世凯封官晋爵之滥，结党营私之盛，远超历朝历代。对于在川边打了大、小胜仗的旧军人无不封以师长、旅长，中将、少将，却唯独对西征滇军将士的赏格如此吝啬，无疑将袁世凯玩弄权术、睚眦必报的政客面目又一次袒露在众人面前。

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战事，是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民族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西征滇军在藏区严格执行民国政府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赋予了民主共和政权与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军事扩张以截然不同的政策导向。他们帮助西藏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抵御外国势力的扩张和侵略，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的一系列举动，体现了辛亥革命后对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性跨越，为后世提供了解决国内民族纠纷的有益借鉴。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藏各族人民在我国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中，特别是近代，西藏各族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同内地人民一道，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侵略，反对分裂，使帝国主义不能完全灭亡中国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因此，处理好西藏地区的国防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加强汉藏民族的团结，民防是边防的基础，发挥边疆各族人民在对外反侵略斗争中的作用，才能真正巩固边防，才是维护西藏地区稳定的根本对策。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清政府时期的川滇藏边界划分和民国时期另立西康省管理川藏边务，都没有公允地解决好藏、川边务问题。惟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府的英明决策下，从国家发展的整体战略上对西藏和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倾斜和灵活的政策，促进西藏民族地区快速发展经济，保持西藏社会稳定，培养民族元气，才真正把西藏建设成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钢铁长城。1955年7月30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西康省建制的决议，金沙江以东各县划归四川省，金沙江以西各县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以金沙江为川、藏省界的划分，兼顾各方利益和诉求，才使藏区长治久安，获得半个多世纪和平稳定的发展机遇，藏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快速进入现代化经济建设，共享繁荣昌盛、和平安宁的新生活。

回顾民国元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中央政府的坚强领导，才能加强地方的稳定。只有综合国力的强大，才能有效地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国泰民安。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才能有新中国的新型民族政策，使各族人民坚定不移地团结在党的周围，一起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不可忽略的是，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分裂集团，不愿看到中国的发展、强大，他们时刻不忘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和分裂中国西藏的战略图谋。因此我们要始终绷紧稳定压倒一切的这根弦，对国际反华势力和达赖集团的分裂活动绝不能有丝毫的麻痹松懈思想，各族人民尤其是藏区僧俗群众必须充分认识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乱是祸的深刻道理，倍加珍惜、维持好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在雪域高原上铸造起反分裂、维护稳定的钢铁长城，确保西藏长治久安和社会、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第六节 《哀乌斯藏辞并序》碑刻与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战役

听外婆说过，西征滇军撤回省城前夕，郑开文等人曾在丽江市黑龙潭公园内刻立石碑，铭记援藏平叛的过程。笔者数次往返丽江，向当地人包括公园管理人员查询，几经周折，均无人知晓有此石碑的信息。无奈之下，只有攀援砥砺，穷尽辛劳，将公园内的上上下下搜索了几遍，终于

找到此石碑。原记载此碑刻有左右两块，均为红砂石制作。经百年风雨侵蚀，已严重风化、氧化，变成白花花的两块石板，隐藏在茂密的树丛中。碑文字迹已很难辨认，露白和斩缺多处，难以连缀识读，令我庆幸之余而又涕泪随下。所幸，经笔者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重申《哀乌斯藏辞并序》碑刻的历史意义、文学价值后，现已修复，大部分文字内容可以识读，并移至显要位置，成为丽江黑龙潭公园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

《哀乌斯藏辞并序》碑刻，曾被一些学者提起过，但其内容始终若隐若现，难睹全貌。笔者通过拍摄照片、制图拼贴等一系列费心费神的认真复原，并与《天南新报》所载部分内容反复核对，终于完成《哀乌斯藏辞并序》碑文摘录工作。特转载如下，以飨读者。

《哀乌斯藏辞并序》

呜呼！我屈指落落之五大族，会只余汉满蒙回耳？我照眼赫赫之五色旗，会只见红黄兰白耳？滇乎川乎天乎人乎，谁使汝误于乳臭，不得列于民国；谁使汝劫于积威，不得兴于共和乎。此壮夫义士所以心为之堕而涕为之危也。

嗟！我滇军出师弥月，右规乡城，左复盐井，而巴塘待毙之，川军赖以解围岁险。（我滇军）士气飞扬军心踊跃，左右纵队悬筒跨囊，渡江而西，即占有红盐井。廿余日间，积极进行，遂收复吁能卡、垂紫卡，不须底口几，楚河三夹。左攻闷空、毕土各地方。中间如兰经、如德钦、如灵功、如腊翁、刚达，如毕土、扎夷、七大寺，如梅里、阿东、羨通、解瓦；如下龚、波能。迫卡取卡：如母喜、坝佳、水责、瓦补、根那、觉石、葛垞、顶额、瓦取以及斗苴、米坝、东季、尹当、觉弄、当那、扬渣、工腊、松丁、巴底、供水、紫中、格拉凡，大小数百余村，莫不鞠踞稽颡，以次投诚。逆者剿之顺者抚之，彼感我如父兄，我爱之如子弟。师抵杂瑜、察陇、波密各要隘，投戈恐后，推赤（诚）如初。自杂瑜以北、波密以东、察木多以南之僧俗番众均鳞次来降，其势如疾风之扫秋叶，如骤雨之落春英。窃喜直抵拉萨之愿或庶几偿乎。不谓铁军三千正接乌珠之战，而金牌十二旋班，鹏举之师坐见庄严宝库没入蛮氛，清静灵幢乱飞花雨，而我拉萨枉死之军民亿劫不返矣。嗟呼！十年白骨犹梦，春归万里黄河，但闻夜哭，裹无马革尸竟暴于冰天，留有豹皮名已湮于雪窖。吁，可痛也，谁之咎欤。

先是藏番构乱，红黄两教互相水火，达赖借助外人，其噶陇夏旦又主谋排汉，乃肆虐妄杀，号称独立。而喀木以东之僧俗，既久苦川军残酷，斩木揭竿声言报复。其时尹昌衡方以四川陆军部长，手握兵权，阴嗾新旧两军，藉索恩饷，激而哗变，焚掠省城越三昼夜。浦、朱两督逐相率逃匿。君乃思结会匪，概纵囚敬（禁），交群丐，明诏游民，悬牌四门，推诚亡叛，招而纳之，编而联之。自朝至昃五镇屹立，收其犍刀当枪炮，攫其赃物以充官府，明旦万岁之声洋洋盈耳。而我备具五德之部长，遂以群情拥戴，自上大都督尊号于成都之皇城，越日开大汉公于江南会馆，于是波靡澜狂。而山海亭堂中一般人物，凡具有仁义礼智信之一体者，皆超拔而提升之，以推布于省内外之高下各机关。此人大都视巨匪如手足，嫉殷富如仇雠，以是暴徒蜂起，明火出猎，四川之内皆哥弟也。而关外将士，亦闻风欣然，附骥恐后，藏事遂不可问矣。时我滇军正以两梯团倡义援川，师扼叙泸泸富，军威大震，且代为驱除乱党，镇慑东南，乃迫成尹督裔割赵屠之功。而一切麼麼小丑亦蜷伏，无敢现形，师还而蠕动又如故也。噫嘻。赤盐白甲都成积秽之山，珉水巴江尽是纳污之水。

矧此乌斯在万里外乎，然其时巴里两台、乡城江卡尚未陷也，恶耗传来，警书迭至。尹都督方醉拥妾童，乘炬列队乘八人大轿，自汉烈公（即贵州馆）缓缓归也。未几而都督纳宠矣，又未几而都督大婚矣。三军放假，百官免贺之牌示，已啧啧人口矣。乃新人如玉，掀翻醋海之波，故剑飞花，挥堕情天之月。锦城春开未免魂销，黑塞秋凉能勿气短。于是赵尔丰七载经营、百万设治之关外各州县遂纷纷告陷矣。君督内惕于阉威外迫于清议，积羞成愤自请临边。而荏苒半年，仅一纸军声呼啸。出塞号称五千人者不过五分之一。行次雅州大掠而溃者又四分之一。甫抵鱼通，顿师不进。而川边千里指日荡平与三藏不能容两军之电逐哆。然而，我总统内推无类之心，以为孺子可教，外示有容之量。复为强邻所欺，于是汉族军民卒以粮尽援绝，缴械改装，降心为虏，以夷变夏。民国之奇谈，中朝之剑局，我大汉光复之第一编痛史也。

且夫五族者，民国所结合非川滇所得而强分也；三藏者，民国所公有非川滇所得而独私也。以唇齿之川滇固不应作鹬蚌之争而授鱼于渔人，臣辅车之川藏奈何为螳螂之搏而忘形于异鹊乎。今也，于结合者而强分之于公有者而独私之是畛畦，我民国（任）宰割，我同胞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冢中枯骨能起而肉之否。耶，嗟嗟某也，以三巴恶少，才学鸡鸣；某也，乃一世奇男，竟甘雌伏，徒使穷勇。滇军进退狼狈，朝下一令曰甚速来，暮下一令曰速去，岂计我昆弟子侄之生命牺牲几何；我伯姊诸姑簪环又其损失几何乎。乃至求人入藏不许求协饷，不许求屯边亦不许师还。榜揭蠢尔，降番叩马泣留我军亦羞，无以解诒之曰：为汝往平江卡，即来也。乃绕道南旋而西方，极乐地尽幻如泡影矣，能不哀哉。夫藏亡则川亡，川亡则滇亡，滇亡而民国犹云存者，其亦赧颜也。

已今亦既班师矣，风云帐下，磨残烈士壮心；鼓角铙前，洒尽英雄老泪。蜀犬亦知吠日，何心忘之井蛙，竟敢视天非天小也。哀我西藏乌得无辞，辞曰：

天苍苍兮地荒荒，风猎猎兮雪茫茫。

下鹰隼兮驱犬羊，嘶战马兮沸蜩螗。

五百修罗兮劫未央，三千法界兮杀过当。

巴山月黑兮滇水雷轰，烽燧赫赫兮照我边疆。

忽壮士兮排天阊，气如虹兮胸吐芒。

星光为剑兮雪花为枪，摧胡昂兮殲天狼。

有鬼为厉兮血喷滂，齿牙裂崩兮若佯狂。

声叫号兮发披猖，形影恹恹兮隔西方。

佛为悲兮天为育，麾我武兮使不扬。

此妖孽兮非祲祥，呜呼三藏兮其亡其亡。

西征滇军司令官节制丽维永水等属文武官吏调遣陆防各军事宜殷承璫书丹。参谋长兼左纵队长姜梅龄。步兵第一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鹤丽总镇张贵祚。高级副官黄实。步兵第一大队长贾紫绶。步兵第二大队长华封歌。二等参谋高荫槐。一等副官杨汝盛、朱家齐。步兵联副江映枢。弹药队长莫玉廷。西协右纵队前卫司令官李学诗。三等参谋杜希陵。二等副官杨恩泽。二等副官李父彩。右纵队参谋刘钟俊。机关枪队长白正洸。炮兵队长陈天贵。骑兵队长何徙仁。独立步兵队长谢昆山、杨承祿。丽江府府长兼参事官熊廷权撰文。咨谋长王九龄。编修长王建中。军需官

陈谦。军法官王槐荣。军医官李魁。军械长谢永富。暨全军陆防将校士兵等。

大中华民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班师抵丽江勒石置象山下

(原碑刻无标点，标点及括号内容、排版为笔者酌注，部分注释请阅附录二)



现存云南省丽江市黑龙潭公园内《哀乌斯藏辞并序》碑刻（右碑）

现存黑龙潭公园象山脚下《哀乌斯藏辞并序》石碑分为左右两块，两石碑间文字链接，不分段落。各通高 150 厘米，宽 55 厘米，厚 11 厘米。正面镌刻“哀乌斯藏辞并序”文，字体为行楷，阴刻，共 32 竖行，计 1997 字。立碑时间是民国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12 年 11 月 25 日），撰文署名是西征滇军中队（连）以上职衔的指挥、参战人员、地方辅助官员及全体陆、防将士。执笔有熊廷权、郑开文等，书丹殷承璈。

《哀乌斯藏辞并序》由序文和辞两部分组成，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辞赋结合的叙事方法，以突出辞赋的论事说理的功能。“辞”的本义是诉讼。诉讼的核心有二：一是内容上的“以理服人”，以理取胜，在理论上立于不败；二是形式上，为了取得论争的胜利，就必须采用多种修辞手段，使“辞”成为美的、富有文采的艺术语言。^[43]该碑刻序文骈偶讲究，对仗精当，词藻华丽，全篇以七六相间句式定句，如：“谁使汝误于乳臭，不得列于民国；谁使汝劫于积威，不得兴于共和乎。”或以四六相间的句式定句，如：“风云帐下，磨残烈士壮心；鼓角镗前，洒尽英雄老泪。”等等。

辞言部分，楚辞的韵味十足，是非常纯粹的楚辞格调。以“000 兮 000”句式为型，仿如屈原《国殇》：“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哀乌斯藏辞》有“天苍苍兮地荒荒，风猎猎兮雪茫茫。下鹰隼兮驱犬羊，嘶战马兮沸蜩蟪。……忽壮士兮排天阊，气如虹兮胸吐芒。”或以“0000 兮 0000”句式为型，仿如屈原《招魂》：“献岁发春兮汨吾南征，葭萍齐叶兮白芷生。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哀乌斯藏辞》有“巴山月黑兮滇水雷破，峰燧赫赫兮照我边疆。”以及采用上述两种句式交叉使用，仿如屈原《招魂》：“抑骛若通兮引车右还，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

朱明承夜兮时不可以淹。”《哀乌斯藏辞》有“星光为剑兮雪花为枪，摧胡昂兮殲天狼。有鬼为厉兮血喷滂，齿牙裂崩兮若佯狂。声呼号兮发披猖，形影惆怅兮隔西方。”这些句式都为楚辞所使用的基本句式。《哀乌斯藏辞》并没有拘泥于楚辞句式的限制，而以诗歌本身的情绪变化为引导，潇洒铺陈，不拘一格。继承了楚辞以言志抒情的特色，而且抒发的是那种苦闷压抑、愤懑不平的情绪，抒泄忧国忧民，感慨壮志难酬的悲凉之情。

上述是《哀乌斯藏辞并序》碑刻的基本情况介绍，为了与以上各章节内容快速衔接，我们先以《哀乌斯藏辞并序》落款部分切入西征滇军参加援藏平叛战役的实况，稍后再谈碑刻所涉及的相关内容。

此次援藏平叛战役中，滇军伤亡较小，所列指挥、参战人员的职务变化不大（其中包含已经离职的西协防军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结合上述各电文的内容，可以佐证战役中军事部署及各官佐的职责。为了更清晰表达职务、责任之间的关系，归纳列下：

西征滇军司令官 殷承瓚。

步兵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长 郑开文。

参谋长兼左纵队长 姜梅龄。

步兵（纵队）联副长 江映枢。

鹤丽总镇 张贵祚。

高级副官 黄实。

步兵第一大队长 贾紫绶。

步兵第二大队长 华封歌。

二等参谋 高荫槐。

一等副官 杨汝盛、朱家齐。

弹药队长 莫玉廷。

（维）西协、右纵队前卫司令官 李学诗。

三等参谋 杜希陵。

二等副官 杨恩泽。

二等副官 李父彩。

右纵队参谋 刘钟俊。

机关枪队长 白正沈。

炮兵队长 陈天贵。

骑兵队长 何徙仁。

独立步兵（中）队长 谢昆山、杨承禄。

咨谋长 王九龄。

编修长 王建中。

军需官 陈谦。

军法官 王槐荣。

军医官 李魁。

军械长 谢永富。

（参照《哀乌斯藏辞并序》碑文落款）

综合《哀乌斯藏辞并序》碑文、云南《天南新报》电文内容来看，西征滇军入藏作战的部队仅有以联长郑开文、参谋长姜梅龄为统带的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分析如下：

一、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的规模

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参谋长姜梅龄，联副长江映枢。

统属：陆军大队（营级）2 个大队，机关枪、炮兵、骑兵、弹药各一中队（连级）。

鹤丽总镇（团）边防军 2 个独立步兵中队（营级）。

维西协防军一营。

总计兵员约 3000 人（后勤保障人员未计入），为一个足编混成旅的编制（以民初云南军队编制，一师设两旅，一旅有两团，一团有二到三营。一个营兵力足编为 300 到 500 人，一个连足编是 120 人），其武器装备和各兵种的配备，也等同于正规军混成旅编制。

二、兵力部署与作战任务

刻立《哀乌斯藏辞并序》碑时，西征滇军除留守部分外，已全部撤回丽江，各方面情况比较容易汇总，故此碑文可以看成是一篇现场报道，各人的职责分工比较清晰。综合郑开文致殷承瓛电文和《申报》登载的《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内容，大致可以看出西征滇军第一纵队作战任务、兵力部署：

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在德钦县城设立前线指挥部，分为左右纵队，受领各自的作战任务，沿梅里雪山、澜沧江的东西两侧进入藏区作战。

右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联副长兼右纵队副长江映枢。右纵队参谋刘钟俊（后接替李学诗任右纵队前卫司令、第六营营长）。

所属：

陆军步兵一大队，大队长贾紫绶。

鹤丽总镇（团级），总镇张贵祚。所属第一独立步兵中队，队长谢昆山。第二独立步兵中队，队长杨承祿，驻中甸瓮水作为西征滇军右侧乡城方向的警戒。

骑兵一分队，骑兵队长何徙仁。

炮兵一中队，炮兵中队长陈天贵。

机关枪一分队，机关枪小队长华封治。

右纵队前卫（又称维西协防军，营级），营长李学诗。

右纵队作战目标和达成的战役成果：“郑开文统右纵队，以嘉玉桥为作战目标，由阿敦进攻红白盐井，血战数昼夜，相继克复，僧俗降者以千数。克日进取江卡。番酋闻风胆寒，辟易数百里。”

左纵队：联队参谋长兼左纵队长姜梅龄。

所属：

陆军步兵第二大队，大队长华封歌。

炮兵一小队，（小队长姓名不详）。

骑兵一小队，（小队长姓名不详）。

机关枪一分队，机关枪分队长白正洸。

左纵队作战目标和达成的战役成果：姜梅龄统左纵队，以江达为作战目标，由阿敦渡溜筒江越梅里、白麟大雪山，直趋毕士、左贡，旁临耻空、杂俞、波米，剿抚兼施、威德并济。大军所至如雷如霆，藏军统翁扎古囊震怖恐惶，率其跳梁残孽，昼窜霄遁。师次左贡一带，沿途僧俗执哈达酪浆迎者无数。村落已拓地千余里，民众数万户。

上述材料表明，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的组成，人员分工，作战任务和取得的战果都能落实到位，没有人浮于事、空位虚缺的现象，可认为是西征滇军在援藏平叛过程中军事部署的确切材料。

对比《西征篇》报告西征滇军的规模、人数却远远大于此数：“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关枪各一小队，而以贾子绶为步兵大队长，谢昆山为步兵中队长，白正洸为机关枪中队长，□□□为炮兵小队长。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关枪各一小队，而以华封歌为步兵大队长，杨承禄为步兵中队长，陈天贵为炮兵中队长，华封治为机关枪小队长”。我们从《哀乌斯藏辞并序》碑文落款中得知：西征滇军步兵第一大队长贾紫绶，步兵第二大队长华封歌，再没有列出其他大队长的姓名。如果西征滇军左纵队有四个陆军大队，右纵队有一大队陆军的话。那么，其余三个步兵大队长究竟是谁？遍查西征滇军参加援藏平叛的所有战事记录，均无另外三个大队陆军的军事部署或军事行动的痕迹。毕竟是数千人正规军的行踪，不能说抹就能踪迹全无吧。

至此，综合上述各电文、碑刻的分析、举证，诸君可以看到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的真相与《西征篇》等文章书籍的论述完全不同，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指挥架构和作战部署。郑开文统带西征滇军第一纵队以“探险先遣队”的名义，于1912年7月4日从昆明出发，先期抵达滇藏边，在德钦县城设前线指挥部，根据作战任务的要求，将第一纵队分为左、右纵队，以梅里雪山、澜沧江的东西两侧分头进藏：以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率领的右纵队溯澜沧江方向，以犀利攻势，8月15日，取得攻占溜筒江（村）、8月16日攻占墨里村，扫清了西征滇军右纵队挺进盐井的外围。8月27日凌晨四时，克复盐井，取得云南援藏平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盐井战役指挥者是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长郑开文。执行人有第一纵队副联长江映枢、步兵第一大队长贾紫绶、鹤丽总镇张贵祚、独立中队长谢昆山、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及各自所属部队。

以第一纵队参谋长姜梅龄率领的左纵队，由阿敦（德钦）渡溜筒江（澜沧江），越过梅里雪山北坡至甲郎，再沿玉曲河（怒江支流，位于梅里雪山西侧）直趋毕土、左贡，旁临耻空（又称闷空，即察瓦龙一带）、扎夷、左贡、波密，剿抚兼施、威德并济。达成第一纵队以梅里雪山、澜沧江的东西两侧分头并进的战略态势，直逼江达（工布江达），为西征滇军进藏的前锋利刃。具体执行人是纵队参谋长兼左纵队长姜梅龄、步兵第二大队长华封歌及所属部队。

由此可见，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指挥架构和作战部署十分清晰，郑开文是西征滇军左、右纵队攻克溜筒江，墨里、盐井，兵临芒康、嘉玉桥；攻取西藏察瓦龙、毕土、左贡、波密；撤军时对乡城藏军进行惩戒性攻击等战役的组织者、指挥者。

二、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援藏平叛的作战成果。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在得到中央政府、滇省都督援藏平叛作战指令后，经过40余天长途行军后到达滇藏边，设前线指挥部于德钦县城，就此分为

左、右纵队，悬筒跨囊渡江而西，以梅里雪山、澜沧江的东西两侧，左右联络、分道并进，以犁庭扫穴之势，直捣乌斯江畔，昌平佛地，迅速绥靖边氛。其间，左、右纵队行军路程达1000公里以上，作战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军事力量抵达德钦以西，波密以东，昌都以南，察隅以北的广大区域。大小战斗数十次，攻克要隘、堡垒数十座，村镇数百处，收复面积达数万平方公里。其中，右纵队攻占溜筒江、墨里、盐井、吁能卡、垂紫卡等要隘重镇，收复斗苴、米坝、东季、尹当、觉弄、当那、扬渣、工腊、松丁、巴底、供水、紫中、格拉凡大小数百余村。左纵队攻占母喜、坝佳、水责、瓦补、根那、觉石、葛垞、顶额瓦等要隘、关卡，师抵杂输、察陇、波密；攻占闷空、毕士、札夷、七大寺，梅李、阿东、美通、解瓦，下垄、波能等地。

西征滇军左、右纵队所达之地，各族民众、僧俗莫不鞠跽稽顙，以次投诚，逆者剿之顺者抚之“颇感我如父兄，我爱之如子弟”，形成“自杂瑜以北、波密以东、察木多以南之僧俗番众均鳞次来降，其势如疾风之秋叶，如骤雨之春英”的大好局面。

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入滇川藏边区作战的二十多天时间内，积极进行，收复盐井、毕土，兵临芒康、嘉玉桥、察瓦龙、察隅、左贡、波密，江达，似剑锋插入前藏的中心，芒康、嘉玉桥、昌都、巴塘、波密等战略要地均暴露在西征滇军的攻击范围内，叛军闻风而逃。芒康、巴塘、昌都之围顷刻瓦解。盐井至芒康、昌都、巴塘交通线路被打通，为西征川军攻克理塘、乡城奠定了基础，迅速扭转西藏叛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打乱了达赖喇嘛军事集团的部署，一时间前藏、川边大乱，藏军兵马五千余，弃地而逃，积集于嘉玉桥、乡城等地，暂时凭借天险重镇而守。

三、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援藏平叛作战胜利的军事意义。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取得的战果其意义不可低估，作为一个有比较意义的参照，我们可以看到清朝乾隆年间发生在四川西部的一场平乱战事，是怎样的艰难困顿。清史记载：

乾隆年间，第二次平叛金川之役发生在藏、汉民族杂居的金川县、小金县境内（俗称大、小金川），从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到四十一年二月结束，费时四年有余。清政府共调兵十二万五千五百余人，阵亡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一人，其中官员九百零八人，受伤者无计其数。耗费银六千一百六十万两，米二百九十六万三千五百多石，火药四百二十万一千四百多斤，铅铁炮子三百多万斤，调派民夫四十六万二千多名。

清政府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所平定的地区仅是川西北深山老林中几座藏族山寨而已，最终的胜利只是废除了该地区的土司制度，推行了改土归流。从此事例我们看到，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所取得的胜利，完全不同于封建王朝以军事扩张为目的的征伐剿灭，而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举，符合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因而得到包括藏区各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支持和拥戴。

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其现实意义还在于从国家政治层面，真正落实五族共和，各民族平等相待，共享福祉的国策，把维护藏区社会稳定和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工作落实到实处。西征滇军在帮助西藏恢复正常社会秩序，抵御外国势力的扩张和侵略的过程中，赋予了民主共和政权与历朝历代封建王朝军事扩张以截然不同的政策导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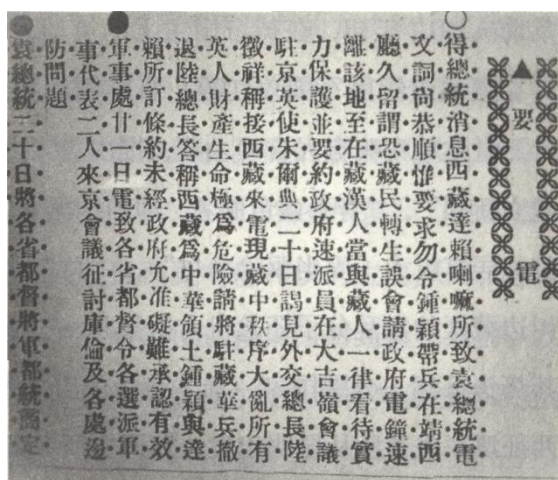
西征滇军对于勾结外国势力妄图出卖国家主权、搞独立分裂的武装叛乱分子，通过强硬的、外科手术般的军事手段，把敌方的有生力量予以歼灭，驱逐，迅速恢复当地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生产秩序。例如，在西藏武装叛乱分子占据的盐井、毕土、扎夷、左贡等重镇，西征滇军采取了远距离突袭、夜袭，迂回包围等战略战术，趁其不备，兵不血刃地攻占城镇村寨，将达赖政权派遣的武装分子和煽动暴乱的外来人员，快、准、狠地予以打击或驱逐。典型案例有“盐井之战”，西征滇军右纵队由德钦进攻红、白盐井，血战数昼夜，相继克复，僧俗降者以千数。又如“毕土之战”，西征滇军左纵队由德钦渡溜筒江越梅里雪山，乘其不备，长途奔袭毕土、左贡，旁临耻空、杂俞、波米，剿抚兼施、威德并济。西征滇军进展神速，郑开文部攻克盐井后即派出侦察队，抵达藏军重兵把守的嘉玉桥，以及运送粮秣救济巴塘川军顾占文部。姜梅龄部数周时间即兵临波密、工布江达，形成攻击拉萨的战略态势。这些攻势凌厉的战术起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的作用，彻底打乱敌方与我争持相拼的心理预期，收到“大军所至如雷如霆，藏军统翁扎古囊震怖恐惶，率其跳梁残孽，昼窜霄遁”的震慑效果。因此，在尔后的军事行动中，西征滇军没有遇到藏军层层设防、每隘必争的强硬抵抗，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战场杀戮和民众因战乱的流离失所，维护了战火蔓延区域的社会稳定，得到了藏区民众、僧侣和土司头人的大力支持，出现“盖自我军抵井，威德咸施，远近居民争相归附，自其甘结，愿永属滇，当即给予护照。俾遵信守，以致声威一日千里，昌多、江卡，争欲先降”的状况。

需要特别指出，西征滇军取得这些战绩，是在滇川边区、藏区极其严酷的地理、气候的环境下，以及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特殊复杂的情况下取得的，它与中国内地的行军打仗有着迥然不同的情势。据当时《天南新报》1913年1月29日的报道：“查此次西征，悬军绝域，较内地战争辛苦百倍，诸将士驰突于冰天雪地，足蹈危境身临不测，转斗数千里，或恢复重镇、攻克要隘，或收复蛮民，杀敌致果，或冒险前敌致力后方。无不克远任务，迅奏肤功，使边地围解，达赖请和。虽日民国威灵，抑亦诸将士坚忍耐劳，奋勉从公，有以致之。”

四、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援藏平叛作战的胜利，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其一，西征滇军的凌厉攻势和节节取胜，一扫以往数十年清政府军队应对外侵之敌的作战，每战必败，败则求和，惨遭割地赔款的耻辱。平定内乱则慌忙应对，文恬武嬉，拖拖拉拉，耗财费时，胜之不武的局面。西征滇军夜袭盐井、奔袭毕土的重大胜利，令国人痛快淋漓，荡气回肠，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振奋了国民的志气，是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理念深入人心而出现的新气象。

其二，遏制了英帝国主义分裂西藏的图谋。英帝国主义长期以来窥视我国西藏，离间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以期达到吞并西藏的目的。民国元年，英帝国乃乘我国辛亥鼎革之际，以先发制人之举，一变其渐进、渗透式的侵略之态而为赤裸裸的武力吞并，妄图占西藏而由喜马拉雅山鲸吞云南、四川全境，举东西诸地悉归彼势力范围之内。英人之野心，路人皆知，当时各国新闻媒体披露或评论的事实可谓触目惊心：1911年12月28日，英军300余人窜入察隅南界德能村；1912年1月6日，英军千余人进占察隅的热巴、瓦弄一带，距察隅只有一站多路；又于1912年1月16日命驻扎西藏之英兵自拉萨经阿墩直向丽江前进，至此，英帝国主义对藏南的蚕食已经到达危险的地步，如果没有滇军、川军的出兵西征，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义声报》载西藏达赖喇嘛致电袁世凯政府的电文（云南省图书馆史料，《义声报》缩微胶片）

民国元年，民国政府“内顾国势凌夷，无多武力足为后盾，外瞻国际情势，正需列强承认”，在此内忧外患危难之际，滇省、川省以“国家之务为己任”主动提出平定西藏动乱的请愿，想以军事力量统筹藏事。尽管，当时西征滇军所编军队仅一混成旅，而且长途跋涉，深入藏区，加之饷械缺乏，困难重重。但他们都置局部利益、个人安危不顾，以国家安危为重任，力主平定川藏动乱，以维护中华民国不至于分裂。也正是因为有西征滇军、川军“近筹藏事，远顾边务”的担当，民众舆论的共同声音，迫使民国政府摒弃清末时期的软弱姿态，一改过往息事宁人的外交政策，由委曲求全转为义正词严。首次突破了帝国主义的阻力，自主统筹藏务，剿抚并进，恩威并施，谈打结合，表明新兴的民国政权完全有能力解决中国内部的西藏问题，中华民族不再是四分五裂，其蚕食我国领土之野心已不能得逞。

其三，西征军在川滇藏边的节节胜利并不断向西推进，对西藏宗教上层的离心势力产生了巨大的威慑与钳制，迫使达赖喇嘛集团回到谈判桌前。1912年初，在英帝国主义的策动下，十三世达赖喇嘛命达桑占东等在西藏组织民军围攻江孜、日喀则和拉萨的川军。藏军连败川军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自大吉岭入藏，提出：“内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主，建立新国”，“身着蓝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的口号，川边藏区的叛乱分子还趁机占据盐井、芒康、里塘、乡城，围攻昌都、巴塘，其势头甚猛，分裂国家、独立自为的野心暴露无遗。自1912年7月4日西征滇军先遣队从昆明出发，郑开文所率部众，星夜行军，长驱直入。右纵队迅速取得溜筒江大捷、收复滇藏边界重镇盐井，剑锋直指芒康、嘉玉桥一线；左纵队翻越梅里雪山进入藏区毕土、波密等地。对围攻巴塘、昌都、理塘达数月之久的藏军形成战略分割、包围态势，切断了藏军后退之路，彻底扭转了敌攻我防的态势，昌都、巴塘、理塘、芒康的局势根本好转。达赖集团在川藏边军事失利的情况下，只能暂时放弃以武力与中央政府争拗的尝试，对中央政府的态度有所缓和。就在盐井战役5天之后，1912年9月1日，西藏方面表现出了谈和的意向。当时还驻留在拉萨的驻藏长官钟颖电达北京政府称：“达赖派堪布二人前来议和，提出来5项要求：(1)恢复达赖政权，加崇封号。(2)汉人不得侮慢佛教及僧寺。(3)西藏地方行政重大事宜可与汉官商议，但不能将西藏改设行省。(4)北洋政府不得在拉萨驻扎军队，办事官员和卫兵人数只限200人。(5)撤退尹昌衡的征藏部队。[44]9月12日，云南西征军司令殷承瓚接到了察瓦龙、毕土两寺大喇嘛等禀称达赖“此次愿意共和”，并要求“言

归于好”。从西藏地方政权所提出的和谈条件和态度来看，其主要目的是在承认中央政府拥有对西藏地方管辖权的前提下，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西藏地方政府的权益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藏地方分裂，重蹈蒙古覆辙”。据驻藏官员陆兴祺报告，当时西藏方面虽然在英国的援助下积极增兵藏东地区，有兼并康区的意图，但是对于川、滇军“实有所惧”。很显然，西征滇军、川军在军事上的胜利是促成西藏响应和谈的主要原因，在继续抗争的同时又不乏联系、洽谈，最终迫使达赖集团回到谈判桌前，汉藏争论的焦点已由武力驱逐汉军转变为西藏地方权益和谈判促统等议题，为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创造了条件。

第七节 《西征篇》的疏失及影响

介绍完新近发现的民国元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期间的电文、实物遗存，我们终于有机会谈一谈《西征篇》的疏失及影响。

《西征篇》编纂赵式铭先生是丽江市剑川县人，曾是《丽江白话报》的主笔，其在《丽江白话报》发刊词中写道：“莽（莽）乾坤是一大舞台，是强的生杀予夺随安排，是劣的奴隶牛马也应该。看，茫茫大陆，莫只有强种常在。叹，此意有几人得解？愿身化恒河沙，苦把同胞戒（诫）。问晨钟暮鼓，可醒过南柯来！”可见，远在光绪末年，赵先生对国家民族危亡有如此的关切，对发展教育造就爱国国民，鼓起爱国力与团结力，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有如此前卫的认识，真是可敬可佩。赵式铭在《丽江白话报》还发表过很多有见地的文章，如《论鸦片烟之害》《论迷信风水之害》《劝注重工商业》《说冒险》等。这份用白话文进行宣传的报纸，首推白话文的实践，当时在滇省独有，全国罕见。比胡适提倡白话文还早十来年，对丽江这样边远、民族地区来说，更显得难能可贵。赵式铭还写了丽江府中学（今丽江地区中学前身）校歌，歌词曰：“雪山绵亘金沙长，气局何堂皇。我祖我宗生此土，是我好故乡。殖民政策强凌弱，艳羨膏腴壤。愿将学界渐推广，巩固此金汤。”由此看，赵先生当为时代潮人，鼓吹民族革命，爱国爱乡，文采斐然，功勋卓著。笔者后来读到方树梅先生辑纂《续滇南碑传集校补》中载有《赵式铭自传》一文：

……俄而蜀中政变，军府逐客，遂弃官还滇，而石禅师已先荐予滇都督。既至，辟为军府记室，未就。闻先君病笃，倍道归，侍疾五日而歿！丧讫，誓不复出，以师友敦促乃起，兼助同学周君钟岳纂《云南光复志》。书成，出知熠峨（今玉溪市峨山县），实民国二年癸丑（1913）八月也。^[45]

由此可见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期间，赵先生远在巴蜀，归滇时被同学周钟岳临时抓差编撰《云南光复纪要》及主撰《西征篇》。另以《云南光复纪要》初版前言所述，《西征篇》编纂者赵式铭，不是《西征篇》的原作者（原为张肇兴编纂，原稿已失。后有稿本，篇首题有“赵式铭编纂，蔡锷订正”字样，待考），他没有参与援藏平叛的谋划、指挥或亲临现场，对西征滇军的规模、战争部署，战争进程均不知情。仅能以报刊杂志编辑的角度，收集片言只语，仓促应付差事而已。但是，赵先生是剑川人士，受领《西征篇》编撰任务，似乎也应该对发生在滇西北的援藏平叛事件有特别的关注。《西征篇》初成于1913年8月，笔者所搜集到的《天南新报》载“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殷司令”三件电文、上海申报《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丽江黑龙潭公园《哀乌斯藏辞并序》碑刻，均成文或发表于1912年12月前。出自于西征滇军前线指战员的第一手材料，以报刊编辑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角度来说，赵式铭编撰《西征篇》时却没有采用上述材料，无疑是个不

应该的疏失。

作为一份留存历史的记录，滇军援藏平叛战事结束一年后成篇的《西征篇》，把西征滇军入藏作战的时间、规模、人员配置、指挥、作战过程和取得的战绩都弄得混淆不清，难有清晰的逻辑，实有无所凭据而勉强拼凑罗列的痕迹。以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的三件电文，郑开文、姜梅龄致参议院、蒙藏事务局、京沪滇各大报纸《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现存丽江市黑龙潭公园《哀乌斯藏辞并序》碑刻所引证的内容，均能从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得以印证。藉此，我们可以对《西征篇》一文曲解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做个梳理，有必要几句话。

《西征篇》编撰者在罗列“事实”，演绎“过程”中，着意渲染某些当权者和亲朋好友的英明神武、战绩劳勋，表露出编撰者倾向性的功利心理，从而隐瞒、雪藏了西征滇军前线将士的功绩，致使民国元年西征滇军援藏平叛事件的真相面目全非，让后辈诸人不能释然。

《西征篇》撰文说：“殷司令前命李学诗为前卫司令，直趋盐井。学诗于十五日在溜筒江附近，与蛮开始进攻，毙喇嘛一人，蛮匪十六人，马二匹，……捷闻，殷司令急命学诗乘胜直捣盐井。盐井克复，滇军到处，僧俗争相投诚，有‘不怕川省尹都督，只怕滇省殷将军’之谣。……九月初一日，殷司令以粮饷运济巴塘川军，并咨川督尹昌衡。……殷司令乃令毕土寺喇嘛赉之以往，并谕以中央已请达赖照旧看待在藏官吏军民及保全藏中愿意共和之僧俗，以释毕土附近居民疑虑”。根据此文描述，显然将所有援藏平叛战役的指挥、运作归于李学诗营长，殷司令官直接命令指挥的就是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营长。郑开文“东电”“蒸电”“皓电”等文电档案的出现，无可辩驳地表明郑开文是唯一进藏指挥作战的责任人，所有援藏平叛战事的指挥者，也是与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殷司令的联络人。李学诗从属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右纵队，其前卫、侦察、警戒、辅助的作用和盐井战役后的防区位置一目了然。如果说《西征篇》“捷闻，殷司令急命学诗乘胜直捣盐井”等情节，是不了解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的部署、战争进程的话，编撰者忽视了德钦前线指挥部的存在，盲目地引用一些未经验证的材料，去推演西征滇军的指挥架构和各战役进程，实在不知编撰者的心思何在。

再论，若把“右窥里城，以为川军进窥里塘之声援；左攻盐井以救川军坐困巴塘之危急”的任务交由一营西协防军来完成，那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参加援藏平叛岂不多余？这在援藏平叛战事发生、发展和结局的逻辑上是怎么都讲不通的，摈弃了西征滇军德钦前线指挥部和进藏部队前线总指挥郑开文，来奢谈援藏平叛战事，还有什么意义？

不得不说，《西征篇》编撰者混淆“前卫司令官”与“前卫司令”含意的目的，还在于掩盖、隐瞒了唯一进藏并指挥所有援藏平叛作战的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的功绩。郑开文作为云南援藏平叛德钦前线总指挥，在通信联络非常落后，滇藏边区情况异常复杂，气候、地理环境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独当一面，克服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胜利完成援藏平叛阶段性任务，功莫大焉也。但是，出于文章演绎的需要，《西征篇》编撰者将郑开文定位于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通篇呈现与郑开文有关事略仅有寥寥数语：殷在丽江“以郑开文为左纵队长，率步兵四大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关枪各一小队，而以贾子绶为步兵大队长，谢昆山为步兵中队长，白正洗为机关枪中队长，□□□为炮兵小队长。李学诗领西防国民军，是为左纵队，取维西大道，直趋盐井”。盐井战役后，

“乃令纵队长郑开文将所获蛮官拘留德钦”。中旬战役期间“十月下旬，大队长华封歌、左纵队长郑开文先后率师至中旬”。西征滇军撤军时“谨遵任任郑榆关，任姜陆防统领”。从这些叙述中，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队长郑开文的位置均无所凭据，读者不甚明了郑开文的作战区域到底在哪儿？担负着什么责任？给人们的印象是纵队长、押运员、榆关而已，怎么看都可能是“前卫司令李学诗”或“大队长华封歌”所辖，这显然不符合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事实。

《西征篇》还有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叙述。溜筒江战役后“……捷闻，殷司令急命学诗乘胜直捣盐井”，这耳语般的话语，直呼其名，确乎异常的亲近，很容易诱导读者理解为殷司令亲临溜筒江、盐井、乡城一线，直接指挥诸战役。丽江地区主要为纳西族聚集地，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称之为藏区或康区。滇西北的藏区，仅指迪庆州（今香格里拉市）一带。据笔者实地考察，丽江以西，在虎跳峡镇（原石鼓镇）渡过金沙江，才算进入藏区。根据近代开放的档案和当时的报道，知悉在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四个月中，“殷率司令部及其余各队暂驻丽江，相机进击”，是省政府与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指挥、通信联络的中继站，故殷承璠从未曾跨进藏区。民国中期，王图瑞着《云南西北边地状况记略》也有类似叙述：

……云南因西北各边区和西康一带有密切的关系，故在民元间由殷承璠任西征军司令，率领精锐新军数千，拟征讨康藏，气势浩荡，大有“灭此朝食”之概。抵丽江后，盘桓休息，迟迟不见动静。于是只好随便进至维西属之奔子栏一带，和喇嘛寺作了一度的小战争，得到一寺的屋顶上镀金的一座宝塔。现在此物尚陈列在昆华民教馆内，并附镌有殷氏跋语一段，这也要算是西征的成绩。^[46]

《西征篇》编织的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故事至今仍然被某些学家奉为经典。2013年出版发行的《殷承璠和护国运动》一书，根据《西征篇》混淆不清的材料，借题潇洒地发挥了一把：

殷承璠命李学诗率部乘胜直捣盐井，26日夜攻克盐井县城。……西征军的神速作战打乱了叛军的部署，与川军行动的迟缓相比颇有英勇之气概，故当时地方流传着“不怕川省尹都督，只怕滇省殷将军”的民谣。……故当殷承璠率滇军被迫返滇时，毕土寺喇嘛沿途挽留，满含热泪，献上哈达、佛塔。班师回昆后，殷承璠将佛塔送到了文庙（当时的博物馆），成为藏汉一家的历史见证，永远保存。^[47]

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倘是用蒙太奇拍摄，可真让人潸然泪下。可是作者想过毕土寺在哪儿吗？当年的毕土寺离丽江有千里之遥，远隔雪山数座，江河几条，从未进入藏区的殷司令怎能与藏民、喇嘛们依依惜别？8月27日，右纵队郑开文部克复盐井，直接指挥这场战役、审讯蛮官鲁宗甲约、释放裹挟在内的普通百姓。此地、此时此刻的这些行动和举措，只可能是郑开文等前线指战员所为。藏族民众惊叹滇军进军神速和作战机智勇敢，感谢滇军对毕土藏民的宽厚仁义，面对的也只能是左纵队姜梅龄、华封歌等官兵，与殷司令官似乎没有直接关联。第一纵队参谋长姜梅龄率左纵队于8月15日溜筒江战役后翻越梅里雪山，9月初才抵达毕土，表明步行来往于毕土与丽江之间非有月余时间才可能到达。殷司令何以“乃令毕土寺喇嘛赉之以往，并谕以中央已请达赖照旧看待在藏官吏军民及保全藏中愿意共和之僧俗，以释毕土附近居民疑虑”？据《西征篇》透露，闻我军东归，东宝喇嘛由红盐井与书于殷司令曰：“自毕土寺附近投诚后，尹当、满觉二大

属及闷空属之瓦补、根补、根工、腊大四村，均相率投诚。顷闻我军凯旋，深恐藏官沙旦古褒复来残害，愿永为滇民，请求保护。”可见，与毕土寺僧俗联络的宣慰大法师东宝喇嘛，其时就在红盐井，所有与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部的往来电文均通过德钦前线指挥部的电台拍发，所有的宣慰活动都是由郑开文运作、指导的，与殷承瓛似乎并无直接的联系。

假借《西征篇》文中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发生的事件，巧妙地相互嫁接，把西征滇军前线将士浴血奋战，不畏严寒、严重缺氧，克服雪峰冰川的艰难险阻，取得攻城夺隘的功劳全揽于一身，这样的桥段就是《西征篇》内容推而广之的必然结果。

假借历史材料推而广之的还有《天南电光——辛亥革命在云南》一书云：“……殷承瓛接到这封撤军电报后，灰心‘痛哭’，决意班师回滇。10月末，撤离藏境，11月11日抵达丽江。”将《西征篇》内容不假思索地引申为殷司令率部进入西藏，接撤军命令后痛哭离开藏境回丽江。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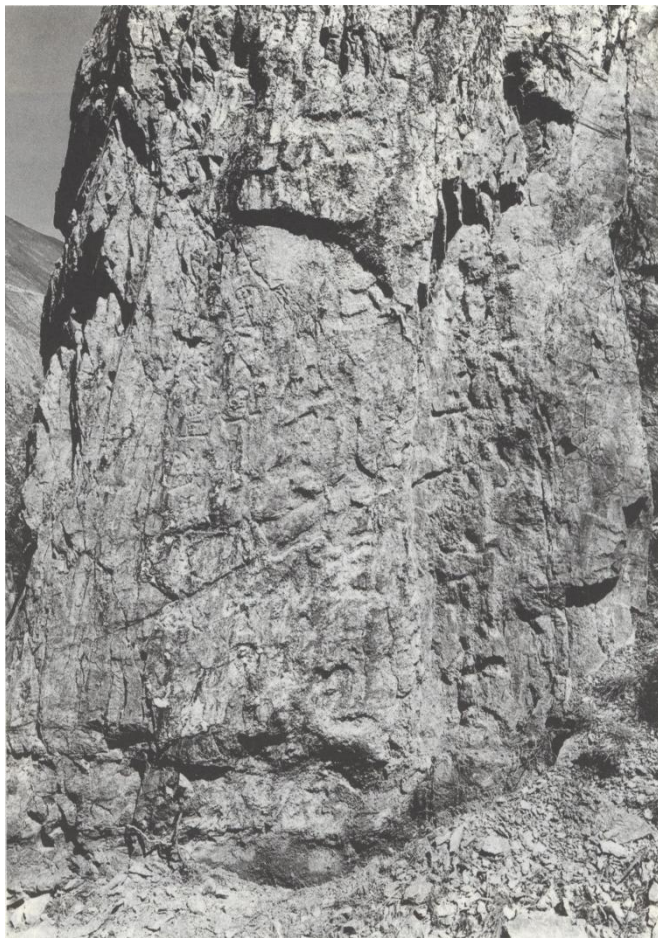
第八节 《滇郑开文西征凯旋纪念》摩崖石刻的发现

2021年5月，德钦县文物管理所进行田野调查期间，在云南省香格里拉市德钦县佛山乡溜筒江村的东达垭山口（马坝顶和阿东河二级电站间的山梁上）的茶马古道边的崖壁上，发现了一通摩崖石刻残迹，上刻汉文，碑刻时间为1912年10月16日，西征滇军从西藏撤返到云南境内之时，距今已有110年。此摩崖石刻从右至左共四列，可辨识的内容为“滇郑开文西征凯旋纪民国元年十月望日禄丰刘钟俊启”，共23个字。经县文物管理所次里农布等考古人员的初步勘查，此摩崖石刻面积约为高约2.4米，宽约2.2米。整个崖壁高约12米，宽约4.1米。石刻的质地为叠层青石岩，主体内容“西征凯旋纪”的字体为颜体，其余为行楷。由于此摩崖石刻处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东达垭山口，海拔3000余米，气候寒冷，冬春季风速很大，冰雪覆盖时间长，季节、昼夜温差大，裸露岩体的热胀冷缩和风化明显，导致摩崖石刻表面氧化、溶蚀，脱落严重，大部分字迹的偏旁残缺，已不能完整判读。石刻下部的表面由于受地表雨雪水的浸润，已完全龟裂，成为碎片。据此处山体、地形的观察，东达垭山区域的风化、沙化严重，有曾发生过山体崩塌或局部雪崩、泥石流的迹象。由此判断，百年来的地质变迁，摩崖石刻的下部可能遭遇掩埋，导致碑刻内容明显不完整。比如“纪”字以下应该还有“念”或“念碑”等其他文字内容，因为民国初年的滇军西征是个大事件，应该立碑纪念，故石刻内容为“西征凯旋纪念”或“西征凯旋纪念碑”方为完整。由于缺乏史料记载和实地考察缺乏必要的勘探仪器设备，而且当地海拔高，气候恶劣，不便进行浮土的清理，暂时不能确定被掩埋部分的具体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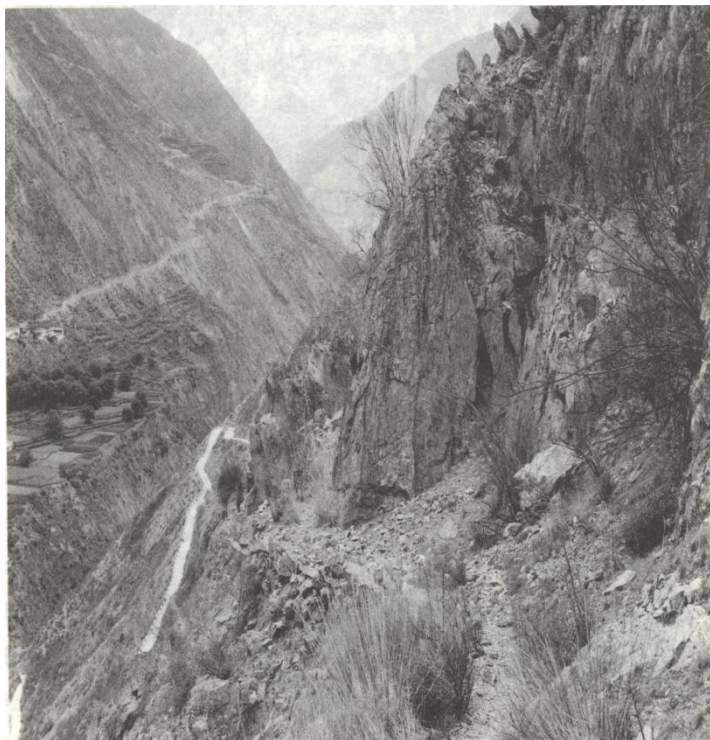
德钦县佛山乡溜筒江村东达垭民国元年“西征凯旋”摩崖石刻拓片之电子版，云南省图书馆马云川先生制作。

摩崖石刻上可以判读的文字内容背景：滇郑开文：郑开文，字炳然，云南省通海县人。时任德钦前线指挥部军事长官、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兼右纵队队长。事实上，西征滇军司令部驻节丽江居中调度并未参与入藏战事。唯有第一纵队（混成旅编制）真正进入西藏援藏平叛，是盐井、毕土等战役的参战部队，郑开文是执行人藏战事的第一责任人。禄丰刘钟俊启：刘钟俊，云南省禄丰县人，时任西征滇军右纵队参谋兼西协防军第六营营长（原前卫司令、西协防军第六营营长为李学诗）。碑刻时间为1912年10月16日，西征滇军从西藏撤返到云南境内溜筒江村附近之时。

只供阅读 请勿侵权



德钦县佛山乡溜筒江村东达垭山口摩崖石刻（局部）德钦县文物管理所次里农布拍摄



德钦县佛山乡溜筒江村东达垭山口摩崖石刻周围环境（有麦地处在澜沧江西岸的溜筒江村，左下角是澜沧江江面，江面与卡瓦格博雪峰落差近 5000 米）。德钦县博物馆斯朗伦布拍摄



德钦县佛山乡溜筒江村东达垭民国元年“西征凯旋”摩崖石刻拓片之电子版，云南省图书馆马云川先生制作

第九节 《西征篇》与滇军、川军的乡城之战

《西征篇》编撰者对西征滇军援藏平叛历程的叙述、评价存在疏失和谬误，还具体表现在对乡城战役的陈述上。西征滇军援藏平叛期间，由于郑开文所部先期到达德钦和通讯不畅等原因，身在千里之外的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瓛对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的部署、战斗进程、各部进止位置等情况均不能及时掌握，导致上报军情时疏漏百出，语焉不详。兹举一例。殷司令9月18日电报云：

滇军奉大总统西征之命，应巴塘、拉萨求救之请，顾全大局，克日出师。右规乡城，左规盐井，以为川军攻巴、里之声援。今盐井收复已念余日，乡城投诚已一月余。犹不肯自由至塘者，一则为川军留有余地步，以敦睦邻之谊；一则顺侯大总统明定权限，以为措置之方。^[48]

以上海《申报》“滇省西征滇军联长郑开文电”和现存丽江黑龙潭公园《哀乌斯藏辞并序》碑

刻以及郑开文致驻丽江殷司令官三件电文来看，西征滇军“今盐井收复已念余日”是事实，但由此推及“右规乡城”，“乡城投诚已一月余”则无从谈起，“犹不肯自由至塘者”更为无稽，因为西征滇军援藏平叛的进军计划中，根本无此项任务。按云南都督蔡锷的指令，滇军沿盐井、毕土、左贡、波密一线进略西藏：“倘必愿滇军与闻藏事，则滇军即不能不由此路入手。盖由维西出口，经珞瑜地方，向西北进至亚巴尔即入藏境。溯雅鲁藏布江而上，转西北至甲穆达，与川藏大道汇合，计程当省千数百里，其利一。中经怒求、珞瑜、野人地方，气候较温，出产亦富，间有平原，可资屯垦，其利二。此路凿通，则滇特其南，川捣其东，首尾策应，形势都归掌握，其利三。早占地步，使将来国界远在怒求、珞瑜野人之间，不致近逼川西、前藏，其利四。……若滇藏间之便道凿成，省程途，因地利，勤屯垦，储军实，一气衔接，西藏经营可得而言矣。”其路线大致是沿雅鲁藏布江及其支流帕隆藏布（发源于八宿县的然乌湖周围，西北方发源于那曲地区嘉黎县，主要流经林芝市波密县，下游在林芝县进入雅鲁藏布江）的河谷地带行进，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在8月下旬已经收复盐井、毕土等战略要点，就是与此进军路线相对应。反而是西征滇军总司令殷承瓛错误地理解了蔡锷的战略意图，为打赢舆论战的需要，去胡扯什么“打乡城，进军巴塘、里塘”，自找“瓜田李下”之嫌疑。

西征川军由南线（现川藏318国道大致方向）、北线（现川藏317国道大致方向）出兵，在昌都或芒康汇合后沿原川藏大道进略西藏，具体路线是洛隆——边坝——嘉黎——工布江达——拉萨。滇川两军进藏路线本无交集，可相安无事。就是殷司令这个吹过头的“巴、里（巴塘、理塘）、乡城的”战绩，闯入川督心心念念的势力范围，引起尹昌衡的剧烈反弹，使得西征滇军、西征川军同赴西藏的形势陡然剧变。因为从地理位置来看，乡城、巴塘、理塘同属川边，确实涉及西征川军的进藏路线和核心利益，还有川督的颜面问题。牵扯太多，故而嫉谤纷至，导致尹昌衡竭力反对滇军入藏作战。从请滇军另外择道进藏，发展到力阻滇军进藏，极力摒弃滇军与闻藏事，“藏中之事，昌衡一力独任”。

一时间，滇川上空电文穿梭，口水乱飞。殷司令力求口快气颐的电文：“……急则求援，缓则忌功，延客至门，挥之使去，于理于情，安乎不安？况师出混成旅以上，道出三千里以外，糜饷至数十余万之多，军行经四十余日之久。欲以一纸空文，使之废然而返，能乎不能？敬告中央，献奉（命）西征，只求国事有济，非敢邀功。惟滇军至此，士气倍奋，离弦之箭，势难中止，楼兰未斩，誓不复返。”应该说，殷、尹、郑、姜等同学的国学功夫自然了得，在日本留学时均参与报刊杂志的发行、编辑、撰稿，写就的文章、评论，大都犀利、风趣，称道东瀛。激扬文字，挥斥方遒，抓住一点，论及其余，自然是酣畅淋漓。此等不留情面的书生意气，戳痛了同样求功心切、好说大话的尹昌衡同学。嫉妒的力量是最可怕的，不但形成滇川两军不和，延误援藏平叛的最好时机，也把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努力和国防大略，毁损于滇、川西征军两位统帅的无谓争论中，遂使两省间商酌、协商进藏大计的可能性归零。所以，即便百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必要说清楚西征滇军究竟有没有“右规乡城”，促使“乡城投诚已一月余”，以免讹传。

对于涉及西征滇军对乡城战役部署情况，《西征篇》有三段文字叙述：

(1)西征滇军8月19日到达丽江时的军事布置，“以姜梅龄为右纵队长，率步兵三中队、骑兵一分队、炮兵、机关枪各一小队，而以华封歌为步兵大队长，杨承禄为步兵中队长，陈天贵为炮

兵中队长，华封治为机关枪小队长。杨汝盛领西防国民军，是为右纵队，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

(2)西征滇军收复盐井后，殷司令9月11日致电蔡锷电文内容：“滇军奉大总统西征之命，应巴塘、拉萨求救之请，顾全大局，克日出师。右规乡城，左规盐井，以为川军攻巴、里之声援。今盐井收复已念余日，乡城投诚已一月余，犹不肯自由行动者，一则为川军留有余地步，以敦睦邻之谊；一则须俟大总统明定权限，以为措手之方。”

(3)西征滇军从藏区撤回丽江期间，清剿瓮水之敌的情况，“……蛮兵之乱，以乡城为中坚，乡城距中甸仅六日程，乡匪一日未平，滇军一日未能遽撤。而木里接壤乡城，须与木里土司联络，始足制胜。十月下旬，大队长华封歌、左纵队长郑开文先后率师至中甸。时瓮水及东汪之乡匪，因川军由巴、里进攻，其一部分撤回防御，川军余约千数百人退扎上瓮水。右纵队长姜梅龄拟痛剿乡匪后，勒令永不犯边，然后撤回。遂派华封歌协同副官杨汝盛由瓮乡大道为主攻，参谋高荫槐率中队长杨承禄由两瓮小道为助攻，以副官朱家齐任输送粮秣，同时出发。而我军宣慰委员木标亦游说木里土司与滇军前后夹击，声势甚振。月杪，军抵瓮水，居民已尽逃匿，遂进取瓮水关，并派一中队前往搜索，不见敌人而还。盖乡匪闻我大举，即行逃遁矣。我军虑匪重来，暂驻瓮水，四出侦察后，知该匪无意犯滇，即行撤退”^[49]。

三段不同时间的乡城战况，编撰者似乎想告诉读者，西征滇军8月19日抵达丽江时，已经对乡城战事进行谋划、部署。在收复盐井（8月27日）前就由姜梅龄纵队“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并在滇军撤还丽江前对乡城叛乱分子又进行了一次痛剿，令其丧失战斗力。但是，根据相关档案材料和当时战况的报道以及当事者往来电文的研究，其结果与以上叙述相去甚远。

在援藏平叛前线指挥部制定的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的作战计划中，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分为两路：第一路为右纵队，由郑开文率领，直攻盐井、芒康，兵临嘉玉桥，以切断理塘、巴塘、乡城方向藏军的退路。第二路为左纵队，由参谋长姜梅龄率领其部翻越梅里雪山，沿澜沧江西侧直攻毕土、察瓦龙、左贡，兵临波密、江达，剑指拉萨。这很清楚说明姜梅龄左纵队长统领华封歌一大队、骑兵、机关枪、炮兵各一小队，担负着援藏平叛的前锋重任，没有也不可能分兵“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致使“乡城投诚一月余”。

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联长郑开文对中甸近邻的乡城进行了谋划、部署，仅限于“杨承禄领西防国民军第四营，驻扎瓮水”，防范乡城叛乱分子对滇军右侧的侵扰以及可能切断滇军补给线和退路的威胁，关乎胜败，实乃不得不防。然而，该部驻扎瓮水的任务没有到达预期目标，成为西征滇军第一纵队在援藏平叛期间所有战事中唯一的败绩，联长郑开文引为憾事而深感羞耻。郑开文于1912年10月19日致驻丽江殷司令官电文透露：……今日瓮水之败，不终朝而退至百余里，其覆轨不同出一辙哉（指边防军纪律涣散，战斗力弱）。参谋长姜梅龄11月6日的电文也说到驻瓮水第四营被乡城叛乱分子包围的情况：“鱼日（11月6日）得姜参议由中甸来电，谓乡城蛮匪，因川军停扎巴（塘）里（塘），无事麋集乡城，江日复来二千余蛮，四面围攻，势极凶悍，我军仅防军第四营驻跨瓮水，迭被围攻，俱已丧胆，若不添兵进剿，不但不能安兵扰退，且恐中甸亦将动摇。”^[50]

上述相关于乡城的情况，都说明乡城叛乱分子曾围攻瓮水（今翁水村）、东汪（今东旺乡），而驻瓮水防军显然处于一个战术性防御的守势。《哀乌斯藏辞并序》一文中，将此战术部署表达为“右视乡城”：“我滇军出师弥月，右视乡城，左复盐井，而巴塘待毙之，川军赖以解围岁险”。显

然，“右视乡城”与《西征篇》“右规乡城”一语有着巨大差异。《辞源》示例：国语周中：规方千里以为甸服。“规”是谋划、分划之意，此处可引申为西征滇军曾谋划攻击乡城，“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是也。“视”是看、审察、看顾的意思，此处可引申为西征滇军第一纵队戒备乡城敌情之意，具体的战术部署是分拨“杨承禄领西防国民军第四营，驻扎瓮水”。由此看到，西征滇军第一纵队的主要任务，初期有援藏平叛的大目标，后有援解巴塘之围的军令，均未曾有收复乡城的计划或者“犹不肯自由至塘者”。

再则，若以右纵队前卫司令李学诗西协防军第六营和独立步兵中队杨承禄第四营所部，试图赋予“右规乡城，以为川军进规里塘之声援；左攻盐井，以救川军坐困巴塘之危急”如此重任，尤为不切实际。

西征滇军第一纵队谋划攻打乡城是在西征滇军从德钦回撤丽江前的事，时间在1912年10月杪。电文显示，姜梅龄左纵队“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发生在西征滇军主力部队从德钦撤出以后，为防止聚集在乡城的叛乱分子侵扰中甸而采取的一个战术，“拟痛剿后，再招抚之，方免后患”。但是，姜梅龄、华封歌部，仅仅抵达瓮水关（今翁水村），临近东汪（今东旺村）等川滇接壤一带，所有战事均发生在瓮水、东汪附近，离乡城还远着呢。

说姜梅龄率部“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似乎很轻松，其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中甸到乡城的距离，按1999年出版的《新编中国交通地图册》标注为266公里，看似不远，但途中高山峡谷的阻隔，亦因乡城城坚、兵众、势强的客观存在，不打则已，如是准备攻打乡城，必须携带大量辎重、枪炮弹药、给养。那样庞杂的队伍，没有十至十五天时间，根本不可能到达。

笔者夫妇曾与儿子沙霖驾车从奔子栏镇过金沙江至古学乡—东旺乡—乡城—桑堆—稻城—亚丁—浪都村—格咱—香格里拉（此线路称为香格里拉小环线），对滇川藏接壤区域的交通、地貌有深刻体验。恕我孤陋寡闻，这条线路是笔者廿年间在云、贵、桂、藏、川高原地区行车数十万公里中最为艰难的路程，其间要翻越数座4500米以上的雪山和随之而来的深深峡谷。时常，行车二小时不过是从山的一侧移动到山的另一侧，连卫星导航仪都不动一下。半天不见一座村庄、不见一人也是常事。车行雪线之上，只见云雾翻滚不见路，感觉就像在空中开飞机。在峡谷低处的山谷则要穿越原始森林，蹚过雪水常年浸泡的沼泽，汽车犁过泥浆时，又似在水塘地里划小船。可见，人们在雪山与峡谷巨大落差之间穿越，是无法用直线距离来估量时长的。当今情况如此，百年前更难想象。

乡城是1912年间藏区肇乱的发源地之一，“蛮兵之乱，以乡城为中坚”，厚集藏兵主要力量，这些民间武装在历年战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并仗其地势险要、山阻河隔的屏障，易守难攻的特点，向来为兵家所忌。回顾一下川军历次攻打乡城的成败得失，可以加深我们对乡城与内地有迥然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情势的了解。

在四川都督尹昌衡率部攻打乡城的数年前，即1905年12月，曾发生清政府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率部围攻乡城的战事。以当时的报道说，乡城的冬天简直就是地狱！赵尔丰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写道：“这里冰冻三尺，寒风凛冽，巴塘到乡城的行军极其艰苦。由于大雪封山，崎岖难行，后勤补给相当困难，官兵们不得不轻装前进，粮食和武器弹药都只能随身携带。”毕竟是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优良的川滇边军，致使喇嘛庙僧人们屡战屡败，多人被杀，最后不得不退入寺中关门死

守，等待稻城方面土司同伙的救援。考虑到寺院围墙坚固无比，而自己的大炮还没跟上，赵尔丰便命士兵将寺院团团包围，同时催促炮兵赶快过来。大炮终于运来了，但出人意料的是，它们发挥的作用却相当有限，因为桑披寺的围墙是用巨大的岩石垒成，清军的老式火炮根本无法摧毁。赵尔丰一筹莫展，只能用土办法搭云梯强攻，但多次攀爬都无功而返，边军伤亡惨重，只能继续围困。没想到这一围，竟然也把赵尔丰的部队隔绝在冰天雪地里，不能动弹，长达半年之久，其过程和艰难程度完全超过了赵尔丰的预期。

不久以后，赵尔丰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由于周围道路已被稻坝土司四郎占堆率领的当地武装隔绝，清军与后方基地彻底失去了联系，先后派去催粮的四名使者全都被四郎占堆截获，边军陷入既无粮草也无外援的绝境。赵尔丰心里明白，现在只能完全靠自己了，一旦彻底断粮前还不能拿下桑披寺，饿急了的士兵很可能哗变，那样不仅此役功亏一篑，已收复的巴塘、理塘甚至整个康巴地区都会永无宁日，后果将不堪设想。而清军之所以没有发生骚乱，除了每天有一点粥喝，不至于饿倒外，还因为自己的统帅、已是六旬老人赵尔丰吃着与大家一样的伙食，这才让他们稍感平衡。史载赵尔丰到各营巡视，看到士兵们都饿着肚子作战，“睹之泪下”，无可奈何的同时，他也只能好言抚慰。与此同时，桑披寺僧人们的日子过得相当滋润，仿佛要气气赵尔丰似的，寺内被围数月之久的僧人们，竟然向墙外扔出来几条数斤重的活鱼，让正饿着肚子的围困者士气更加低落，因为清军早已截断了桑披寺的水源，但寺内竟然还能养鱼。赵尔丰断定他们肯定还有秘密水源，命令士兵加紧寻找，但始终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一名清兵在后山偶然踩开了一个土坑，听到坑内竟然有潺潺水声，这才发现土层下面原来埋设着通向寺内的供水陶管。在确定无疑后，赵尔丰立即下令堵住管子，桑披寺的水源终于完全断绝。此时已是春天，双方鱼死网破的生死搏斗终于开始了，没饭吃的清军拼命进攻，想打进寺里找饭吃；而没水喝的僧人们拼命突围，想攻到山下找水喝。最后清军完全断粮，不得不吃起刚刚长出嫩牙的草根树皮，甚至开始烹食包装粮食用的牛皮口袋，而僧人们也已经喝光了最后一滴水。现在，就看谁能多挺一分钟了。对清军尤其不利的是，藏区的雨季就快来了，一旦开始下雨，他们必将前功尽弃。众所周知，人不吃东西还能活两周，但不喝水却只能支持几天，寺里的僧人们终于挺不住了。1906年6月9日这天晚上，在赵尔丰散布假消息的引诱下，渴得实在受不了的僧人们，以为四郎占堆的援军终于从稻城杀过来了，便打开寺门拼命冲了出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扑向山下溪流狂饮，清军则趁机大肆进攻，而且凡是有水源的地方都事先埋伏重兵。等赵尔丰最后下令停火时，已经有六百多名喇嘛、僧人被杀，小溪几乎成了血河，劫后余生的僧人都吓得痛哭流涕，庆幸终于拾回了一条命。

对于赵尔丰围攻乡城之战，还有另外一种版本。《清史稿》记载：

光绪三十二年，赵尔丰掘地道以攻乡城，（因）测量未精，仅及城边，该匪狡甚，伏地道而伪讲和，我军入城，约二千伏兵齐出，遂截断移兵，内外既不能相助，而城中水粮俱欠。”

这段没有细节的叙述看来平平淡淡，有赵屠夫之称的建昌道赵尔丰率兵数千，围城五月未克，最后不得不挖掘几百米长地道，才得以攻进乡城。这攻城夺隘的拉锯战，打到这份上，很容易让人联想起1864年曾国藩率领湘军围攻太平天国天京城（今南京）时的惨烈。

可惜，假的！这是清朝大臣赵尔巽编撰《清史稿》中为其弟建昌道、川滇边务大臣、四川总

督赵尔丰量身打造的“历史”。何以见得？乡城自古没有城，所指乡城之“城”均以“桑披寺”指代。“桑披寺”是藏东第一大寺，藏语称：噶丹桑披罗布岭，意为“遂心如意、兴旺发达的宝寺”，又名甲绒寺，俗称桑披寺。桑披寺原址在硕曲（河）西侧，历经战火蹂躏，原寺规模、气势已无法考证。1995年10月，根据乡城县城市规划以及大部分喇嘛的意愿，桑披寺迁址至巴姆山麓的同沙宫修建。以乡城县官方宣布的信息，新修建的桑披寺规模与原寺相同。其现状亦可以在网上搜索得到，可见桑披寺规模不是十分的宏大，无法与巴塘丁零寺、香格里拉松赞林寺、杭州灵隐寺、拉萨布达拉宫相伯仲。“赵尔丰掘地道以攻乡城，测量未精，仅及城边”是在诱导读者的联想，所攻陷的分明是一座喇嘛寺庙，而不是一座真正意义的“城”，以赵尔丰川滇边军之战力，不至于掘地道攻寺庙如此这般的周折吧。而“我军入城，约二千伏兵齐出，遂截断移兵，内外既不能相助，而城中水粮俱欠”之语，更是假的不行。试想：围城半年之久，僧兵还有如此的战斗能力，说明一座寺庙曾储备可以供数千人吃喝、消耗半年的物资，可能吗？至于两千伏兵齐出，分割包围攻入城内的边军，转而巷战，这应该需要一个较大的战略纵深和空间，能在一座面积数百平方米的桑披寺内展开？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赵尔巽编撰《清史稿》以及其人。赵尔巽于1911年3月继锡良担任东三省总督。辛亥革命爆发后，赵老二表面宣布赞同共和，私下里则在辖区内大肆搜捕屠杀革命党人，赵尔巽统治的东三省也是全国最后一个降下清朝黄龙旗的省份。史载其“肆意残杀同胞人达数千以上，及集合各要地进退维谷者不下数万人，乃赵尔巽犹派兵剿捕，日事搜杀。军队所至，殃及妇孺，灭绝人道，至此已极。刻虽赞成共和，实为民军公敌”。民国成立后，赵尔巽先去青岛隐居，后到北京成为老友袁世凯的座上嘉宾，甚至在袁世凯称帝后还被册封为可以不称臣不叩拜的“嵩山四友”之一，实际上成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象征性人物和核心成员。应老袁所请，赵尔巽于1914年3月担任清史馆馆长，开始主持编撰叙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部官方史书《清史稿》。1927年《清史稿》终于完成。这部主要由遗老遗少们主笔，力图为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的《清史稿》正式付印出版，在留下了一部丰富史料的同时，也塞进了关于其弟赵尔丰的“私货”和其他有争议的史料，这让后世诸人使用该史料时不得不多一份谨慎。

赵尔巽的“乡城之战”显然作伪，但乡城地势险要、山河阻隔、易守难攻的特点，却是客观真实存在的。1913年2月14日，在西征川军屡攻不下乡城的情况下，尹昌衡擢拔原滇军第十九镇三十八协营长孙绍骞接任攻乡川军总指挥，任职时间直至1914年1月9日克复乡城。乡城事毕，孙绍骞著有《平乡纪事》一书，记录了他接任攻乡川军总指挥前，川军历次攻打乡城的战况：

前清光绪三十二冬，川督锡良奏派建昌道赵尔丰率兵讨之，围其城五阅月始克。遂改订今名，因为设官戍兵，兴学课农，规模大具。宣统三年(1911年)，四川铁路事起，赵尔丰调任川督，乡夷受藏番煽惑，更为不肖，官吏所迫逼。遂聚众围城，败戍兵走官吏，乡城仍为匪据。边军统领顾占文派管带丁诚信、刘赞廷率兵攻之，不克，尽军歼焉。库存军械，抢掠一空，而边地遂糜烂不堪矣。民国元年(1912)，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兵由理化（今里塘）统师西征，当派支队部参谋张德荣率兵由理化进攻乡城，雅江县知事王廷珠率兵由马岩进攻乡城，两路夹击。王军至木拉村为匪败，枪械尽失，廷珠被擒，剥皮而死。张军至九倒拐，复为匪阻击，全军溃败，枪炮损失尤多，德荣仅以身免。至此之后，匪势益张，官兵胆裂。周支队长尚赤率兵由东龚进攻，军至阿都，因

兵单炮坏，不能前进，仍退驻东龚待援。尹公闻信，乃派嵇廉为总指挥，率兵再由东龚进攻乡城。嵇廉至喇嘛垭（丫），见匪焰甚炽，特招致曲登前土司然登汪吉，令往乡城招抚。匪以为怯也，愈骄横要挟，不可理喻。嵇廉无可如何，数电恳解职。^[51]

由孙绍骞介绍情况来看，不能不说，乡城藏兵战斗力之强悍，地理环境之复杂，气候之严酷，远超内地军民的想象。乡城就在川边理塘、巴塘之间，又临近中旬，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有“乡城一日不下，滇川藏则一日不宁”之谓。1912年8~9月间，尹昌衡对眼皮底下的乡城久攻不下，损兵折将，却拨兵与滇军抢占远在天边的盐井，费尽心机阻挡滇军入藏，致使“滇军进退狼狈，朝下一令曰甚速来，暮下一令曰速去，岂计我昆弟子侄之生命牺牲几何；我伯姊诸姑簪环又其损失几何乎。乃至求人入藏不许求协饷，不许求屯边亦不许师还。”西征滇军援藏平叛半途而废，铩羽而归，也促使川军很快面临着单打独斗的乡城之殇。

直至1912年9月12日，尽管乡城还是没有拿下，但尹昌衡还是信心满满的，夸起自己的威武神勇来也毫不吝嗇，电云：

当昌衡力缚西征，师次迭集，警报一日数传，昌都、炉城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倘河口一失，不复有出关之日，边北再陷，数年无荡平之时。是以星驰抵炉，番已震惊，即日尽炉之兵，列队出塘，以中路久涌乱流，要塞坚城尽入敌手，应用重兵猛击，作为本攻。乃遣朱支队长森林悉率骁健转战冲锋，先破麻盖、宗剪子、湾西、俄洛、穆炸坚，直捣里塘。又以北路蠢动之初，尚未燎原，出截不意，戡定匪艰，乃出奇兵，令刘督战官瑞麟衔枚急走，避实捣虚，暗渡德格，巧占昌都，天佑皇汉，所谋必臧。兹既昌都入手，巴安围解，里塘克复，贡觉收回，继定三岩，旋收同普，三瞻、白玉得以布防，稻坝、乡城哀求降顺，（川）边全境，一体肃清。^[52]

北京城的官员们似乎也看透了尹昌衡的把戏，谁都会想，乡城就在川边，数月攻不下，还好意思吹嘘自己的文韬武略、盖世武功。1912年10月7日，北洋政府致电尹昌衡曰：

大总统令：两支电均悉。现在川边渐已底定，藏事尚须规划，迭阅该督来电，具见勇往之忱。惟藏路险阻，自炉至察木多一带，绵亘二千余里，挽输艰苦，番族众多。察境以西，尤胜内地，历来用兵筹策，皆非仓猝所能规定。该督应先赴巴、理、察木多等处，详细察看情形，将进兵应如何布置，逐细核酌，呈候电示。否则近驻炉关，距藏遥远，一切筹划，多属理想，与事实未必尽符，深虞别致贻误。^[53]

此电文优雅文绉，其实字字戳心啊。说什么“该督应先赴巴、理、察木多等处，详细察看情形，将进兵应如何布置，逐细核酌，呈候电示”，难道尹都督是个不会打仗的黄毛小儿？不是已经上报“旬行千里，月占十余城”了嘛。什么叫“否则近驻炉关，距藏遥远，一切筹划，多属理想，与事实未必尽符，深虞别致贻误”，明明是直诋其打仗无勇无谋，只会趴在打箭炉畏缩不前，争功邀宠得力，吹牛说大话带劲。民国元年陆军部的将军们这样不留情面、缺乏修辞儒雅的电文还真不多见。这也太不给面子啦，把尹司令撒豆成兵、威猛神武的形象捅个底朝天。哄上瞒下的把戏，英明神威的吹嘘，瞬时变成了冷嘲热讽的戏弄。这让老尹在打箭炉郁闷了好几天，还差点被送到四姑娘山上吹凉风。喝酒、打麻将、唱作川戏也都不逮劲。找人喝酒解闷，还被候任昌都府知事

李亨借着酒劲数落了一通“你尹昌衡这个人，给你这么个大任务，西征军总司令，你不去打西藏，却整天在这里喝酒玩乐”。唉，真够倒霉的。

此情此景，到了尹昌衡不得不亲自出马解决乡城问题的时候了。捱到10月底，终于有了尹督西巡的确信：“乡逆悍顽，已决于冬日督师亲赴前敌……昌衡俟乡城大定，即便崇哨巴、理，发赴昌都”。1912年11月2日是尹昌衡西巡巴塘的出发时间，致电袁世凯：“昌衡甫来，士气百倍，准予本日简办亲往，如仍不克，自甘任咎。倘滇军来后，（徒）耗无益，纷扰堪虞，务望转饬迅速退军，则川边大局，昌衡一力独任”，电文颇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巴塘离乡城百余公里，尹都督亲自出马，剿灭几个土匪，自然不在话下。

乡城究竟是什么时间收复的？尹昌衡始终没有说个明白话。百年来的史学家、研究者似乎也没有明确的定论，仿佛都沉浸在尹昌衡武功韬略的唾沫星里，湮没在彼此的论争中。

西征滇军收复盐井整整四个月，也就是尹昌衡发出“简办亲往，如仍不克，自甘任咎”豪言壮语的50多天后。1912年12月27日早晨，一则英国路透社新闻报道，让引颈盼望攻克乡城好消息的文武官员、士绅巨商们倒吸了一口冷气：“藏兵夜袭华军于乡城，华兵死者三百人，华军失去机关炮六尊，里塘以西，路旁房舍，均为藏兵焚毁。”^[54]或许，这则路透社消息又是其无数谣言中的一个。但尹昌衡11月亲抵巴塘，重新部署西征川军攻打乡城，集中了川军精锐数千人，粮草足供，士饱马腾，愈数月之久仍然拿不下乡城，再怎么辟谣都难以说清其中缘故。从标榜自己如何神武威猛，信誓旦旦地出手便擒，到屡屡强调攻克乡城的难度，求增兵、加粮饷，也旁证了尹昌衡在乡城的窘境。本想天高皇帝远，遥遥川藏，京城自是不会有人来检查的，瞒过一天是一天。谁曾想到，竟然被几个“不懂事”的外国记者捅破，尹昌衡情以何堪。

墙倒众人推，北洋政府的官员们也趁机咋咋呼呼地起哄：“……查前据尹督电称乡城办理为难，惟末叙及挫衄如此之甚，究竟乡城现办情形如何，务即逐细复，以慰弛系。”^[55]挫衄者，挫折也，亦有鼻子被人打出血的意思。尹司令打包票限期拿下乡城的诺言无法兑现，反被藏军打了个满脸鼻血，撕开了其威猛神武的包装，暴露他狂躁、飘浮、怯弱的一面。袁世凯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尹昌衡打仗没本事，就一个区区乡城县，集中了西征川军所有的精锐，兵力、武器数倍于对手，围攻数月就是拿不下家门口的乡城，这让对尹昌衡恩爱有加的袁某也丢尽了老脸。对于袁世凯来说，已经满足了尹昌衡所有的要求，让尹当了川西镇抚使，再添加一个“川边经略使”，喝令滇军撤回让其方便行事，报功行赏一一照准，甚至容忍尹昌衡把川藏某些地方改为硕督县、太昭县、嘉黎府。以老猿那么老道的江湖大佬能不明白这种小把戏吗？即便无缘川边政局的你，读读下面这段文字会咋想：四川都督尹昌衡，字硕权，号太昭，小名兰。

至此，尹昌衡与袁世凯的蜜月期结束，袁政府甚至一度断了尹部的粮饷支持，让其在川边自生自灭。仅仅依靠四川一省的财力、兵源是远远不足以应对西藏问题的。从清康熙年间平定吴三桂叛乱；防堵准噶尔侵藏，乾隆年间平息川边大、小金川的叛乱，到光绪末年平息乡城叛乱的战事，都有从云南出兵芒康、乡城、巴塘的记录。地理条件上，从成都至乡城，路途遥远，关隘重重，雪山峡谷、大江大河的阻隔，确实给运输兵员、武器弹药、粮草带来极大困难。据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估测，一斤米粮从成都运抵乡城，运送费用是粮价的20倍。滇军从中甸出兵乡城、巴塘，则可依托大理、丽江、鹤庆、剑川、维西等地区人口众多，农牧业、手工业、商业相

对发达的有利条件，筹集粮糈等物资较之四川方面要容易得多，挽输路程也近许多。古今中外的战争，特别是远距离的征战，决定胜败的主要因素往往就是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打的就是弹药、粮草。

尹昌衡下述电文所透露的悲催情绪与曾经“藏事独任”的豪迈气概已成天壤之别：

……中央不助饷糈，川中万难独任，昌衡决于本月八号飞巡全局，遄返炉城。现以五千之卒，当十万之师，步步层层，踏实屯兵，未敢稍留一隙，心力俱瘁，倘荷允准，则当慎重图全，进复全藏，不然骑虎见伤，谁任次咎。调兵极苦，饷糈惟艰，地险天寒，兵常冻殒。我军新集，川局内穷，实历辛艰，声随泪下。前者辛劳，幸无一误，后事方殷，敢不尽诚，惟望俯如所请，大局幸甚。不然昌衡惟有尽忠报国，成败未能逆睹矣。盼复至急。^[56]

西征军援藏平叛初期，尹昌衡请求滇军与川军分途进击，体现了国防大战略的特点，避免了川军单打独斗的局面，这本来是一个正确的判断。谁知，西征滇军才打了几个胜仗，就让尹某求功心切的自尊心受到刺激，妒功忌能的心理膨胀，生怕滇军的进展神速，相忖其无能，遂竭力阻止滇军进藏，以免染指其势力范围。失去了川滇合作援藏平叛的大好机会，现在又面对小小乡城无可奈何，才知“调兵极苦，饷糈惟艰，地险天寒，兵常冻殒。我军新集，川局内穷，实历辛艰，声随泪下”，“前以全力鼓我盛气，犹极艰难，势如今日，食已尽矣，兵已穷矣，权已夺矣，迫已甚矣，惟有必败”^[57]

更能说明尹昌衡性格特征的还有，随着乡城久攻不下，尹昌衡迁怒于前线指挥、作战人员以及成都的官员们，上书袁总统要求得到对所有将士、官员生杀予夺的尚方宝剑，以利于尹司令的军令贯彻执行。1913年6月17日《申报》登载消息称：“北京电：尹昌衡电文略谓，请特下军令，第一条，凡有违抗命令者，请自上将、都督至目兵，均处死刑。如力不能为，准予辞职。某定奉命不力，请伏剑而死。昨日戒警之由，即由于此。”^[58]就此，尹昌衡得势时的任性跋扈、蛮横霸道，受挫时的怨天尤人，声嘶泣涕，均达到无以复加的境地，很让世人无语。

即便在这个非常时刻，尹昌衡还在幻想出天外奇兵，“请再派兵三标，大炮六门，所需饷械称是”，“以一标，炮二门，由宁远、盐源、贡噶岭直捣乡城巢穴，天外飞来，奇功易就，余集炉城，预备征藏”。^[59]

尹昌衡在川藏边打了一年仗，习惯于纸上谈兵，梦中挥戈，竟然不知道从成都经宁远（今冕宁）、盐源、木里至乡城的路程几何，道路可通？根据2018年四川省木里县旅行社报价里程：“成都经木里到稻城的路程总计967公里，时间9天，其中木里至稻城徒步时间5天。”由此可见，时至今日，木里至稻城、乡城依然是不通路的。笔者也曾经驱车过攀枝花、盐源、木里，想抄近路直达稻城、亚丁景区，结果犯了与尹昌衡一模一样的错误——想当然呗。看地图上那段距离应该不远，到木里县才得知到达稻城的交通很糟糕：海拔均为6000多米的央迈勇、仙乃日、夏朗多吉三座雪山成品字形横亘于途；峡谷、河流、山涧瀑布、湖泊沼泽密布其间，大部分区域是无人区，行程中海拔均在3500—4600米内。不通路，甚至乡间小道都难以为继。如果大部队穿越高山峡谷、无人区，必须携带保证足用的武器弹药和粮草，如果驮运大炮，骡马所需更多。就行军时间而言，以当年可以参考川藏地区的行军速度每天10—30公里计，木里县至乡城最少十天。尹昌衡计划从

贡噶岭南边偷袭乡城需要的时间则更难估计。这数千人的大部队穿越木里至乡城的计划会成功吗？

尹昌衡事后在其自撰《西征纪略》中也自嘲这个想法的幼稚，直如儿戏，一旦实行，会有多么严重的后果：

先是，昌衡请增兵，决由宁远入乡，出奇也。至是知难，遂力求不败，不敢稍轻，乃告于成曰，前以乡匪阻于北，故可乘其后，今彼已归据巢穴，攻坚不可不慎，且道出宁远，若一战不胜，则进无以为据，守无以为食，退无以为援，诚危。夫南北不相应，各谋其谋，众犹寡也，分二寡以敌一众，实难。且乡匪未知能抚焉否，若能抚，战守之计不决于一人，不出一途，进止非所能决，则失机，不如出炉之完也。五告五征，卒以刘成勋援兵从炉出。^[60]

如果当年尹昌衡贸然出奇兵由木里至乡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尹昌衡烂漫幻想十年后的1922年，著名旅行、探险家美国人约夫·洛克，在经受缺氧、寒湿、穿越无人区、雪域高原的生存考验后，走出木里至稻城之路，留下了三个词：洛克线、上帝浏览的花园、香格里拉，遂成为骨灰级驴友们追寻百年的“身在地狱，心在天堂”的探险乐园。

嘿，扯远了，还是回到乡城战事吧。

最后攻克乡城的指挥者孙绍骞在其《平乡纪事》中，详细介绍了最后收复乡城的战事过程：

当矧余衔命西讨，于今三年，初糜烂之余，继指挥之任，率屡败之卒，当常胜之敌，驰驱于冰天雪窖之中，顿兵于绝漠坚城之表。粮尽援绝之路，穷刀摧身，历忧千险，卒能反守为攻，化弱为强者，岂余一人之力哉？惟牛酹酒，涕泣誓师，觉诸军敌忾同仇，忠勇杀敌之功，又岂可没耶？……（民国）三年一月八日夜，分兵三路进攻。以周支队长率兵由左路越山前进，蒲、朱两参谋率兵由右路进，骞亲率兵由中路前进，血战一日，至九日午后，幸下乡城完全占据。稻城之危不战而解，所有阵擒及受伤夷匪，不论强弱，均妥为医释，余以自新。于是，各村均感激来投。不数日间，投诚者至五百余家，并呈缴快枪、大炮数百件，杂粮五千余斗，白英村亦率匪来归。惟刘赞廷攻德（得）荣未下，张使电令抽兵助攻。当派营长杨得锡率兵前往，会师平之。于是上、中、下三乡均一律肃清。^[61]

即从1912年9月“当派支队部参谋张德荣率兵由理化进攻乡城”至1913年2月14日，统领孙绍骞受尹昌衡之命重新组织攻乡城指挥部，统领四川一混成旅的兵力，历经三进三败，几陷绝境，苦战至1914年1月9日，终于克复乡城。西征川军打打停停，花了三个年头，损失数百人的生命和数不清的武器装备，最终克复乡城。这过程太过漫长，太艰难困顿，亦可以旁证1912年9月前后，西征滇军姜梅龄部、李学诗部均没有“取中甸大道，直趋乡城”，无有能力达成“乡城投诚”之举，“收复乡城近一月”之语更是无稽之谈。

- [1] 袁家普著《蔡公遗事》，原载《长沙日报》1916年11月11日。转载自文国明编《蔡锷自述》，第269页。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1年。
- [2] 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中国近代战争史》。第三册第248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7月。
- [3] 1912年5月16日《蔡锷电政府藏事危迫请派川滇边务将领专任办理》转载自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10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 [4] 周钟岳总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西征篇》第20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
- [5] 王勤培著《西藏问题》第67页。上海商务出版社
- [6] 1912年5月18日《国务院电请蔡锷派兵会同蜀军进藏镇抚》，转载自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1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 [7] 1912年5月9日《李根源致蔡锷密电》。转载自李根源/编撰《永昌府文征》第2786页。
- [8] 《在京滇籍议员致李梓畅电》，转载自李根源/编撰《永昌府文征》第278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李梓畅为时任云南陆军第二师李根源部秘书长李日垓。
- [9] 1912年7月25日《郑开文等致李根源师长电》（原载《西事汇略》卷十一，第6页。）转载自湖湘文库《蔡锷集》，第683页。
- [10] 1912年5月7日《国务院电熊克武侯大局初定再经营西藏》，转载自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 [11] 1912年8月30日《国务院电尹昌衡办理藏事不可冒昧轻进致酿交涉》，转载自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31-3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 [12] 1912年9月27日《胡景伊电政府川边锐胜之师中道屯阻，主权悉失引为奇耻，又据马师周电藏复仇汉非恃空文所能济事请示》，转载自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76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 [13]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转载自吕昭义著《英帝国主义与中国西南边疆》1911~1947. 第228页。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
- [14] 1912年10月22日《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转载自上海《申报》（影印件）1912年11月10日。
- [15] 转载自《国学》网：清 青浦杜昌丁松风撰《藏行纪程》，震泽世楷堂藏版，1733年。
- [16] 刘曼卿编制《云南与康藏间路程略表》，转载自刘曼卿著《康藏轺征》，第174页，商务印书馆出版，1933年11月。
- [17] 1912年6月12日《蔡锷复国务院电文》转载自周钟岳著《惺庵电光集》，第48页。
- [18] 赵式铭撰《蔡松坡先生事略》，未刊稿，原稿藏云南省图书馆。本文转载于文明国编《蔡锷自述》第254页。
- [19] 此镇纸石由郑氏族人捐赠，现存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
- [20] 1912年9月11日《蔡锷电政府转殷承瓚电滇省援军已发，势难中止，请定明川滇两军进行方略》，转载自《民元藏事电稿》第4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
- [21] 1912年8月2日《蔡锷电滇西第二师司令部李根源师长》，转载自李根源编撰《永昌府文征》第270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 [22] 赵式铭撰《西征篇》，转载自周钟岳总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西征篇》第20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
- [23] 1912年9月11日《蔡锷电政府转殷承瓚电滇省援军已发势难中止请定明川滇两军进行方略》，转载于《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4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 [24] 赵式铭撰《西征篇》，转载自周钟岳总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第20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1年11月。

[25]《蔡锷电政府在溜筒江击匪情形》（此为原电文稿，未经修改整理，为方便读者阅读，括号内容为笔者酌加），载于《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3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6]《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瓚电滇军退让敌军复来若川军不前就不可收拾请速示》，转载于《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73-74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27]尹昌衡撰《止园自记》，转载自任建新、何洁主编《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第192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

[28]日本国北京支那研究会编撰《中国人名资料事典》第2卷，第692页，日本国图书株式会社出版，1918年。

[29]日本国北京支那研究会编撰《中国人名资料事典》第6卷，第861页，日本国图书株式会社出版，1921年。

[30]1912年9月1日《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瓚电文》，转载自《天南新报》1912年11月1日载，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31]1912年11月15日《尹昌衡电北京政府请令蔡锷释放在盐井监禁之川军官兵》，转载自《民元藏事电稿》第99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32]王久敬著《藏事条陈》，第8-9页，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

[33]《尹昌衡电政府滇军直取盐井请飭令退出免致分裂》，转载自《民元藏事电稿》第85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

[34]《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转载自任建新主编《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第9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

[35]1912年10月10日《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瓚电》，转载自《天南新报》1912年11月12日载，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36]1912年10月19日《郑开文致驻丽江西征滇军司令官殷承瓚电》，转载自《天南新报》1912年10月25日载，云南省图书馆史料，《天南新报》缩微胶片。

[37]周钟岳总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西征篇》第21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8]周钟岳总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西征篇》第21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

[39]1912年10月22日《滇省西征军联长郑开文电》，转载自《申报》影印件，1912年11月10日登载。（特注：蛮或夷之语为当时的俗称，并无贬义。原电文无标点，由笔者酌注）

[40]转载自《国学大师网》：清 青浦杜昌丁松风撰《藏行纪程》，震泽世楷堂藏版，1733年。

[41]转载自《国学大师》网站，网络版《清康熙朝实录》287卷。

[42]《与唐继尧等促各省兴师讨袁电》，转载自毛注青等编着《蔡锷集》，第38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

[43]傅道彬撰《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荣》，《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六期。

[4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民国元年)》上册第209页，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4年。

[45]《赵式铭自传》，转载自方树梅辑纂《续滇南碑传集校补》第43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

[46]王图瑞著《云南西北边地状况记略》转载自马玉华主编《云南边地问题研究》，第79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

[47]殷英著《殷承瓚和护国运动》，第41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48]《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瓚电已电复尹督为川军留余地俟中央明定权限》，转载于《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

未见闻记四种》第 62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49] 周钟岳总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再版），第 219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年。

[50] 《蔡锷电政府据殷承瓚电敌复来围攻仍遵飭撤回请飭川军剿抚》，转载于《民元藏事电稿、藏乱始末见闻记四种》第 91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51] 孙绍骞著《平乡纪事》，转载自赵心愚秦和平、王川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册，第 260 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 年。

[52] 周钟岳总纂、蔡锷审订《云南光复纪要》（再版），第 219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年。

[53] 《国务院电尹昌衡应先赴巴塘察木多等处察看情形将进兵布置详呈候示》，转载自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 90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54] 上海《申报》1912 年 12 月 27 日，第四版，上海市图书馆史《申报》影印件。

[55] 《国务院电胡景伊尹昌衡闻乡城控衄务即详复》，转载自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 117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56] 《尹昌衡电政府增兵助饷直捣乡城》，1912 年 12 月 14 日，转载自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 110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 年。

[57] 转载自尹昌衡通电：“兵穷财尽诸种困难声称解职”，《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第 147 页。

[58] 《申报》1913 年 6 月 17 日，第二版，上海市图书馆史料，《申报》影印件。

[59] 《尹昌衡电政府增兵助饷直捣乡城》，1912 年 12 月 14 日。转载自吴丰培辑《民元藏事电稿》，第 111 页。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3。

[60] 尹昌衡撰《西征纪略》，转载自《尹昌衡西征史料汇编》第 190 页。

[61] 孙绍骞撰《平乡纪事》，转载于赵心愚等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第 260 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6 年 5 月。